

# 第一章 緒論

美國在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兩極對立體系」後，首先做出的決定，就是要加強「美國對全球的領導力」，確保二十一世紀會成為美國人的世紀。而在冷戰後的中國，透過「六四天安門事件」世界各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的影響，領導人鄧小平最終走向「改革開放」的務實路線，並嘗試與世界各國建立友好的互動關係。本文將以美、中兩國積極向外發展的態度，來探討後冷戰時期東亞區域之間的權力變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壹、研究動機

在 1950~60 年代時，美國的對外政策圍繞在如何遏止蘇聯的軍事威脅與共產主義的擴張。但隨著兩極體系的瓦解，美國已經沒有必要再進行圍堵，所以對外政策的制定者們，開始重新審視全球國際政經局勢的發展，建立新的全面性處理模式。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區域主義(Regionalism)在冷戰後興起，世界在過往的兩極體系發展下，依地理環境劃分成三大區域板塊：美洲、東亞與歐盟。從經濟層面來看，遼闊的土地資源、低廉的勞工、廣大的市場，使得東亞區域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新重點。在政治層面，以往依靠政治及軍事力量所主導全球權力結構逐漸受到區域性霸權支配的權力結構所接收。<sup>1</sup>

美國積極調整其全球戰略佈局：首先，積極向東擴展北約組織的勢力，重新建構歐洲大陸的聯盟結構。除了加強雙邊的互信

---

<sup>1</sup> 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憬藝，頁 21。

機制外，更要抑止俄羅斯再次稱霸的可能；其二，維持並持續發展與東亞各國的友好關係、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積極推動多邊對話、促進區域性政治經濟的整合、維持東亞區域內的民主與人權，更重要的是，阻止中國成為美國在區域以及全球利益上的阻礙者。<sup>2</sup>根據某些學者的看法，中國近年來經濟快速的成長(人均從 1978 年的 500 美元躍升至今超過 5000 美元、GDP 總額也被預估在 2025 年會與美國並駕齊驅)、政治結構的穩定性(面臨蘇聯解體、東歐共產國家垮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等政治變革，都未能使中國的政治結構受到撼動)以及現今對外的積極作為，例如：推動「大國外交」、建立「博鰲論壇」、推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等，都會成為影響美國在東亞區域建立霸權的挑戰。<sup>3</sup>

另一方面，後冷戰時期的中國，揚棄了過往毛澤東式的「一切強大的敵人都是紙老虎」這種鬥爭性十足的思想，<sup>4</sup>在新任領導人鄧小平的帶領下，走向「改革開放」的務實路線，脫離了貧困的經濟、封閉的社會環境，並嘗試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經貿合作關係，自此，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極具開發價值的市場。正因為經濟成長迅速上升，國家財富快速累積，使中國不論在社會、經濟、軍事、教育、科學技術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成為東亞地區新興的強權。

自中國本身來看經濟改革的成就，提昇的不單只是國民生活水準，也為自身創造了一個有力的投資環境。但另一方面，中國也認為在全球多邊體系、全球經濟區域化的情況下，不能光靠經濟實力來達成國家利益，還必須依靠政治、軍事等各方面的強大

---

<sup>2</sup> 周煦，1996，〈美國柯林頓政府的亞太安全政策〉，《美歐月刊》，第 11 卷，第 3 期，頁 5-39。

<sup>3</sup> 參閱 Joseph S. Nye, Jr., 1990,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4-5.; Gerald Segal, 1999,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3, pp. 29-32.

<sup>4</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4，〈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頁 56。

才能保有完整的國家實力。換言之，整體國力的提升才是中國目前的主要目標。這種思維下，中國對東亞政策產生了變化，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點：針對美國，不再強調對抗，而是訴諸共同利益、避免造成權力對抗；競合兩手策略，柔性推動多極化；突顯中國在東亞區域所扮演的角色；強化元首外交，帶動中美關係；最後擴大與美國在各層面上的交流，以期待獲得美國輿論的認同。<sup>5</sup>以上種種新方向，都可以看出中國積極的作為，不但是為了阻止美國干涉東亞地區的政策，同時也是為了中國本身的自主性以及東亞區域，甚至全球的利益發展。如同江澤民指出：「中國和美國都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對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有著重大的責任。」<sup>6</sup>

美國為了維繫對東亞議題的掌控力，就會與崛起的中國進行互動。美國政治學者 John Mearsheimer 在“China’s Un-peaceful Rise”一文中清楚論述，在當今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結構中，中國基於國家利益的基本需求與權力政治的本質，必將走向區域霸權，因此未來與美國的衝突將不可避免。<sup>7</sup>即便有學者認為，中國現在仍不致於對美國為首的國際體系進行影響，但其崛起仍對東亞區域產生結構性的變化。而現實主義中所強調的權力競爭、權力制衡、無政府狀態則無法解釋此一現象，<sup>8</sup>不論在經濟、軍事與外交上的實力，都令美國各界人士倍感威脅。因此，學者 Thomas J. Christensen 提到，無論是從「正和」的觀點：強調美國、中國和其他東亞區域的行為者，必須增強彼此的信任度、關係的透明度以及經濟層面的整合，來藉此降低產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或

---

<sup>5</sup> 中華歐亞基金會，2003，〈中共對美外交對兩岸關係之影響〉，《政策報告 No. 920003》，頁 8-11。

<sup>6</sup> 湯光鴻，2003，〈試論江澤民國際戰略理論的理論體系〉，《南京政治學院學報》，<http://www.54479.com/54479/ReadNews.asp?NewsID=444&BigClassName=&BigClassID=18&SmallClassID=17&SmallClassName=&SpecialID=24>。

<sup>7</sup> John Mearsheimer, 2006,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No. 4, pp. 160-162.

<sup>8</sup> 高少凡，2010，〈中國崛起對東亞國際體系結構轉變之研究〉，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發表論壇」，東海大學政治系主辦，東海大學。

是從相反「零和」的觀點強調：中國的興起是美國在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上最難以克服的風險，因此美國必須加強與東亞國家的關係、也必須更加具有建設性、全面性與策略性。<sup>9</sup>都可以得出一個相同的重點，那就是美國若想要獲得東亞區域領導權，就得與中國進行互動，而結果的好壞就端看美國的對外決策對東亞區域的影響來定論了。

另外，就東亞各國的角度。東亞各國與歐盟國家間不同的地方在於，歐盟國家的權力分佈相對於東亞來說是較為平衡的，因為東亞區域目前有朝向以中國為首之「霸權傾向」(hegemony-prone)發展。<sup>10</sup>所以，美國希望能藉由政治、經濟的介入從中獲利，就必須努力維持與中國在東亞中的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的平衡。另一方面，中國試圖從東亞區域中獲得支持，以穩定自身國力，並將發展的觸角拓展至全世界，則會與美國在意識型態以及政治、經濟、軍事...等現實層面上進行競爭。而東亞區域各國，對這兩大國採取的合縱策略又會間接影響兩國在東亞區域內的競合政策。所以本文試圖從美國與中國之間權力結構的變革以及政策制定相互影響的角度，來探討以下研究問題：

(一) 美國如何看待崛起的中國？在相互競合的情況下，美國如何處理與中國在意識型態、政治層面、經濟發展的議題上的分歧？在未來，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繼續發展美中兩國之間的關係，以維持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利益？

(二) 崛起的中國是以何種角度，看待現在在全球政經局勢上擁有領導地位的美國，在東亞區域中的角色？中國又怎樣在多邊主義的世界下，找出適合自身發展的脈絡？在東亞區域中，美、

---

<sup>9</sup> Thomas J. Christensen, 2006,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pp. 1-2.

<sup>10</sup>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頁 113-114。

中之間的競合又對中國未來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

（三）在東亞區域中，美國與中國又各自會在何種議題上與彼此相互競爭、相互合作？這種氛圍之下，兩國的未來會朝向何種情況發展？

（四）東亞區域內的國家，如何看待美國與中國在此的競逐？哪些議題會成為東亞區域各國注目的焦點，這些國家對這些議題又會對美、中兩國採取何種互動的方式？

## 貳、研究目的

本文最重要之目的，在於尋找美、中兩國在東亞區域競合的舞台上，彼此是以何種角度與觀點來看待對方的行為並如何做出政策上的改變、調整與回應。對於第一個問題，筆者首先將以冷戰後美國四任總統（政治菁英）對東亞區域及中國議題的觀點與反應，影響美國在東亞區域內政策的規劃及實行。接著從國家決策層面出發，在東亞區域內的各項議題上，美國政府的態度及決策對該地區的影響力並擴及至中國，在各式議題上與中國進行競逐。

第二個問題，筆者將從中國三位領導者的政治環境認知以及對外態度上著手，他們將如何看待美國在東亞區域中提出的各項議題對中國政策的影響，並做出適當的回應以符合中國在東亞區域的利益又不損害其威望。如今，在世界局勢朝多邊主義發展的情況下，中國政府試圖開啟與世界各國溝通的大門，希望能參與到全球化的世界，並藉此培養整體國力，但西方強權的各種要求（例如：人權、民主議題...等）都影響著中國在世界局勢的發展策略，其中又以美國更為強勢。中國與美國在東亞區域多方議題

的互動下，中國政府以及領導者們對各項批評的回應與作為，將領導中國朝何種方向邁進，即成為本章所關注的焦點。

第三個問題，美、中兩國在東亞區域內的各項議題競合，筆者將會從兩個部分著手。首先從安全層面來探究，所謂的安全層面分為傳統安全層次（軍事）以及非傳統安全層次（也就是反恐議題），筆者藉此二者來分析在安全層面上美、中兩國在政策的制定、合作與競爭下產生的互動模式。第二，筆者將對政治經濟層面做分析，不論是貿易體系(例如：APEC)還是區域內的聯盟(例如：ASEAN 東南亞國家聯盟)，美、中兩國未來發展的方向勢必得考慮到在東亞區域內的國家。在東亞區域內各議題相互競合的影響下，促使美、中兩國不斷的對自身在東亞區域的政策以及對外態度上進行修改，以追求最佳的利益符合其本身的需要。

最後，從東亞國家對於美、中兩國在種種議題上所建構出的競合意識下，這些國家尋求與兩大國在各項議題上的互動，藉以獲得實質利益上的好處。這些國家，在兩大強國勢力影響的環繞下，要找出符合自己的生存之道的方式。至於是何種方式，又如何去互動即是本文要探討的要點。

## 第二節 研究途徑

本文就美國與中國在冷戰後於東亞區域的政治及經濟議題上的競合來進行研究，藉此分析美國政府是以何種角度與思考方式來改變與調整既有的政策。因此，筆者運用以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與途徑來進行研究。

### 壹、研究途徑

本文所探討之方向，在多數的文獻中都可能會用以下幾種現行的研究理論來探討，也就是相信國家與國家間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而作有限度合作的現實主義；相信國際貿易是依照各國的制度、規範下所產生的產物的自由主義；以及對合作共同體的認同、及集體意識所構築出來的建構主義。筆者將大致介紹這三種主流的理論，再說明以這三種理論來看待美、中在東亞區域競逐的議題所會產生的盲點，並解釋筆者最後為何要選擇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本文的研究途徑。

## 一、現有研究途徑

### (一) 現實主義(Realism)

Hans J. Morgenthau 在其所著的「國際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一書中，即針對政治現實主義做一闡述。他認為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理論的貢獻在於該主張提供了一個用「權力」(Power)界定的利益觀念，Morgenthau 認為如果沒有這項觀念，則國際政治理論不可能存在，因為我們就無法區分政治與非政治的事實。<sup>11</sup>

在現實主義的假設下，國家間的合作幾乎是個不可能達成的任務，這使得國際間長期處於某種無政府狀態。但國家還是必須各種方式來滿足其基本的國家利益並延續自身的安全與存續。而延續的最好方式即是以權力(Power)，特別是武力，來維持整體國家利益。

---

<sup>11</sup> Hans J. Morgenthau, 1973,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p.3-15.

現實主義的主要核心要素是：國家是關鍵的行為者，國家主義一詞給予國家為集體意志合法代表的理念；所以國家領導者的第一要務是確保國家的生存；因為沒有全球政府的存在，對國際間各國的行為，只能靠自助作為原則。<sup>12</sup>

## (二) 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新制度自由主義最大的特色在於它認為國際間的合作是普遍的。與新現實主義一樣，認為權力分配是體系結構的重要部分，但仍同時強調國際制度是體制結構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屬於西方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之一。其代表人物是 Robert Keohane 在 1984 年的「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爭端」(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而 Keohane 認為自由制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等一樣，其理論基礎都是理性主義(Rationalistic Theories)。<sup>13</sup>也認為：1.國家存在於一個無政府的國際體系；2.國家是理性且單一的行為者；3.國家是建立建制(regime)的單元；4.建制是建立於國際體系中的合作基礎上；5.建制促進了國際秩序。<sup>14</sup>

經由制度的作用，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間可以透過合作來追求絕對的利益，也認同國家間的合作並非一時的權謀而是透過建立制度，使合作成為一持續性的行為。國家利益會透過國際制度的運作而決定，經由互賴與國際建制可以減少戰爭的產生，

---

<sup>12</sup>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2001,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10.

<sup>13</sup> Robert Keohane,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p. 158-179

<sup>14</sup> 同註 12。

使得合作成為可能。

### (三) 社會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建構主義的支持者們強調運用一組在意義上相互關連的社會學概念來解釋世界政治，主要包含規範(norms)、認同(identity)、文化(culture)等。建構主義者相信，通過建構而產生的規範、原則以及信仰，不僅影響和規定著國際政治中國家行為者的具體行為、利益、優先決定以及實現對外目標的工具。<sup>15</sup>就像 Martha Finnemore 所說的：「在決定行為者的行為方面，社會規範、法則、認同等與物質實現同等重要、同樣有影響力。」

曾有國際關係學者運用建構主義研究歐洲整合，認為建構主義比理想主義具有更廣且深的本體論，較能夠理解在歐洲整合過程下的歐洲各國體系轉型的影響，這包含認同、社群與集體意識的形成。建構主義者也相信經濟上的互賴、共同的外來敵人、共同的內部競爭對手...等，<sup>16</sup>使得國與國之間產生集體認同，願意接受國際規範，限制自身國家行為。

### (四) 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

新古典現實主義從 1990 年代初露端倪，2000 年得到許多迴響與重視，該理論是現有現實主義學派中最晚形成者，也是現實主義學派中，最針對國際環境變化，所做調整幅度最多者。它試圖維持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並同時尋求調整、並與時共進，它有意維護國際體系的優勢地位，但亦認知跨越層次的必要性，需進

---

<sup>15</sup> Martha Finnemore, 1996,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nnecticut: Cornell Univ Press, p. 15.

<sup>16</sup> Alexander Wendt, 1994,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pp384-396.

一步結合外交政策分析。

以 Gideon Rose 的觀點，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試圖用他們的權力（力量），來引導國際體系朝向符合自身偏好與目標的方向發展與前進，並拒絕「安全是國家唯一的目標」這個假定。因此，較強勢的國家在執行外交政策上也越能發揮較大的影響力。同時，單位層次的因素也非常重要，例如，受到國際政治所折射的效果及影響，國家的結構和菁英的心理狀態等因素會決定其回應國際政治的方式與手段。另外，華特(Stephen M. Walt)主張以威脅平衡來解釋國家的外交政策與行為，而史威勒(Randall Schweller)則強調利益平衡的觀點。<sup>17</sup>有評論者將華特與史威勒不同的論點作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野，但本文在此並不明顯區分，而是將前者視為主要分析概念，後者視為輔佐性概念，兩者並不彼此排斥反而相輔相成。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主張如下述：<sup>18</sup>

1.接受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事實，但認為其屬於不確定的狀態，是否會形成衝突或是合作，需視當時國家間關係與外交行為而定。

2.國家的目標是追求國家利益與國際影響力，在無政府狀態的不確定環境下，塑造有利於國家本身的環境，而此項主張與古典現實主義相同。

3.與新現實主義相同，認為國際權力分配是影響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但新古典現實主義關切的是「相對權力」之間的權力

---

<sup>17</sup> 宋興洲、林佩霓，2009，〈東南亞國脅與區域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25期，頁7-8。

<sup>18</sup> 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1期，頁125-128。

分配關係。當一國的相對權力增加，其外交活動與企圖心也會增加；反之，則會減少。

4.雖然權力分配是決定外交政策行為的最主要力量，但卻存在相當的限制。長程而言，國際體系權力分配能為國家外交政策行為提供合理的說明；短中期而言，卻存在許多限制。因此，無法有效解釋實際的外交政策行為。這是由於(1)國家不是單一理性的實體，存在多樣的變化與特色；(2)國際權力並不會自動轉化為外交政策行為，必須透過決策者與國內政治的承接傳送；(3)國際權力分配是個模糊的概念，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沒有客觀評估的標準；(4)國際權力分配在一定程度內限制國家外交政策的取向，但卻無法決定國家外交政策行為的特定選項；(5)雖然權力能限制國家外交政策，但在有限的選擇空間中，不同的外交行為選項可能對國家產生重大影響。

5.外交政策是由決策者制定，決策者對國際權力分配的認知(perception)可決定國家外交政策。<sup>19</sup>但是決策者認知卻存在許多變數。

6.當國家相對權力增加時，對外行動能力也會增加，但這並非是自動化過程，國家權力能否轉化為國際行動力量，取決於國內政治結構，特別是政府能力(state power)方面，即國家權力增長並不代表政府能力增強，如果政府的能力有所限制，無法運用國家權力於對外政策行動，則無法反映出國際權力分配的影響力，卻反映出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作用。

7.國家外交政策未必隨著國際權力變化，而採取相對應的權力

---

<sup>19</sup>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2002,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1, p. 4.

平衡措施。國家不只關心國際權力分配，同時也關切自身的國家目標與外交政策。各個國家在不同的考量下，採取不同的外交策略。各個國家在不同的考量下，採取不同的外交策略，分別為(1)滿足現狀並願意付出高代價，屬體系維護者，傾向採取權力平衡政策；(2)滿足現狀但不願付出代價，屬弱勢國家，傾向趨附勢力(bandwagoning)政策；(3)改變現狀並願意付出高代價，屬體系破壞者，傾向採取擴張政策；(4)改變現狀但不願付出代價，屬投機國家，採規避責任(buck-passing)與趨附勢力政策。<sup>20</sup>

根據上述，新古典現實主義是把研究焦點放在系統層次的變化如何經由(透過)國內及個人層次而產生出結果。簡單的說，由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和極性(polarity，無論是單極、雙極或多極)無法單獨地說明行為和結果，所以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開始探討並檢驗脈絡情境對外交決策考量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出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的焦點是在第一意象變數(first-image variables，也就是個人層次的角色上):其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選擇；<sup>21</sup>以及第二意象變數(second-image variables，即國家層次)，對外交決策選擇和造成結果的影響。

## 二、本文研究途徑

綜觀以上四個現存較具影響力的研究途徑，其中包含：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建構主義，是筆者認為這些理論不能單獨的解釋美國與中國在東亞區域內的競合關係，更無法解釋這兩國至今所採取的策略對東亞區域各國造成的影響，以及東亞各國對美、中兩國的回應。

---

<sup>20</sup> Randall L. Schweller,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1, pp.99-107.

<sup>21</sup> Daniel Byman and Kenneth Pollack, 2001,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 Bringing the Statement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pp. 107-146.

首先，在這個議題上，如果照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法與國際組織並無法阻止各國的私利行為，但從現實情況觀之，現實主義並無法解釋美國與中國在東亞區域議題上的合作行為（例如：反恐、經濟合作...等）。事實是，美國與中國在東亞區域組織中，不但在某些議題上會相互合作，而且也多遵守東亞區域組織中的規範。

第二，如果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角度來看，建制促成了全球化及一個自由化的世界秩序。<sup>22</sup>但就東亞區域的發展狀態來看，從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其它形式的合作模式也紛紛並起。這種多元發展、齊頭並進的發展模式，使得東亞存在著數個合作機制。但，如同學者 Stuart Harris 所認為，東亞區域的合作機制並不成熟，<sup>23</sup>這些機制是否能朝向正式建制化的目標發展、又能發揮多少影響力，都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目前所不可預期的。

第三，社會建構主義或許在解釋歐盟的組成上有其特定的貢獻及價值。但是對於東亞區域內的合作行為以及受美、中兩國介入產生的改變，並無法以建構主義提倡的：「在經濟上的互賴、共同的外來敵人、共同的內部競爭對手，使得國與國之間產生集體認同，願意接受國際規範，限制自身國家行為。」相反地，各國意識型態的發展，往往會影響東亞區域組織的團結度，有些國家（例如：泰國、新加坡）就常常單方面的與美國合作，而造成與其他東協組織中的國家不和。

這三種情況都無法單獨完整的解釋美、中以及東亞區域在各項議題上的競爭與合作。因此本文就以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本文

---

<sup>22</sup> 同註 12，頁 233。

<sup>23</sup> 同註 10。

的主要研究途徑，藉由兩個層次的變化，來探討美、中兩國對外政策的相互影響與回應，並探討對東亞區域有何影響及改變。並補足以往社會建構學派、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現實主義的不足。

### 第三節、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採取「圍堵政策」，而東亞區域內其他國家則試圖建立友好的互動關係，來防止蘇聯的壯大。冷戰結束後，美國發現到東亞區域具有極大的發展價值下，美國開始希望成為東亞區域的領導者，而積極的在此對各種議題佈局；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在領導人鄧小平的帶領下，開始走向積極開放的務實路線，不再與其他自由世界國家為敵，反而積極的與其建立貿易夥伴關係。隨著時光流逝，現今的美國與中國在全球議題上都各自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而在東亞區域的競合更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

#### 壹、論文架構

本文的研究架構主要分為四個部分。(見圖 1-1)

首先，第一部分，將探究東亞區域在經歷過二次大戰結束後，面對接下來的兩極體系，美國如何在東亞區域佈局來對抗共產蘇聯的侵略與擴張，並對戰後中國採取何種態度，來建設雙方的關係。另外，自中共建政後的中國，以何種態度看待在東亞區域內相互競爭的兩大強權，並獲得中國本身希望的獨立自主的國際地位，而中國又以何種方式來改變自身在兩強競爭的東亞區域下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部分，將從冷戰後的美國政府與其歷任領導者，是如何依照其對國際環境的認知及觀點，調整對中國在東亞區域的地位、角色和威脅性做評估與分析，並且運用權力去操作國家整體對外政策的發展方向來做探討。首先，由老布希及柯林頓主政時期，全面交往關係到戰略性夥伴的轉變。最後則是，小布希與歐巴馬在美國霸權受到挑戰下對中國與東亞區域所做出的不同改變。從提倡保守主義的共和黨到提倡自由市場的民主黨政府，隨著區域之間的整合，美國政府對東亞區域發展的期盼，促使美國改變與本身意識型態不同的中國的關係，盼能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第三部分，筆者將討論中國在東亞區域受到美國各種決策的影響，如何調整自身政策以適應東亞區域環境。中國領導者則是從「改革開放」後的鄧小平、追求「國際新秩序」的江澤民、以及提倡「和諧世界」的胡錦濤，這三位領導者的意識型態著手，探討中國領導者對東亞區域議題的影響。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則積極的希望擺脫過去威脅東亞安全的惡名，企圖以經濟發展為起點，在基礎建設、環境發展...等多方議題上與東亞國家進行合作，這種柔性外交的作法強化了中國在東亞區域內的地位及影響力，也進一步的影響到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勢力擴張。

第四部分，從近年所興起的全球反恐議題、不再有界限的全球貿易市場以及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全球金融市場，促使美國和中國重新考慮將如何與其潛在的最大對手（不論是在軍事、經濟、文化甚至意識型態上）進行抗衡，美國與中國在未來將會採取何種方式來與對方在各式議題做出競合，東亞諸國又將如何面對美、中兩國在東亞區域中的影響力，做出適切的回應以尋求自身國家的利益。以上即是本篇論文所要探討的內容。

## 貳、章節安排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第二節 研究途徑

#### 第三節 論文架構與章節安排

#### 第四節 文獻回顧

### 第二章 冷戰期美國與中國在東亞區域的發展策略

#### 第一節 美國對東亞的政策

#### 第二節 中國對東亞區域政策

#### 第三節 小結

### 第三章 美國冷戰後的東亞政策

#### 第一節 領導階層對東亞的政策

#### 第二節 美國政府對東亞的實際行動

#### 第三節 東亞區域的回應

#### 第四節 小結

### 第四章 冷戰後中國在東亞議題的策略

#### 第一節 領導階層的對東亞政策

#### 第二節 中國政府對東亞議題的調整與演變

### 第三節 東亞區域的回應

### 第四節 小結

## 第五章 東亞區域對美、中的態度與回應

### 第一節 東亞區域對美國的回應

### 第二節 東亞區域對中國的回應

### 第三節 小結

## 第六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第二節 未來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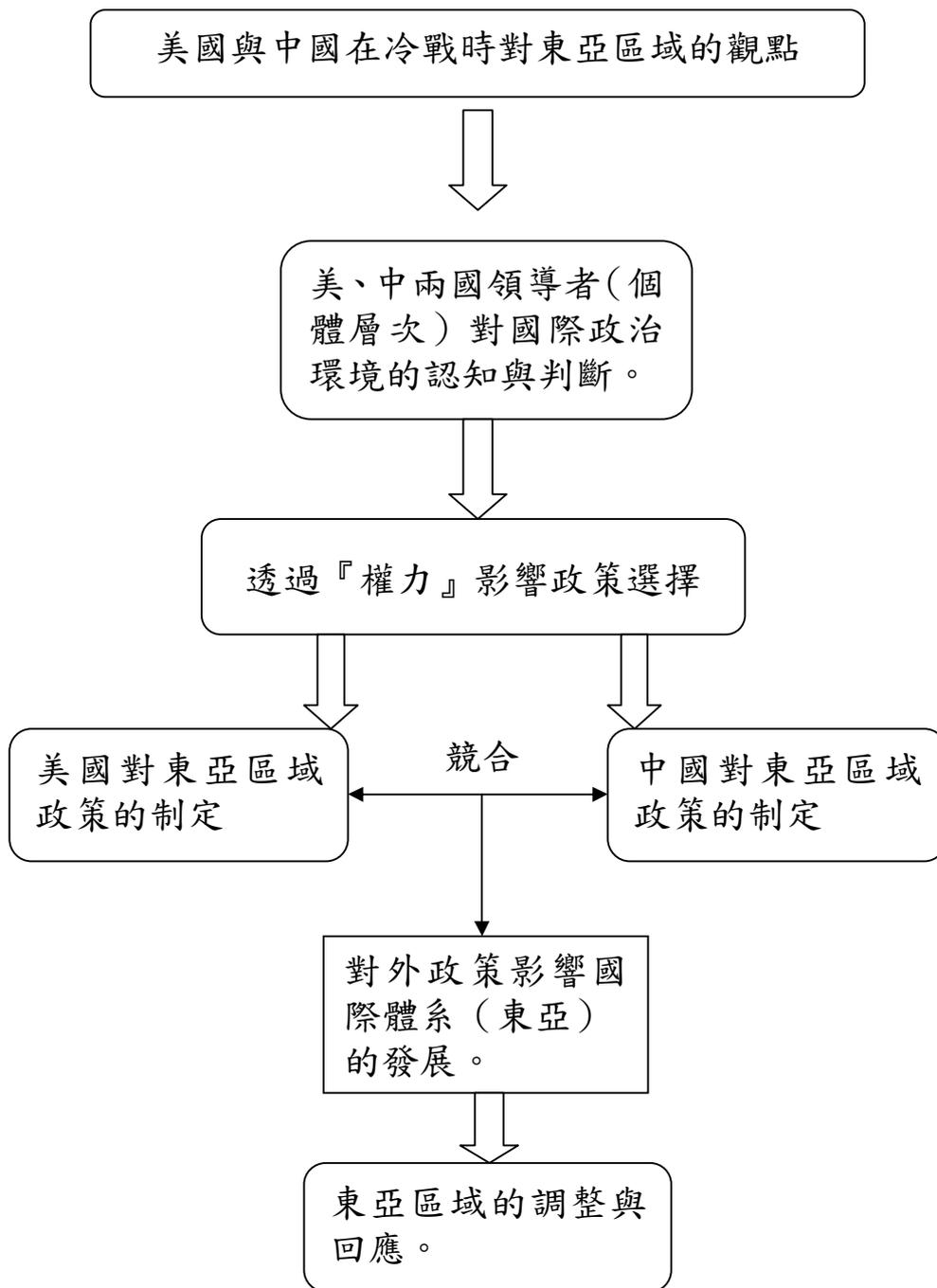


圖 1-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 第四節 文獻回顧

在探討美、中兩國在東亞區域競合議題前，筆者認為需要對由筆者所提出的兩個層次進行解釋。筆者將以三種不同的角度來分析本文：(一) 個體層次：美、中兩國領導者的態度對兩國在東亞區域下的競合產生的影響。(二) 國家層次：從國家政策的角度來看，美、中兩國對東亞區域的政策產生之議題競合。(三) 東亞區域各國，是如何回應美、中兩國在東亞區域議題上的競合。

### 壹、美國對東亞區域的政策與影響

#### 一、美國領導者的態度（個體層次）

自 1776 年宣布獨立後，以不到兩百年的時間快速成長，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與蘇聯分庭抗禮，成為全球唯二的超級霸權。<sup>24</sup>自此開始，有不少的學者認為，1940 年代開始，世界就處於「美國維持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情況之下。<sup>25</sup>所以，當蘇聯瓦解、中國崛起的後冷戰時期到來，美國勢必會重新思考美國在全球的戰略佈局，而筆者將用新古典現實主義來分析從冷戰末的雷根到後冷戰時期美國領導者對國際環境的認知與思考方式。

(一) 共和黨的雷根在 1981 年當選美國總統，他具有與共和黨黨綱一致的「反蘇」立場，他不時的會提到「認識蘇維埃帝國的企圖只是個起點」，他也同意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觀點，認為蘇聯

<sup>24</sup> 此處筆者用 Wallerstein 對「霸權」的定義。Wallerstein 主要根據某些特定的經濟指標——某一中心從而據此在生產、貿易和財政領域佔有了優勢。他將經濟潛在力——表現為經濟實力的高度集中——與贏得霸權的政治實力相互聯繫起來。引自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2004,《世界體系：500 年還是 5000 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35。

<sup>25</sup> Ronald Steel, 1957, *Pax Americana*. New York: Viking Press, pp. 15-27.

在與其他國家交涉時，只尊重對方的實力和決心。<sup>26</sup>雷根採取了具攻擊性和主動性的圍堵政策，並且，雷根支持那些反共和反蘇的國家，實施所謂「雷根主義」(Reagan Doctrine)的外交政策模式，這種作法被稱為是「全球圍堵政策」的再現。<sup>27</sup>對於美國在全球與東亞區域的領導地位來說，因為蘇聯的存在，更加突顯美國必須要掌控在東亞區域內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安全議題的發展，將國際局勢導向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追回上段所言，雷根在面對這樣策略佈局下，了解到與中國的交往勢在必行，唯有與中國建立起友好關係，共同應付蘇聯無止境的擴張，這樣才能防止中國與蘇聯的再次合作，危害到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利益。

(二) 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在上任後，憑著個人經驗與對中國的認知，與對雷根的中國交往政策的認同，持續進行與中國當局接觸的發展策略。而且，更進一步的，老布希希望中國能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夥伴而非競爭者，並藉此將中國當局引入國際社會體系的規範之下，老布希對中國的態度基本上就是延續雷根時期的政策，即與中國維持一個友善的關係並且藉著文化、經濟等軟議題來影響中國。<sup>28</sup>

(三) 對於結束 12 年共和黨執政的柯林頓政府來說，上任的首要問題乃是要解決長期以來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而他在選舉期間曾嚴厲批評中國的態度，在他當選後，開始面對政治現實下也隨之軟化。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上任後了解到，市場廣大的中國正是解決美國國內高失業率及經濟發展議題的一條明路。但與老布希政府不同的是，柯林頓政府與中國政府的「全面性交往模式」有個重要的前提，也就是希望：「中國在人權問題

---

<sup>26</sup> Backgrounder, 1982, *Reagan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Taipei: American Institution in Taiwan, pp. 1-15.

<sup>27</sup> Christopher Layne, 1985, "The Real Conservative Agenda," *Foreign Policy*, No. 61, p. 73.

<sup>28</sup> China Post, 1998, *U.S.-R.O.C. Relations Won't Change, AIT's Dean Says*. China Post. Nov. 10.

上必需要有重大的改進」。<sup>29</sup> 除了全方面交往之外，柯林頓政府後來將中美關係做了更進一步的強化，強調中美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應著重在長期性與全面性的關係，對於世界和平與穩定的議題以相互協商、長期合作、全面發展來解決全球性及區域性之間的問題。<sup>30</sup>

(四) 身為共和黨的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對外政策上則重新走向雷根與老布希的保守主義模式，但小布希的手段與前人相比之下粗糙許多，小布希在世界舞台上建立起「獨斷的單極體系」，<sup>31</sup> 也就是「以各種形式的干涉手段來介入其他國家的事務，不論這些國家接受與否」。<sup>32</sup> 小布希反對柯林頓政府時期所推動與中國在亞洲的「戰略夥伴關係」，他認為朝多邊主義發展的政策會影響美國的主權並削弱美國人的民族認同感與愛國心，進而影響美國在政治、經濟、外交上的利益。<sup>33</sup>

(五) 歐巴馬政府與前任民主黨總統柯林頓一樣，都必須面臨是否該走向現實主義的議題。而從他在 2009 年 11 月 16 日於上海復旦大學的演講中，可以發現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Jr.) 決定與中國維持戰略性夥伴的關係，就如同他在演講中提到了現在的中美關係不再是一場競爭的零和遊戲，而是一場相互合作的雙贏互動。<sup>34</sup> 另外，在面對全球議題的角度上，歐巴馬也認為美國

---

<sup>29</sup>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Executive Order, conditions for Renewal of 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94.

<sup>30</sup> 殷天爵，1999，〈中共大國務外交與夥伴關係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3 期，頁 82-90。

<sup>31</sup>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Wittkopf, 199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 170.

<sup>32</sup> *Ibid.*

<sup>33</sup> 張立平，2003，〈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保守思潮〉，任曉、沈丁立主編，《保守主義理念與美國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三聯書局，頁 153-154。

<sup>34</sup> "The jobs we do, the prosperity we build, the environment we protect, the security that we seek --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shared. And given that interconnection,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is no longer a zero-sum game; one country's success need no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another." 轉引自 The White House，<http://www.whitehouse.gov/photos-and-video/video/china-town-hall>。

該採取的是多邊互動模式，而不再是簡易的雙邊互動模式，與全世界互動而非單一國家，這樣才能符合未來美國在全世界的利益。

## 二、美國政府的角度（整體層次）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擺脫了早前所堅持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外交政策，為了與蘇聯競爭以及鞏固自身在全球的經濟利益，美國進入了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所謂的「全球外交政策」的時代。<sup>35</sup>之後幾年，美國國會均明確的指出美國的外交政策，除了維護美國的利益與安全外，並將加進自由、民主及人權等價值觀，目的就是為了與信奉共產主義的蘇聯一決雌雄，至此美國的外交政策正式走向現實主義的框架。<sup>36</sup>

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採取「圍堵政策」，目的是在東亞區域內採取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方式，而當時正好中國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與蘇聯關係惡化。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試圖與中國開啟合作的大門。隨著蘇聯解體、兩極體系的崩解，美國並沒有結束與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也未終結和中國在經濟、安全議題上的雙方交流，原因是透過政治經濟發展主導區域安全及全球安全的思考模式，已經深植於美國以及世界各國的發展策略中。

美國政府對未來的思維模式下，可分為幾個部分：<sup>37</sup>

（一）以「門羅主義」的宏觀架構，維持美國在西半球的絕對優勢實力。

<sup>35</sup> Bernard Mennis, 1971,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fficers: What They are and What They Believe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lumbu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 154.

<sup>36</sup> 胡福森，1989，〈美國的經濟外交〉，《美國月刊》，第4卷，第5期，頁76。

<sup>37</sup> 黃枝蓮，1995，〈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中美關係〉，《廣角鏡月刊》，第270期，頁40-43。

- (二) 對東大西洋及西太平洋建立絕對的海上優勢。
- (三) 透過海洋的聯繫建立美國產業和文化在全球的優勢地位。
- (四) 防止歐陸以及亞洲再次出現另一個絕對的支配力量，因為這將影響美國在全世界的利益。
- (五) 對維持美國高水平生活所需資源的獨佔，美國將獲得一定程度上的優勢。

簡單來說，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的外交政策是以「加強美國領導全球的作用」為主，因此不論是在歐洲還是亞洲，美國皆不斷的加強與各國之間的同盟關係、多邊的對話管道、以及務實的合作。

在 21 世紀初，美國遭遇了開國以來第一次在美國領土內的恐怖攻擊事件，其國際霸權角色的地位似乎開始搖搖欲墜，加上國內經濟的動盪，更使得美國政府決定透過加強與全球的夥伴關係，來恢復既有之國力，因此，歐巴馬上任後，將國家發展的重心從軍事轉移回經濟，安全的政策最高順位則被獲取財富利益所取代。歐巴馬也曾多次在對外談話中，提到和平、交流、溝通等，對議題的軟性運作方式，希望能以合作代替衝突。

## 貳、中國在東亞採取的政策與行動

### 一、中國領導者的態度（個體層次）

近代中國在「以黨領政」的政治思維下，領導者的意識型態、人格特質、理念、想法，均有一脈相承的感覺。尤其是在鄧小平之後，中國領導者的決策模式就以改革開放為主軸，其中會有些許的修正，但大多離不了這個框架。筆者將在下面分析近代中國

三位領導者的決策模式。

（一）當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實踐派，壓倒華國鋒「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凡是派後，鄧小平開啟了近代中國務實面對「當代全球化」的發展局勢。而在經歷「六四天門事件」後，鄧小平將發展重心從國內轉至對外發展，他務實的態度，自然也體現在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上，以經濟發展取代意識型態的對抗。

（二）江澤民則認為只要不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秩序，並藉由經濟全球化的機會大力發展經濟，中國應該可以走上一條平穩發展的道路，政權也可因此維繫不墜。<sup>38</sup>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正式將「全球化」定位為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依據：「面對經濟、科技全球化趨勢，我們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sup>39</sup>因此，中國此一時期的對東亞區域政策，也配合著全球化的發展做出改變。

（三）胡錦濤上任後再度提出要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則。一時之間，和平崛起儼然成為領導人闡述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要論述，甚至有凌駕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之勢。2005年的11月胡錦濤在聯合國大會演說時再次提到和諧世界的概念，2006年6月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會議，胡錦濤又有和諧地區、和諧亞洲等概念的說法，和諧於是變成是中國建構新

---

<sup>38</sup> 陳牧民，2006，〈當和平崛起遇上台灣問題：菁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中國大陸研究》，第49卷，第4期，頁12-14。

<sup>39</sup> 李忠杰，2002，〈十五大以來我國理論和實踐的重大突破〉，《人民文摘》，第9期，<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2086/7419/712262.html>。

外交戰略的重要核心概念。<sup>40</sup>

## 二、中國政府的角度（整體層次）

1990 年代初期，國際體系對中國經濟上的制裁相互解除，加上中國境內日益突顯的地緣及國內問題，促使中國加速了改革開放的腳步，其政策面也轉向以全方位開放的發展政策。中國積極鼓勵海外投資，在於有效利用國內外的「兩個市場」與「兩邊資源」。<sup>41</sup>換言之，中國的策略目標不僅是鞏固國內市場，更要經營、開發海外市場。加上蘇聯的解體，也對中國產生諸多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項。

（一）隨著蘇聯解體，民族議題跟著浮上檯面，尤其是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尋求獨立的問題，間接影響了中國內部政治的穩定性。另外，中亞地區豐富的石油利益，也成為中國所注意的目標。因此，蘇聯瓦解後的中國，採取「遠交進攻」的策略模式，壓制獨立份子、與他國建立夥伴關係，間接獲取石油，支持其本身的經濟發展。<sup>42</sup>

（二）在冷戰時期，聯美抗蘇的策略是中國在對抗蘇聯擴張與干涉時的一張王牌。但，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威脅論」，因此中國現在必須面對的是世界僅存的超級強權——美國。美國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將其影響力伸入東亞區域，而這正是中國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況。對此，中國在東亞區域勢必要維持與各國之互動以及與區域組織的關

---

<sup>40</sup> 王崑義，2007，〈中國的和諧外交與對南太平洋的擴展〉，《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3卷，第3期。頁65-69。

<sup>41</sup> 林慧如、李弘元等譯，木村福成、丸屋豐二郎、石川幸一等著，2004，《經略中國，布局大亞洲》。台北：經濟新潮社，頁25。

<sup>42</sup> 周建民，1995，〈中國如何面對下個世紀石油進口的難題〉，《戰略與管理》，第2期，頁22-25。

係，以防止美國對東亞的控制。

中國對後冷戰時期的認知，受到領導者鄧小平之現實主義國際觀的影響，將冷戰後東亞區域內的局勢，定調成要以創造「雙迎」為目的。而隨著中國近幾年的崛起，中國對外政策加入了「新安全觀」和「共同利益」的核心概念，<sup>43</sup>它們分別是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延伸。中國視東亞區域為新安全觀與共同利益的首要地區，積極參與建構工程，在確保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同時也確保了地區的安全與利益。而與西方各國的競合，則逐漸轉向為戰略夥伴的關係，以確保中國自身的利益與安全。

### 參、東亞區域各國的反應

首先，筆者將本篇所提及的「東亞國家」界定在包含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主要大國。主要是根據下列學者的論述而界定：首先，學者宋興洲在《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一文中，將「東亞」設定在包含東南亞國協的十國與東北亞的中國與日本。<sup>44</sup>以及學者陳峰君的著作《當代亞太政治與經濟分析論》中談到的亞太國家區分，其將「東亞」視為「小亞太」，這其中也包括了東北亞與東南亞主要國家。<sup>45</sup>另外，學者蕭全政認為，東亞區域存在著三種不同的區域主義型態，一個是以美國為首強調經濟全球化的亞太主義；一個是以東南亞國家透過政治自主性來強調諮商合作的東協主義；最後一個則是以中國與日本基於不同戰略考量的東亞主義。<sup>46</sup>筆者將綜合上述三位學者的界定，將本文所提的東亞區域各國分成：東協、亞太經合會組織以及日本，來做為探討美、中競合下對東亞區域國家（或是組織）的影響，及其回應。

<sup>43</sup> 李曉敏，2002，〈中國的新安全觀〉，《和平與發展》，第2期，頁45。

<sup>44</sup> 宋興洲，2005，〈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壇》，第24期，頁1-48。

<sup>45</sup> 陳峰君，1999，《當代亞太政治與經濟分析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31。

<sup>46</sup> 蕭全政，2001，〈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特色〉，《政治科學論叢》，第14期，頁201。

美國一直以來對全球安全議題有著強烈的控制慾，而且美國本身乃是東亞地區目前在出口貿易上最大的市場，有就是說，美國掌握了此區的經濟命脈，因此美國一直期望能在此擁有更多的掌控力，藉此影響東亞區域的未來發展。但是在由東協所主導的區域合作機制上，明確地將美國視為外來強權，因為，東協組織最大的理念是「維繫自身國家在區域內的自主性」。無論是美國或中國，東協都願意以和平共存的模式與之相處，但無論何方侵犯了東協組織會員國的主權獨立性，則東協會員國將會群起而攻之。以筆者的角度看來，東協組織內的各國都希望，透過與美、中兩國的合作關係提昇自身國力的發展，但前提是不因開發而喪失國家自主性。

而東協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則到了 1980 年代，由鄧小平所領導的「改革開放運動」後才有所好轉。在區域安全議題上，有鑑於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對立的影響，東協與中國在雙邊互動上仍呈現出兩種分歧，在共同利益上，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促使東協與中國意識到彼此之間，是有合作空間的。不過，對於經濟利益的競爭，中國國內市場龐大的商機，讓許多跨國企業紛紛將資金轉進，造成東協的外資流入減少；而中國進幾年來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成長驚人，促使東協擔心中國會因此擴充軍備，以武力解決領土糾紛，這對在南海與中國有領土糾紛的東協各國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壓力。

在國際體系中，處於弱勢的國家通常會藉由區域性組織的合作來增強本身的價值及影響力，但這種區域組織仍不是會受到來自主要強權國家的態度與政策影響。<sup>47</sup>而東協雖然一直想擺脫外來

---

<sup>47</sup> 朱景鵬，1999，〈區域主義、區域整合與兩岸整合問題之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8 期，頁 76。

強權的干涉，不過本身決策多少受到了美、中兩國政策的影響而做取捨，即便在國際場合上有足夠的份量，但在區域議題上與同為東亞區域組織的亞太經合會相比卻又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 第二章 冷戰期美國與中國在東亞的發展 政策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認為在德國確定會被擊敗的前提下，歐亞大陸將會出現新的強權與美國對抗，而這指的正是蘇聯。羅斯福對此主張「美蘇安全應建立在美、蘇的相互友好關係上」，意味著不只在軍事上美、蘇兩國必須保持著同盟的關係，在戰後的日子，美、蘇兩國更應該在經濟、文化、國際安全等議題上保持合作。羅斯福深信美國在戰後有擔負國際秩序穩定的必要性，而此舉必須得到盟國的支持才可能成功，因此在籌組世界政府並試圖維持權力平衡時，美國對蘇聯的友好態度過於理想化間接導致冷戰的產生。

到了冷戰前期，在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與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兩位現實主義者的眼中，如果要防止共產蘇聯的勢力擴大，就必須拉攏身處東亞並擁有廣大土地、人口與資源的中國。此舉一方面在防止中、蘇合流，二方面是要藉此獲得在東亞區域的戰略位置。因此，當時美國政府對東亞政策的階段性思考，主要是以如何拉攏中國，並取得在東亞戰略與地緣上的優勢為考量。<sup>48</sup>而到了1979年，美國總統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以及其後的雷根，體認到東亞區域的快速發展，將不再只是單純具有戰略與地緣價值的區域，更是美國追逐更廣大利益的市場，因此，美國對東亞區域的政策顯得更加積極。

而中國自建政後，以黨領政的基本政治思維與其他歐美民主國家大相逕庭。當我們在看待中國領導者如何制定政策時，應該考量到中國百年來的歷史經驗，會影響中國領導階層在決策時的

<sup>48</sup> 張亞中、孫國祥，1999，《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頁50。

反應，使得對外政策上往往會有強烈的民族意識。<sup>49</sup> 正因為如此，當我們觀察冷戰前的中國對東亞政策時，就必須思考到，國內民族意識高漲以及領導者自身意識型態做出的決策，是否符合西方政治學者們所認為國家政策皆是在尋求「利益極大化」的模式。

有趣的是，美國在意識型態的競逐中，從未放棄與中國建立雙邊互動關係的意圖，即便當時中國領導者毛澤東正在宣揚「打倒反動、打倒帝國主義」的意識型態，不過最終美、中兩國的關係仍逐步的正常化，而這也影響了往後在東亞區域議題競合的產生。筆者在此，將先以冷戰前美國與中國雙方領導者及政府在面對東亞區域議題上所作出的決策以及發展來做探討。

## 第一節 美國對東亞的政策

美國從建國之初，直到 19 世紀才與東亞區域有所往來，到了 20 世紀才「正式」處理有關東亞區域的議題，且當時對東亞政策大都與蘇聯有關。為了防止蘇聯霸權擴張，美國積極建設與東亞各國之間的關係，甚至企圖拉攏當時以蘇聯的指示馬首是瞻的中共。以近幾十年來的歷史發展觀察，大部分的人都會認同美國對中共有種特殊的期盼與憧憬。美國的對中政策，反映出美國政府以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對國際政經局勢的影響力、在區域內的地位以及其未來的發展。

### 壹、美國領導階層的政策

從尼克森開始，美國展開一連串與中國當局接觸的計畫。其原因是隨著冷戰的展開，世界被分成兩大集團，身為其中一方的

---

<sup>49</sup> John W. Garver, 199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pp. 4-8.

領導者，美國無法坐視蘇聯在歐亞大陸無止盡的擴張。5、60 年代的美國，曾希望以積極開放的態度影響中國與蘇聯的交往，再專注地圍堵蘇聯。<sup>50</sup>不過，美國的理想到了 60 年代末期，才因蘇、中關係的惡化有得以實現的機會，這也使得直到尼克森時期，美國領導者才有機會與當時的中國領導者進行對話，並在談論東亞區域議題上維持彼此的友好互動關係。本節將從此出發，探究冷戰前美國領導者及政府受中國影響後，對東亞區域做出的決策。

## 一、重啟溝通的尼克森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積極介入東亞區域事務，當時的美國思索著在戰爭結束後如何維持美國在東亞區域內政治與經濟利益的想法；特別是，如何將經貿利益、政治勢力以及軍事戰略佈署，整合在「自由民主」的大纛之下，這一切的戰略思考成為了美國東亞區域發展的重心。

在冷戰時，美國總統尼克森曾試圖藉著撤出越南戰場與聯合中共對付蘇聯，來因應對美國漸趨不利的東亞形勢。尼克森首先在 1969 年 7 月的關島宣布著名的「關島宣言」(The Guam Doctrine)，主張以談判取代對抗來解決共產和非共產集團之間的衝突，表明美國將自東亞撤軍，東亞各國必須自行為區域內的利益奮鬥。<sup>51</sup>此聲明造成了兩大作用：第一，此舉抑制了美國國內的反戰浪潮，讓尼克森下跌的聲望止血。第二，提出全球性的「尼克森主義」，以「低盪」(détente)的方式取代過去的對抗政策。<sup>52</sup>

1969 年 1 月，尼克森在就職演說中間接向中國表明雙邊對話

---

<sup>50</sup> George F. Kennan, *The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94-119.

<sup>51</sup> Richard Nixon, 1996,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p. 394-395.

<sup>52</sup> John Spanier, 1985,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Texas: The Dryden Press, p. 174.

的意願，他說：「讓一切國家知道，在本人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sup>53</sup>也曾在 1969 年 8 月 14 日的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上，表明：「蘇聯是更具侵略性的一方，如果任憑中國在中、蘇戰爭裡被摧毀，這將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事後，尼克森要求季辛吉將他的態度傳達給莫斯科當局知道美國在中、蘇問題上的立場。<sup>54</sup>尼克森執政期間，以「交往促進改變」積極尋求溝通的方式影響中國領導者的思維，並藉機分裂中、蘇之間的關係。當尼克森在 1972 年首次訪問中國，就曾引用毛澤東的詩句：『多少事，從未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來形容中、美破冰之旅。

事實上，與其他身處冷戰時期的美國領導者不同，尼克森並未將圍堵政策作為他對蘇聯與中國的第一首選。相反地，他寧願選擇與共產國家進行雙邊談話，促使那些共產國家改變對外政策。而對東亞區域內諸國，尼克森就職後也一一拜訪，並在出訪前先行解除對中國貿易和往來的限制，尼克森再次向世界表達，應該接受共產國家的存在，而非選擇對立。其後，尼克森透過訪問羅馬尼亞時，與其總統賽奧斯庫(Nicolae Ceausescu)說：「……美國反對蘇聯提出的亞洲安全體系，在亞洲區域內建立反中國的小團體是錯誤的決策。……美國的政策是與中、蘇兩國都建立良好的關係。」<sup>55</sup>

在多方努力下，尼克森打開了對外緊扣已久的中國大門，而且並未加深與蘇聯之間關係的惡化，相反地，雙方反而更加深入

---

<sup>53</sup> 引述自 The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http://www.whitehouse.gov/about/presidents/richardnixon>。

<sup>54</sup> 陳毓鈞，1994，《尼克森與美國的對華政策》，〈美歐月刊〉，第 9 卷，第 6 期，頁 20。

<sup>55</sup> 同註 51。

地了解；另外，美國對北越的和談也有若干進展，美軍逐步的撤離越南戰場。最後，在 1984 年，尼克森出版「真正的和平」(Real Peace)一書，他述說著他的理想，尼克森認為持久的和平架構必須建立在裁減軍備、經貿交流、領導人之間的友誼以及世界政府藍圖的基礎上。<sup>56</sup>因此，他對於蘇聯、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都希望以溝通與互動的方式去影響該國的整體運作，進而推展到整個東亞區域的政治發展。

## 二、承先啟後的福特

1974 年，美國與中國都受到國內政治局勢震盪的影響，使得雙方的交往關係產生歧變。美國，日後著名的水門事件(Watergate)使得尼克森聲望大幅下挫並受到國會的彈劾，<sup>57</sup>水門案的發展超乎美國民眾所預料，尼克森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決定提前辭職，由副總統福特繼任。<sup>58</sup>福特是美國史上第一個未經選舉而產生的總統，他體認到在剩下來的任期中，他的主要任務是領導美國人民重拾對美國政府幾體制的信心、並增進人民對國家的團結度以及平穩的做完剩下來的任期。<sup>59</sup>

在尼克森 8 月 9 日離職當日下午，對外交事務並不熱衷的福特，特意會見了蘇聯駐華府大使，亦與中國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鎮見面，保證美國對華政策不變，強調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仍是美國現在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同時，他請季辛吉透過駐台北大使傳達美國對中華民國的一切保證絕不改變，並保證堅守一切的條約承諾。<sup>60</sup>1974 年 4 月，中南半島高棉、越南、寮國陷共，美國狼

<sup>56</sup> Richard Nixon, 1984, *Real Peace*. New York: Little, Brown & Co., pp. 1-14.

<sup>57</sup> Henry A. Kissinger, 1982,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 100.

<sup>58</sup> 同註 51，頁 400-432。

<sup>59</sup> 引述自 The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 Gerald R. Ford*,  
<http://www.whitehouse.gov/about/presidents/geraldford>

<sup>60</sup> Anatoly Dobrynin, 1995, *In Confidence*. New York: Times Books, p. 324.

猥的撤離中南半島，這顯示出之前尼克森所希望的越戰越南化徹底的失敗（但不代表美國希望在東亞區域之盟友自行負責的企圖失敗）。<sup>61</sup>福特為防止骨牌效應，並安定盟邦對美信心，自同年 5 月起，連續與亞洲及歐洲的盟邦舉行會議，向各國宣示美國的支持並未改變。

整體而論，在福特兩年任期內，美國在東亞區域內的勢力變化相當快。隨著中南半島以及越南戰爭的失利，美國對東亞區域的影響力也逐漸降低。但正因為如此，區域安全議題的形成，使得美、中之間的關係出現日趨熱絡的現象。

### 三、確立關係正常化的卡特

卡特時期的白宮政治圈，力主聯中制蘇者，首推國家安全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他從來不隱諱他的觀點：美國對華政策，在華府與莫斯科之間的全球鬥爭中，是一極有力的棋子。他在自傳《權力與原則》“Power and Principle”中提到：『對華政策的蘇聯層面是「可想、不可說」的一種考量。我本人也時時在思量它的價值，但是我也明白，在公開的場合仍必須以信誓旦旦的口吻，宣稱美中關係的正常化與美蘇敵對毫無關係。』<sup>62</sup>卡特上任後，表現出對過去「季辛吉式」的外交方式感到不滿，但由季辛吉帶出來的一批專家們直到 90 年代前都仍未美國政府提供對華政策方針，因此季辛吉的影響力其實在卡特主政時期仍未見衰弱。<sup>63</sup>

---

<sup>61</sup> 同註 57，頁 164-167。

<sup>62</sup> Zbigniew Brzezinski, 1983,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p. 293.

<sup>63</sup> James H. Mann, 1999,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Inc, pp. 79-80.

雖然卡特在上台初期與冷戰時期大多數總統一樣，認為與共產國家交往會有玩火自焚的可能，但與其坐著浪費時間談判不如利用共產國家間的矛盾分化他們。不過，在布里辛斯基不斷的遊說下，卡特最終仍逐漸傾向接受布里辛斯基的觀點，並在 1978 年 3 月同意讓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出訪北京。<sup>64</sup>

實際上，卡特在 1978 年就已經確立要將美、中關係正常化，徹底解決長久以來停滯不前的美、中關係。因為在同年春季，中共與越南衝突日益升高，而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積極地在中南半島擴張其勢力，同時，阿富汗發生政變，親蘇政權當政，美、蘇勢力的消長也越見清晰。<sup>65</sup>因此，兩國最終在 1979 年 1 月 1 日建立外交關係，同年 12 月 15 日，卡特正式宣佈美、中兩國達成建交協議，而往後被世人所重視的中國人權議題則被拋在腦後。<sup>66</sup>

卡特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是一項更重大的突破，也與美蘇之間的冷戰局勢有密切的關聯性。這是從尼克森開啟門戶以來，就討論過的要擴大對華貿易政策。在 1979 年時，出訪美國的中國領導者—鄧小平—開始積極渴望取得最惠國待遇。而同年夏天，卡特正式向國會提出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議題，將往後十年的美、中經貿議題綁在一起，使中國成為美國在亞太區域的可靠夥伴。<sup>67</sup>

#### 四、全球圍堵政策的執行者—雷根

在 1981 年，共和黨的雷根成為美國新任總統，反共與保守是

---

<sup>64</sup> Cyrus Vance, 1983, *Hard Choi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p. 13-44.

<sup>65</sup> In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80, *China: U.s. Policy Since 1945*.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pp. 235-237.

<sup>66</sup> 同註 63，頁 139-145。

<sup>67</sup> 同註 63，頁 152-154。

他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他曾經主張「認識蘇維埃帝國的企圖只是個起點」，他也同意英國首相邱吉爾的觀點，認為蘇聯在與其他國家交涉時，只尊重對方的實力和決心。<sup>68</sup>雷根的手段比起前任總統卡特來的更加具有攻擊性與主動的精神，再加上一連串對共產蘇聯的批判，因此有人稱雷根開啟了一場對蘇聯的「新冷戰」(New Cold War)。<sup>69</sup>雷根主張到：「應該透過實力爭取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蘇聯在軍力上的成長、在東歐的擴張以及對東亞區域的影響（那些信奉共產主義的國家：中國、北韓、越南、緬甸...等），是美國與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安全的最大隱憂。<sup>70</sup>因而，雷根在首任任期內曾說過：「對於那些自由之敵人、潛藏的對手，我們將提醒他們，美國人民的最高希冀是追求和平，我們為它談判、為它犧牲，但是我們不會為它屈服於邪惡的敵人之下。」<sup>71</sup>

雷根外交政策中的主要論點「將國家軍事力量能有效地轉換成政治與外交力量。」因此從1982年起，美國政府為此大幅增加國防支出，<sup>72</sup>希望能以堅強的軍事實力換取全球的和平以及美國在全球的利益。他採取了被後人稱為「雷根主義」的外交決策模式，重現了「全球圍堵政策」。<sup>73</sup>雷根透過外交、政治、軍事、經濟等各種手段，支援並鼓舞世界各地的「自由鬥士」起身反抗蘇聯所扶植的共產主義政府。例如：出兵援助阿富汗、高棉、尼加拉瓜...等地區。雷根在此表現出堅決的「反蘇」決心，此舉也的確形成蘇聯勢力擴張上的阻礙。

---

<sup>68</sup> 同註26。

<sup>69</sup> Jeff McMahan, 1985, *Reagan and the World: Imperial Policy in the New Cold Wa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223-242.

<sup>70</sup> Backgrounder, 1982, *U.S. Military Strategy Aims to Deter Conflict*. Taipei: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pp. 1-11.

<sup>71</sup>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譯，1984，《美國歷任總統就職演說集》。台北：黎明文化，頁488。以及 The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http://www.whitehouse.gov/about/presidents/ronaldreagan>

<sup>72</sup> Caspar Weinberger, 1986,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Y 1987*.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313.

<sup>73</sup> 同註26。

## 貳、美國政府對東亞政策

從 1960 年代起，東亞區域內各國開始去殖民化，並著手展開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運動。為了追求國家穩定繁榮的發展，區域環境的安全就成為這些國家發展的關鍵。但很不幸的，和平總是不容易到手，東亞各國在受到共產黨以及種族分離主義的威脅下，飽經動亂之苦，而美、蘇兩國的競爭，更是讓東亞區域可能成為下一次大戰爆發的地點。

### 一、政治層面

就美國在東亞區域的政策佈局而言，除了防止區域性的霸權崛起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維持東亞區域內政經環境的穩定並能適時掌握其變化。不過，這只不過是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一小部分，由於美國在冷戰時期實行「重歐輕亞」的戰略佈局，使得東亞地區長期以來缺乏類似北約的軍事安全組織，造成東亞地區一直是美國全球戰略上較為薄弱的一環。<sup>74</sup>

對於東亞區域，就如同前文所提到的，在尼克森與季辛吉這兩位現實主義者眼中，拉攏中共完全是戰略因素以及地緣政治上的考量。1972 年 2 月 28 日，美、中兩國簽署「上海公報」，全文一半以上都是針對各自的意識型態、國際事務政策、越南和台灣問題的各自表述。但是，雙方在反對霸權干涉他國政治上有著相同的共識：「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太區域間謀求霸權，我們任何一方都反對任何國家或是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勢力。」<sup>75</sup>這樣的

---

<sup>74</sup> 王崑義、呂炯昌著，2008 年 6 月 22 日，〈從環太平洋軍演看美國亞太戰略轉變〉，《青年日報》，韜略談兵版。

<sup>75</sup> 引述自 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1972, in Shanghai,

表述，清楚的向蘇聯宣告，美國與中國皆不會與蘇聯合作，雙方結盟的意義就是阻止蘇聯在歐亞大陸間的擴張主義。從中我們可以體認到，美國自始至終都不曾將中國看成實際上的敵人，因為兩國之間並未有絕對性的對立因素，因此美、中關係的發展透過此公報的簽署，開始步入正軌。

雖然，美國與中國在 70 年代重新進行交流與互動，但對美國來說，東亞區域內的和平仍是一股隱憂。因為東亞區域並未成立類似北約組織的集體防衛機制，也沒有一個擁有實質力量的區域組織能制裁危害區域和平的國家，更甚者，二戰後對世界和平最大威脅者就身處於東亞，使得東亞區域內無法享受到二戰結束後的和平。東亞國家的經貿互動在未來會越加熱絡，可是，從二戰結束後產生的區域性衝突仍如潮水般不斷侵蝕著那渺小的區域團結，南海地區、朝鮮半島、以及臺海問題，這三個地方被視為東亞區域內的火藥庫，而這些地方也涉及到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友邦以及中國在此的各種利益。

爾後，因為受到「水門事件」影響而下台的尼克森時代結束，其繼任者福特也一再的向中國表達美國政府對中國之承諾不會改變，不過受到越南戰爭越南化失敗的影響加上當時美國國內經濟情勢不佳、人民反共意識劇升、以及對中華民國外交承諾的壓力，使得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急迫性降低。在此一時期，美國政府主要將關注焦點放在中南半島的戰爭以及對歐洲盟友回應，簡而言之，美國在東亞區域內吃了一場大敗仗，而這個時候正是應該安撫盟友並穩住陣腳的時候。

在美國政府推動與中國政權正常化的同時，於 1978 年秋季，

---

[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uploads/images/yJIG2IXkWU8gk1uq4Cx1tw/1972\\_Joint\\_Communique.pdf](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uploads/images/yJIG2IXkWU8gk1uq4Cx1tw/1972_Joint_Communique.pdf)。

美國政府也開始了對越南關係的正常化，與取得越戰勝利的河內政府，進行一系列的會談。不過，美國在此的進展受到來自蘇聯與中國兩方的阻礙，其一，蘇聯確定將在越南建立軍事基地，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稱越南是「蘇聯的代理人」，並且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也提出與越南建交會波及美國與中國的往來。<sup>76</sup>其二，中國與越南之間的種族衝突又在此時爆發，美國被迫選邊，結果是，美國選擇即早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

## 二、經濟層面

從當時的美國政府的觀點看來，東亞區域內過於複雜的語言、宗教、文化、人種、政治、經濟、意識型態與價值觀等面象，使得東亞地區並沒有機會整合成一團結的區域組織，更遑論產生所謂的「區域意識」。<sup>77</sup>然而，隨著國際政經體制利害關係的改變，以美元與黃金為匯兌本位的固定匯率制度，因之前美國大力支持西歐友邦的軍備實力及經濟基礎，造成美國本身的收支逆差迅速惡化，美國對此不得不降低在東亞區域的軍事支出，減少對國內經濟的負擔。

在此狀況下，東亞各國開始建構一個能加速地區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並藉此對抗共產主義與種族分離主義的組織。例如：在 1967 年成立的東協組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 ASEAN)，當時只是一個美、蘇冷戰下，受美國支持產生的反共產主義聯盟。在 1972 年美國正式與中國建立邦交之後，東協各國成員也陸續與中國建交，解除對中貿易禁令，開始轉向加強區域內經濟、環保等領域的合作。其中，東協組織受到來自國

---

<sup>76</sup> 同註 63，頁 129。

<sup>77</sup> Gerald Segal, 1990, *Rethinking the Pacif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85-86.

際強權、國際意識型態與權力鬥爭的影響甚深。<sup>78</sup>美國對東亞區域做出的策略，往往讓美國政策成為影響東亞各國自身對外政策裡舉足輕重的一環，就好比東協的例子，名義上是反共，實際上卻仍是受來自區域外強權——美國——的影響改變了原本的對外戰略，進而與身為共產主義國家的中國進行外交互動。

儘管後來部分東亞國家從冷戰至今有著高度的經濟發展成就，但各國領袖們在區域整合的議題上卻顯得相對沉默，如同筆者在前文提到的，這或許是因為東亞區域內過於複雜的態勢造成東亞區域主義遲遲未能形成的原因。東亞地區內部看來似乎長期存在高度的經濟聯繫與互賴性，<sup>79</sup>而東協在 1979 年所締結的優惠貿易協定，則象徵了次區域整合方面的突破。就某些角度來看，這次區域整合成功的條件，就是因為外來強權對東南亞帶來的政治影響，美國曾試圖阻止任何單一國家崛起，或抵制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整合倡議，以便保護美國在此的戰略與經濟利益。<sup>80</sup>

## 第二節 中國對東亞區域政策

在探討國際關係理論時，如果我們依照華茲(Kenneth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來看，我們應該把研究重點放在國際體系及結構研究，並主張國與國之間會因為相對利益而平衡而不得不對抗權力的集中，相對的，個人與國家層面的討論即被認為無法影響或改變一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sup>81</sup>但事實上，在觀察中國或是某些東亞國家，結構現實主義可能無法解釋這些國家的崛起與改變。接

---

<sup>78</sup> Richard Sokolsky, 2000,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 Los Angeles: Rand Corporation, p. 44-46.

<sup>79</sup> Wei Kiat Yip, 2001, *Prospects for Close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California: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p.106.

<sup>80</sup> Ted G. Carpenter, 1998, "From Intervenor of First Resort to Balancer of Last Resort," in Selig Harrison and Clyde Prestowitz, eds. *Asia After the Miracle*.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p.294.

<sup>81</sup> 張亞中，2003，《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頁 20-21。

下來，筆者將以中國的第一位領導者：毛澤東開始，這位將戰後中國改造成共產主義實驗場的共產主義者，如何憑藉著自身的魅力與政治手腕替中國近代外交政策決定方向；以及近代中國領導者中，受過幾次政治鬥爭卻未失去其在政治舞台上光環的鄧小平。以這兩位領導者出發，探討中國在美、蘇冷戰之際，如何從兩大強權手中掘取符合中國的利益。

## 壹、中國領導階層的對外態度

在決定國際關係的重要因素中，往往會強調政治菁英的特質、價值觀念以及意識型態的重要性，來做為剖析國家決策產生的原因。而在研究中國對外關係時，中國領導者的理念想法與意志，時常是關鍵的因素。而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筆者將在此就個體層次上先行探討影響中國最深的毛澤東，以及之後鄧小平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前的對外態度，來做探討。

### 一、毛澤東時期的對外政策

在兩極體系對立的情況下，毛澤東依意識型態將世界體系劃分為以美國為首的反動帝國主義，以及以蘇聯為首的進步和平民主陣營。毛澤東進一步確立「帝國主義稱霸世界的年代，已由社會主義的蘇聯的成立，以及整個和平民主陣營的團結，而永遠宣告結束了。」<sup>82</sup>為反應對當時世界體系的認知，毛澤東在 1956 年還再度重申中國不能當騎牆派，並且美國帝國主義是不可靠的政權。<sup>83</sup>

筆者在此將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的對外政策分為三個時期：

<sup>82</sup> 毛澤東著、人民出版社編，1991，《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50-51。

<sup>83</sup> 廖光生，1988，《排外與中國政治》。台北：三民，頁 134。

(一) 聯蘇反美，「一邊倒」政策(1949-1960)；(二) 反蘇反美階段(1960-1969)；最後，(三) 一條線，聯美反蘇，拉攏第三世界(1969-1976)。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二十七年間，毛澤東獨攬大權，周恩來則是毛澤東在外交事務上最忠實的幫手與執行者。在他當政期間，中國的所有政策都憑藉著其個人意志加以左右，使得中國在他統治的二十七年内，內政與外交都呈現高度的不穩定狀況。

### (一) 聯蘇反美，「一邊倒」時期(1949-1960)

在 1949 年，毛澤東對中國外來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三項方針：「另起爐灶」、「打掃屋子乾淨再請客」、以及「一邊倒」。1.另起爐灶：中共將全盤否認由舊政府（國民黨政府）所承認的所有對外政策、條約與關係。中共自身將重新定義對外關係與政策取向。2.打掃屋子乾淨再請客：清除國內反動勢力，保持政治意識正確。3.一邊倒：毛澤東的政策突顯了中共在取得政權之際，對蘇聯的支援過分依賴的事實。他在 1949 年 6 月 30 日所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白的指出，要在國際社會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對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當然，這指的就是從抗戰期間不斷給予中共實質利益的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共產國家。

毛澤東在獲得政權後，必須化解新政府成立後接踵而至的問題。第一：他必須面對正常而傳統的國際慣例：「新政權應承擔舊政府與外國之關係」，毛澤東在上台後試圖全盤否認此一慣例，並向列強要求，若要與新政權下的中國建交必須要有新的政策。<sup>84</sup>毛澤東希望能擺脫過往中國所受的若干不平等待遇，這不但是因為個人思想使然，也是整個民族主義情緒沸騰下所產生的決策。第

---

<sup>84</sup> 謝益顯主編，1997，《中國當代外交史》。北京：中國青年，頁 3-4。

二：毛澤東上任後，開始大力肅清異己，特別是國民黨殘黨。為的就是安穩國內局勢，並豎立個人威信，達到思想統一。第三：在國內政治以及對外政策的中心思想上，毛澤東成為蘇聯在東亞區域內宣揚共產主義的先鋒，毛澤東對共產主義的強烈信仰，影響了中國在 40 年代末期到 60 年代的政策取向。

除了毛澤東的三條方針外，作為中國外交策劃者的周恩來也在 1952 年 4 月以一篇「我們的外交方針與任務」，再加上「禮尚往來」（對資本主義採取被動策略）、「互通有無」（對外接觸，一律以平等主義為主）與「團結世界人民」（聯合第三世界國家）等方式，<sup>85</sup>顯示雖然現階段中國採取「一邊倒」政策，但對未來與世界各國合作仍有保留空間，並非一味的排斥非共產國家。

而毛澤東面臨的第一個外交挑戰，就是在 1950 年 6 月下旬爆發的朝鮮戰爭。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這是一偶然事件，卻誘發了反革命的再興，威脅到毛澤東與共產黨在國內的威望。雖然當時毛澤東並沒有介入戰爭的打算，但是當支持南朝鮮的美軍節節進逼並威脅到中國東北方邊界時，毛澤東才派遣軍隊與美軍一戰。儘管這場戰爭，對中國的經濟來說無疑又是雪上加霜，但在政治層面上卻激起了中國人民對政府的支持，「抗美援朝」變成了一場鞏固毛澤東政權的意識型態戰爭。而這場戰爭的勝利，也實現了毛澤東在 1949 年自豪的宣言：「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欺侮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sup>86</sup>

在毛澤東剛取得政權的第一個時期，中國的對外政策是貧乏的。在經歷了 30 年戰火的洗禮，毛澤東不得不以先安內為主，推

---

<sup>85</sup> 同註 4，頁 51。

<sup>86</sup> 毛澤東，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演講》。

行政改革、加強本身統治權的正當性。而中國明顯的意識型態，使得當時的東亞區域國家在美國的影響下，皆不願、也不敢與中國有任何政治或經濟上的接觸，毛澤東本身也對那些「反革命的帝國主義國家」有所排斥，因此，在整個 60 年代，中國對東亞區域的政策除了援助信奉共產主義的北朝鮮外，並無其他的建樹。

## （二）反蘇反美階段(1960-1969)

相對於與美國對立的緊張氛圍，蘇聯自 1922 年成立後，即對中國採取相對友善的態度。在民國創立之初、抗戰期間，中國受到來自蘇聯的友誼，<sup>87</sup>即便受到國民政府剿共的影響，蘇聯仍對中國有著不同於其他西方國家的關注。而中共能在 1949 年奪得統治權，蘇聯的幫助實功不可沒。因此，中共與蘇聯在 1950 年 2 月 14 日簽訂「中蘇友好互動條約」，其主要內容包括：締約國雙方保證共同採取一致的必要手段，防止日本或其他與日本有任何勾結的國家對東亞區域和平的侵犯。<sup>88</sup>同時，中國向蘇聯借貸約 12 億盧布的貸款，允諾中、蘇可以共同管理中長鐵路以及使用旅順、大連，並在資源採集方面積極與蘇聯合作。<sup>89</sup>

但是，好景不常，造成中、蘇之間的分裂絕非一朝一夕，或許從中國建政之初，就埋下了在 60 年代後期中、蘇分裂的事端。就中國方面的立場來看，雖然中國的成立是倚靠蘇聯的支持而產生的結果，但是這種倚靠對中國來說或許只是一種防止腹背受敵的手段，<sup>90</sup>大量的物資支援以及中、蘇長達數千公里的邊界安全以及種種國際環境制約，使得中國不願在成立之初與蘇聯發生齟齬。

<sup>87</sup> 傅啟學，1987，《中國外交史》。台北：商務，頁 542。

<sup>88</sup> 引述自人民日報，1985 年 2 月 15 日，〈中蘇兩國關於締結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協定公告〉，人民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5/content\\_2336329.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5/content_2336329.htm)。

<sup>89</sup> 張光，1995，《中國的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 15-16。

<sup>90</sup> John Gittings, 1974, *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 150.

毛澤東很清楚當時蘇聯的領導者——史達林——只不過是將中國當作蘇聯在東亞區域的代理人，史達林並非真正支持中國的所作所為，也並未承認毛澤東在中國的領導地位。<sup>91</sup>毛澤東與史達林之間的關係，如同學者盧子健所言：『中國在 50 年代與蘇聯關係的全面發展，主要由於國家安全與戰略利益考量，到後來鬧翻，主要亦是源於這方面的原因。』<sup>92</sup>而韓戰的爆發，是毛澤東在 60 年代與蘇聯決裂的起火點。蘇聯在戰前未與中國研議討論，等到美國大舉入侵，史達林才又對毛澤東施壓要求其支援，縱使中國本身也有出兵的理由，但戰前的忽視、戰爭中的援助未兌現以及戰後殘局的收拾，都令當時的中國對蘇聯相當不滿。

之後，隨著史達林過世、赫魯雪夫上台，中、蘇之間的裂痕更加明顯。因為，赫魯雪夫對史達林意識型態的修正、與中國在領海主權上的爭議、在「布加勒斯特會議」公開批判毛澤東，當場撕毀過去與中國簽訂的多項協定，並要求駐中的技術人員撤離，這種行為激怒身為中國領導者的毛澤東，蘇聯甚至更加火上加油地在中國邊界挑起紛爭。<sup>93</sup>這些舉措促使毛澤東從 60 年代開始，對蘇聯現行的修正主義進行一系列的批判，並在對外政策上開始走出自己的路，不再依靠蘇聯的指示。

在受到兩強夾擊的情況下，毛澤東提出「既反帝又反修」的左右開弓政策，同時與美、蘇兩強對抗。以當時中國內部經濟動盪且政治領導階層意識分歧的情況下，毛澤東此舉可說是引火自焚，中國此時並沒有與任一強權對立的實力，但自比為史達林的毛澤東卻希望藉此策略與當時的蘇聯政權劃清界線，發動「文化

---

<sup>91</sup> John. K. Fairbank and R. Macfarquhar, 1987,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p. 278-279.

<sup>92</sup> 盧子健，1990，《一九四九以後中共外交》。台北：風雲出版社，頁 22。

<sup>93</sup> 尹慶耀，1973，《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頁 30。

大革命」以強化自身在共黨國家間的威信與對國內的政治影響力。<sup>94</sup>最終，60年代中國的對外關係在一片腥風血雨中渡過。

### (三) 一條線，聯美反蘇，拉攏第三世界(1969-1976)

經歷了60年代的政治動盪，此時中共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對內，紅衛兵的動亂，雖然替毛澤東排除異己、穩定毛的權威地位，但是大量人才的消耗成為不容抹滅的事實；對外，蘇聯對毛澤東政權的警告，從60年代末期，甚至差點因蘇聯出兵捷克而引爆戰火。<sup>95</sup>蘇聯新上任的總理，布里茲涅夫一改過去蘇聯對外的態度，強調「緩和緊張」的國際政策，引起東歐附庸國的加強獨立性的聲浪。此舉威脅到蘇聯「民主集中制」的理念，更威脅蘇聯統治共產集團的合理性，而率先提出必須根除「以黨領政」的現象，推行社會主義民主與公民自由權的捷克成為布里茲涅夫主義下的犧牲品。<sup>96</sup>

中、蘇雙方的僵局一直持續到1975年蘇聯邊界談判代表造訪北京後，才逐漸緩和。但這十年來的裂痕讓毛澤東明白到自身能力的不足，對外關係上不能只靠意識型態的政策，必須回歸理性外交。而在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的造訪，促使冰封二十年的美、中關係得以正常化，毛澤東借此修正「反美反帝」策略，改以「聯美制蘇」來彌補中國過去對外關係的不足。<sup>97</sup>

毛澤東在獲得與美國重新建立友好關係的機緣時，並未放棄與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友好關係。毛澤東在具體作為上仍以支持中南半島的越南、柬埔寨等國，以物資與人力對抗美國的干預。再

<sup>94</sup> 松本一男，1993，《毛澤東評傳》。台北：新潮社，頁228。

<sup>95</sup> John Mason, 1996, *The Cold War, 1945-1991*. New York: Routledge, p. 112.

<sup>96</sup> 同註31，頁148。

<sup>97</sup> 同註54。

以聯合印尼等國，在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議上拉攏第三世界國家。<sup>98</sup>又在1971年「順勢」邀請美國進行「乒乓外交」，並隨著季辛吉的密訪，向美國表達現在中國的對外政策具有理性與彈性，並不再以意識型態來規劃對外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利益。雖然在1972年簽署「上海公報」後，中、美兩方仍對各自的意識型態、國際事務政策、越南和台灣問題的看法仍有不少的衝突，但毛澤東認可美、中關係正常化的發展、並願意共同減低國際衝突的可能，以及反對任何霸權的建立。<sup>99</sup>

而就在1971年中共取得聯合國席次之後，適逢美國取消固定匯率引起債務危機，1973年的石油危機更是重創全球經濟；為防止可能出現的國際衝突，聯合國除在1974年召開特別聯大會議，在1975與1977兩度召開「國際經濟合作會議」(CIEC)，回應那些發展中國家之要求。毛澤東政權利用此機會向所有第三世界國家招手，他在1974年說到：「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sup>100</sup>

毛澤東執政二十幾年來對外政策的改變，雖然大部分的時期仍脫離不了受意識型態而左右外交政策的發展，不過仍有其脈絡可依循。他最主要在想的是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並隨著國力的增長能在國際舞台中佔有一席之地，而不再是過去百年來被外強所欺壓下的弱國。在學者界定的第三時期下我們更可以發現，毛澤東開始擺脫蘇聯的掌控，並利用美國在70年代對中國積極交往的態度，來重新建立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隨著中國在

---

<sup>98</sup> 同註 79，頁 258-265。

<sup>99</sup> 同註 70。

<sup>100</sup> 同註 77。

1971年正式進入聯合國，並受到世界各國快速的承認，毛澤東在他執政生涯的最後幾年中達成了他的理想，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終於躍上了世界的舞台。

## 二、以實踐檢驗真理的鄧小平

中共政權自毛澤東過世以後，鄧小平派出胡耀邦在1978年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sup>101</sup>對教條主義與理論專制主義進行否定，以此瓦解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以及其權力基礎，更進一步瓦解毛澤東思想對中國政治的長久影響力。

自鄧小平逐漸掌握權力後，針對中國經濟議題及意識型態的發展提出兩個方向的修改。其一，為解決國內經濟問題，鄧小平於1979年決議在廣東與福建等省份成立「經濟特區」，並於1980年立法通過，將這些地區當作實驗經濟改革的基礎。第二，在意識型態方面，為了擺脫過去的陰影，鄧小平提出「黑貓、白貓，論」，藉以調整中國在「大躍進」後面臨的困境。這是因為他務實的面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藉著解決經濟危機來維持他在人民心中的支持度以及在黨中的威望。他認為許多經營方式可以被資本主義運用，也定能被社會主義所運用；「市場」是一種手段，任何主義都能享受到它帶來的好處。<sup>102</sup>

以上述精神為基礎，鄧小平提出中國必須實行四個現代化，分別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與科學技術現代化。這是他所認為適合中國國情的「三步走」經濟發展策略：第一步，

---

<sup>101</sup> 原文載於1978年5月10日《理論動態》第60期，次日於《光明日報》登出，5月12日繼續於《人民日報》與《解放軍報》等轉載。由此可看出，到1978年鄧小平以掌控了大部分的黨政媒體，其聲望已非華國鋒可比擬了。

<sup>102</sup> 黃清賢，2006，〈全球化背景下轉化中的中共意識型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7卷，第4期，頁23-25。

從 80 年代開始加強國民生產總值，解決人民生活問題；第二步，在 20 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的生活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紀，能使中國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之水準。<sup>103</sup> 不論輿論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結果的評價如何，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經濟發展上的思想解禁，連帶影響了中國對外關係的取向，因為不再以「意識型態」作為對外發展的基礎，中國從鄧小平時代起的對外政策更顯靈活。鄧小平曾說：「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於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與意識型態的差別，並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予以尊重，平等對待。」<sup>104</sup> 同時，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也說到：「後冷戰的時代，各國都更多地按照本國利益而不是冷戰時期的聯盟關係來確定外交戰略，並調整與他國關係。」<sup>105</sup> 這些發言顯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以更重「現實」及更為「理性」的作法來修正及重塑外交策略。這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是個良好的利基點。

80 年代初，鄧小平將毛澤東的「一條線」修正為不結盟的戰略思想。他解釋到：「我們現在的判斷是戰爭（冷戰）是無法避免的。所以我們改變了「一條線」的戰略思考方式。現在，我們對戰爭的判斷和採取的政策比過去更妥當些。」<sup>106</sup> 鄧小平認為「不結盟外交策略」的目的，最主要是要穩住國家基礎，並且與第三世界國家加強關係，他曾說過：「發達國家欺侮落後國家的政策並沒有改變……。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的對外形象……。」其意圖十分清晰明確，為了捍衛中國的民族尊嚴，中國就必須以獨立自

---

<sup>103</sup> 鳳凰網，2010，〈2010 年 8 月 18 日，共和國圖像志—鄧小平為中國設計“三步走”戰略〉，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y.ifeng.com/his/201008/f9ae9714-30e6-4656-9035-154ae5b5d4af.shtml>

<sup>104</sup> 張中雲，1998，〈試論鄧小平關於對外開放與外交戰略之間關係的思想〉，《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 144。

<sup>105</sup> 錢其琛，1992 年 12 月 30 日，〈回顧與展望〉，《人民日報》，頁 7。

<sup>106</sup> 葉自成，2001，《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外交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160。

主的態度處理對他國的關係，這也就是當 90 年代初期兩極體系崩解之後，中國能異軍突起成為往後世人口中的「崛起的大國」的關鍵原因。

這階段的改變主旨在，完成改革與開放，對國內維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在國際上則需要一個和平環境，根據這些基礎提出中國的新外交政策走向。對外關係上，則強調反霸權主義，與世界各國一同維護世界和平；增進國際合作，促進共同繁榮。<sup>107</sup>在這個大前提之下，中國外交政策也相應改變，與美國不同的地方在於，中國的外交決策只不過是先建立在內政的穩定上，再發展到對外關係上，這可見於 1982 年 9 月中國十二大中，當時中國總書記胡耀邦正式提出「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確立了鄧小平時期中國外交政策基本原則。

## 貳、中共對東亞區域政策

1921 年，當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知識分子開始從事革命活動，他們堅信，主要的任務是組織中國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在共產黨發動的秋收起義失敗後，率領殘部進入井岡山，從此開始形成以農村為根據地的革命戰略思想，並於 1931 年在這裡成立中華蘇維埃政府。但好景不常，在 1934 年受到國民黨軍隊大規模進攻下，共產黨人員開啟了長達一年的「長征」之旅。

到了 1949 年的中國，毛澤東的地位以無法動搖，中國開始進入「毛澤東統治時代」。這長達幾十年的光陰，中共以毛澤東的思想做為最高的政策指導原則。由於共產黨「以黨領政」的形式作

---

<sup>107</sup> 唐家璇，1999，〈新中國外交的光輝歷程〉。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wjs/2159/t8737.htm>

風，使得中共得以在中國居於絕對統治的地位，而身為黨的領導人，毛澤東的思想也自然而然成為整個中國意識型態的最佳代言。毛澤東以個人的意識型態影響了中國從 1947 年至 1976 年共三十年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外交、國防等一切重要政策制定，而且影響還擴大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sup>108</sup>筆者接下來就以受到毛澤東三個時期思想改變影響下的中國，對東亞區域的政策為討論主題。

## 一、建政初期

在中國剛站穩腳步之際，中國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國內的紛亂局勢，而是來自美國海上的軍事威脅。美國不但在中共建政初期發起朝鮮戰爭，幾乎侵犯到中國東北邊界；又在台灣海峽上佈署第七艦隊，將臺灣置於保護傘內，箝制中國向東發展；並在越南問題上，公開支持法國殖民軍進攻越南北方。造成中國的東北、東部、以及南部邊界受到來自美國戰略上的包圍。

對此，毛澤東「一邊倒」政策替中共當局找了條活路。中共與蘇聯結盟，參加社會主義陣營，與這些「自由民主」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堅決對外表示中共反帝國主義的決心。這時中共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鞏固國家主權，建設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其實中共建政初期，就把「擁護國際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作為自身對外政策之準則。<sup>109</sup>最好的例證就是，美國在中共建政初期對朝鮮的進軍，其侵略的態度非常明顯，而中國在反覆曲折的戰鬥後，仍願意在 1953 年 7 月與美國簽訂停戰協議。1954 年又參與日內瓦會議，與相關國家促成印度半島的停戰。<sup>110</sup>由上

<sup>108</sup> 蘇紹智、高輝等著，2007，〈中共意識型態研究〉，《中國研究導論》。台北：陸委會，頁 255。

<sup>109</sup> 見 1949 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轉引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當代中國外交》，頁 5。

<sup>110</sup> 毛澤東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4，《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頁 91。

述兩件事可以看出，中共在建政初期雖然仍與美國處於天秤的兩端，但不代表中國希望以武力當作對外政策的基礎，相反的，武力只是中國在建政初期自保的手段而已。

此外，國家總理周恩來也提出著名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sup>111</sup>這五項原則最初是由周恩來在 1953 年 12 月於北京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提出，後於 1954 年寫入中印、中緬聯合聲明中，成為國際關係處理的準則，這五項原則後來更成為萬隆會議中受亞非各國一致通過的十項原則。

不過，即便中共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但其仍是嚴厲譴責美國侵犯中國主權、將台灣納入美方保護範圍的干涉內政行為。不過，中國政府仍願意與美方展開談判，不願以武力取代一切溝通管道。因此，有些評論家認為，建政初期的中國政策，即是以萬隆會議的十項宣言為主，達成鞏固實力的願望。<sup>112</sup>

## 二、主權維護時期

中國此一時期在國際上的地位略顯尷尬。首先，中國的主權依舊受到美國的威脅，不但有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更發動侵越戰爭，從南方威脅中國領土安全以及中共在共產國家中的威信。<sup>113</sup>第二，蘇聯與美國開始為了主宰世界而進行零和遊戲，古巴飛彈危機以及軍備競賽從核武嚇阻升高為太空競賽後，美、蘇兩國白熱化的競爭，使得身處其中的中國倍感威脅。<sup>114</sup>如同建政

---

<sup>111</sup> 同註 110，頁 160-161。

<sup>112</sup>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著，1991，《康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278。

<sup>113</sup> 同註 87。

<sup>114</sup> Bruce Russett and Harvey Starr, 1992,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pp. 321-345.

初期所論述的，中國現在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先穩定國家局勢、建立中國自主的國際地位。而當中國決定維護自身主權卻無法做出完全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的決策，這就造成中國為了捍衛自己的獨立與主權不得不同時對抗美、蘇兩國霸權主義的結果。<sup>115</sup>

因為毛澤東以意識型態為主的領導方式，與政治立場親美的東協國家並未建立外交關係。不過自此一時期開始，中國對外關係採取遵照萬隆會議的五項原則在進行，先後與緬甸、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簽訂邊界條約或協定，其中，印尼雖然曾是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但因 1965 年的「930 事件」反而使兩國關係在 1967 年正式斷交。<sup>116</sup>在經貿方面，中國與東協之經貿關係受到政治影響甚大，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對東亞區域國家的貿易幾乎停擺，而這些國家也對於共產主義避之惟恐不及，不願與中國有任何往來，對此，中國開始提倡「自給自足」的發展策略。

### 三、獨立自主的外交作為

這一時期，不僅中國內部發生重大變化，甚至國際局勢也因美國深陷越南戰場，令蘇聯趁勢坐大。蘇聯在中蘇邊界和蒙古加強軍事佈署，軍隊總數達到一百萬人次，並將多數導彈佈署在遠東地區，對中國國內安全造成威脅，之後，1969 年，蘇聯又入侵珍寶島，成為壓倒中、蘇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最後 60 年代末期蘇聯與中國正式決裂。<sup>117</sup>

---

<sup>115</sup> 陳啟懋，2000，《中國對外關係》。台北：吉虹資訊，頁 88。

<sup>116</sup> 蔡百銓譯，Dewi Fortuna Anwar 著，1998，《印尼與東南亞國協：外交政策與區域主義》。台北：國立編譯館，頁 15-17。

<sup>117</sup> 同註 88。

相較於蘇聯對中國的積極侵略，美國則是在尼克森總統 1969 年的「關島宣言」架構下，<sup>118</sup>開始以談判取代對抗來解決與共產集團之間的歧見。尼克森表明美國將從東亞區域撤軍、並為了解決越南戰爭後膠著的對外關係，主動與中國領導高層進行會談。對此，中國高層為了應付來自蘇聯霸權主義的威脅，保衛國家領土、主權以及獨立，實行「一條線」的戰略，並聯合美國對抗蘇聯霸權的侵略。<sup>119</sup>這項策略結合了日本、西歐、美國及其在東亞區域之盟友，形成抵抗蘇聯侵略的防線。

中、美關係改善後，中國與東協諸多會員國，從政治上疏遠、經濟上有限合作的狀態，轉變成相繼爭取建立合作關係。這其中的關鍵，其一：是「尼克森主義」讓美軍撤離東亞，其二：蘇聯政治與軍事上的擴張，其三：中國在 1971 年正式被聯合國承認擁有中國唯一代表權，以及尼克森首次訪問中國。這些因素都對東亞各國投下震撼彈，也因此 1971 年 11 月於吉隆坡，這些國家正式提出東亞區域的和平、自由與中立是東協國家一致的目標，並堅決反對蘇聯想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主張。

中國與美國、中國與東亞各國，在經歷了東亞區域 60 年代末期至 70 年代初期的劇烈變動後，深刻的體驗到在對抗霸權的擴張，沒有辦法單憑一己之力去抗衡。且東亞區域政經局勢發展仍不完整，因此當中國與美國重啟大門後所釋放的善意，這些國家也就了解到與中國發展正常關係的重要性，認識到中國在地區性以及全球性各層面中所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對中國而言，與東亞區域內各國關係正常化一直是現階段必須努力的目標。在雙方相繼努力下，中國終於在 1975 年與大多數

---

<sup>118</sup> 同註 51。

<sup>119</sup> 同註 54。

的東亞國家有了正常的外交關係。就如同周恩來在中共建政初期所說的：「我們對外交問題有個基本的立場，及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也就是獨立自主與自力更生的立場。」<sup>120</sup>這段宣言也終於在30年後，中國對外關係正常化後實現了。

### 第三節 小結

二次大戰結束後，世界被兩大強權一分為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在全球進行政治、軍事、經濟上的競逐。兩方的領導階級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希望能將對方擊倒，並獨享統御全球的權力。不過，這項美夢卻隨著中國在國際地位上的提升而提早破滅，兩大強權開始爭奪這個「新興」國家的支持，一場新的權力競爭就悄然在東亞區域間形成了。

當時，蘇聯對中國是較有影響力的。無論是從中國建國初期還是後來的中共建政，這段期間內，蘇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物力支持中國的重建。這或許可以讓我們解讀為，蘇聯想一方面維持與中方的友好關係並宣揚共產主義，二方面以此防止日本侵擾東南方國土，穩定蘇聯在東亞區域的戰局。蘇聯這種以地緣戰略、政治因素為主的思考模式，的確使得中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與蘇聯保持着友好的關係。相對的，美國此一時期並未特別關注中國的發展，給予蘇聯可趁之機，讓中國在戰後採取與美國對立的意識型態，並封鎖交往二十餘年，這大概是當時美國政府始料未及的。

不過，中共政權並不像其他蘇聯扶持的國家一樣（例如：朝

---

<sup>120</sup> 周恩來，1980，《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頁121。

鮮與越南)，或許是所謂中國人長久以來以「天朝」自居的心態影響，當時中國的領導者一直試圖擺脫被蘇聯操控的陰影，希望能以獨立自主的方式與全球交往。因此，在中、蘇友好關係的二十年間，中共當局並非一味的配合蘇聯的對外政策，而是以自身利益作出發點。當然，此舉後來終於引起蘇聯的不滿，而經歷一連串事件的影響，中蘇友好關係的蜜月期倏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中國與當時積極尋求重啟溝通大門的美國，建立起正常化關係。

當時美、中兩國領導者其實都很清楚彼此關係正常化，代表着兩極體系終將消逝被往後新的世界局勢給取代，美國為了追求國家的利益發展與在世界的領導權、中國了維繫自身的主權並在世界上重新獲得影響力，這讓兩國都認清了一件事，那就是蘇聯權力的擴大正是影響未來世界正常發展的最大阻礙。因此，當時序進入冷戰時期，美、中兩國最終走向了合作關係，可說是不意外的結果。而他們合作的契機，正是彼此從自身國家利益發展上做出發點，而在世界局勢影響下所誕生的產物。

### 第三章 美國冷戰後的東亞政策

以意識型態為抗爭主軸的兩極體系世界，在 20 世紀後期悄然結束，隨之而起的是一個多元的世界局勢。隨著世界局勢的改變，美國為了要獨力應付全球諸多新興議題而感到徬徨無助，其無力再靠既有的國力單獨應付這些議題，美國開始尋求與其他國家、區域組織的相互合作。因此，當冷戰時期由肯楠(George F. Kenn)所倡議的「圍堵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以及其他的戰略思考模式，<sup>121</sup>在 20 世紀末一一被打破時，美國政府體認到，必須要以新的策略及態度來面對二十一世紀世界局勢的變化，並做出整體戰略的調整與改變。

在新思維的浪潮下，東亞成為美國在冷戰後矚目的焦點，其擁有廣大的市場利益以及地緣戰略價值存在，而美國、中國及東亞區域的互動，則成為美國能否獲得東亞領導權的最大挑戰。東亞區域呈現的種族、宗教及文化多元，更使得美國在東亞區域議題上勢必得步步為營，以免影響美國的經濟利益、戰略佈局以及政策推動，更要防止東亞各國的反美浪潮。

在整體策略的改變下，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議題，中、美兩方的關係並不像美、日兩國間，擁有相似的意識型態並在經濟、軍事、科技等方面有所合作。中、美兩國的意識型態差異過大，其中一方信奉自由民主並崇尚資本主義；另一方，則是信奉共產主義的專制中國。兩方不但在意識型態、政治體制上有極大的差異，還有許多分歧讓當時諸多學者認為中、美兩國在各項議題上勢必會水火不容，並爆發諸多衝突。<sup>122</sup>例如：貿易上的逆差、核

---

<sup>121</sup> 同註 50。

<sup>122</sup> Zbigniew Brzezinski, 2008,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29-31.

武的擴散問題、人權議題...等。但是，即便存在著如此多的歧見，中、美兩國在東亞區域上的競合仍成為了國際社會的現實。筆者在此將以冷戰後，美國在與中國競合情況下的個體層次與整體層次，對美國在東亞區域的策略調整、改變以及影響，作為本章節的研究方向與探討主軸。

## 第一節 領導階層的對東亞政策

針對冷戰的形成，一般學者大多以兩種理論為主。一是以意識型態(Ideological Model)為主，認為冷戰的開始與結束是因為資本與共產、自由與專制的意識型態相衝擊的結果；第二種，則是歷史權力模式(Historic Power Model)，這一派的支持者相信，冷戰是美、蘇兩國為了成為唯一的霸權而做出的權力競賽。<sup>123</sup>但如同其他多數學者所認為的，冷戰的形成與結束這兩種因素其實缺一不可，並非只靠單一因素就可形成。<sup>124</sup>有趣的是在冷戰後期，舉世反「共」的浪潮下，身為反「共」先驅的美國卻與共產、專制的中國建立了令眾人意想不到的戰略夥伴關係。而筆者相信，與中國交往的政策形成，是受到美國當時領導者的思維影響，促成美國政府對中國以及對東亞區域的政策調整，因此才會產生這令人意想不到的狀況。筆者將在本節，從冷戰後美國領導者們的思考角度（個體層次）去探討，冷戰後的美國在東亞區域之政策形成與調整。

### 壹、老布希時期

80 年代末期，靠著雷根的全球圍堵政策以及軍備競賽的成

---

<sup>123</sup> Arthur Schweitzer, 1962, "Ideological Strateg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15, No. 1, pp. 46-66.

<sup>124</sup> David N. Farnsworth, 198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Nelson—Hall, pp. 79-82.

果，共產蘇聯成為歷史洪流中一道只堪玩味的過往，不過美、蘇兩強在全球利益與權力上的競逐，則形塑出 90 年代世界觀的基礎。隨著蘇聯瓦解，世界各國不再擔心戰爭的發生與軍備的競爭會拖垮自身國家內部的經濟，紛紛藉此契機擺脫過往受美、蘇單方影響的區域性政治、經濟運作方式，日益盛行的區域整合模式成為冷戰後新世界的樣貌。

## 一、面對全球區域化

在全球區域整合發展的潮流中，有兩點廣受世界各國所關注。第一，在擺脫了過去的兩極體系，國家與國家、區域、全球之間的互動變得更加多采多姿。當冷戰結束，軍事安全不再是國際戰略思考模式中最重要議題，取而代之的是以自由資本主義思潮為主的經濟利益、貿易關稅，以及伴隨區域性經濟議題產生的國家安全議題，這些新的議題成為世界各國對外策略所重新注視的焦點。透過區域化的浪潮，區域組織應運而生，世界各國開始以談判代替衝突、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競爭，藉此解決複雜的全球或是區域議題。第二，世界經濟龍頭美國自身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改變，也隨著區域組織的出現而開始改變對全球的策略佈局，而其扮演的領航者角色將目光從歐洲大陸轉向到對東亞區域，也讓世界各國開始注意美國現今的新目標。<sup>125</sup>事實上，老布希利用多邊經貿體系與雙邊公平貿易政策，提振美國的經濟並改善惡化的預算赤字問題，而美國對東亞地區的貿易輸出呈現大幅度的成長，東亞區域頓時成為美國政府藉以振興經濟的最佳藥方。(見表 3-1)

---

<sup>125</sup> 同註 1，頁 13。

表 3-1：美國出口貿易成長率—東亞與歐洲市場的比較(1970-1994)

年份	1970-80 (平均)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東亞	12.84	25.68	4.87	-2.85	0.34	8.11	-2.91	10.25
歐洲	38.05	25.58	-0.32	-0.82	-0.76	0.44	-0.30	-0.40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東亞	12.95	36.71	16.04	6.69	0.34	7.16	6.41	12.40
歐洲	23.30	25.37	13.44	14.64	-0.76	5.21	-0.50	0.49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憬藝，頁 53。

1.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Quarterly, March 1996。

2.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1970-1994。

在此氛圍之下，共和黨的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從 90 年代起，逐步規劃新的全球策略以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霸權。老布希為延續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勢必得先面對維持美國整體經濟實力，更要保持軍事上的實力，將維持全球政經秩序的責任分配給其盟邦，不同於冷戰時期，美國獨攬所有的國際責任與義務，老布希決定並採取了責任分攤的聯盟方式，告知各國必須為自身國家事務負起責任。<sup>126</sup>

老布希上任後，首先就政治及區域安全層面，開始積極擴張北約組織的勢力並重整北大西洋聯盟的結構，強化美國與歐洲各國的夥伴關係。<sup>127</sup>一方面預防俄羅斯政府捲土重來，另一方面則是加強了美國對歐洲的影響力；另外，對於東亞區域，老布希自 1991 年起宣示將在東亞區域扮演主導與平衡者的角色，表明假若美國完全撤離東亞區域，則區域內強國將互相競爭，造成更加不

<sup>126</sup> 同註 48，頁 181。

<sup>127</sup> 同註 122，頁 52。

穩定的局面，將會影響東亞各國的未來發展。其次，經濟層面，在世界經濟區域化的情況下，老布希依照「世界新秩序」的藍圖，成立 NAFTA 擴大美國貿易籌碼；再藉此增強美國在雙邊公平貿易與多邊自由經濟體制上的優勢。進而可以用單項的國家利益與全球的多邊主義兩大層次，介入亞太經貿體制的發展與 APEC 的走向。而這成為日後老布希掌握東亞區域發展的重要契機。<sup>128</sup>

## 二、世界新秩序的誕生

老布希對美國在世界利益的界定，以他在 1991 年的國情咨文中提到的「世界新秩序」為藍圖。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如圖 3-1）所示：第一、國家安全層次，以他在 90 年發表的「亞洲太平洋區域戰略架構：展望二十一世紀」（A Strategy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Looking Forward the 21<sup>st</sup> Century）為基礎，他宣稱，美國要在東亞區域內扮演主導與平衡者的角色，並引入「安全真空」（security vacuum）與「公正中介人」（honest broker）的安全訴求。<sup>129</sup> 第二，從經濟層面來看，依照老布希「世界新秩序」的藍圖來看，將先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擴大美國經貿籌碼；然後，增強美國在雙邊公平貿易與多邊自由經貿體制上的優勢。此一策略使美國得以從單項的國家利益與全球的多邊主義兩大層次，同時介入亞太地區的經貿體制發展，並主導亞太經合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走向。<sup>130</sup> 最後，在政治層面，當時老布希的國務卿貝格（James Baker）主張美國應透過人權外交，將美國所宣揚的自由、民主精神向世界各國傳遞，並表明美國捍衛此等精神的

---

<sup>128</sup> Robert B. Zoellick, 1994,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The Future*, No. 11, August, p. 139.

<sup>129</sup> Jean J. Kirkpatrick, 1989, "Beyond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1, pp. 1-16.

<sup>130</sup> 同註 49，頁 56。

堅定立場。<sup>13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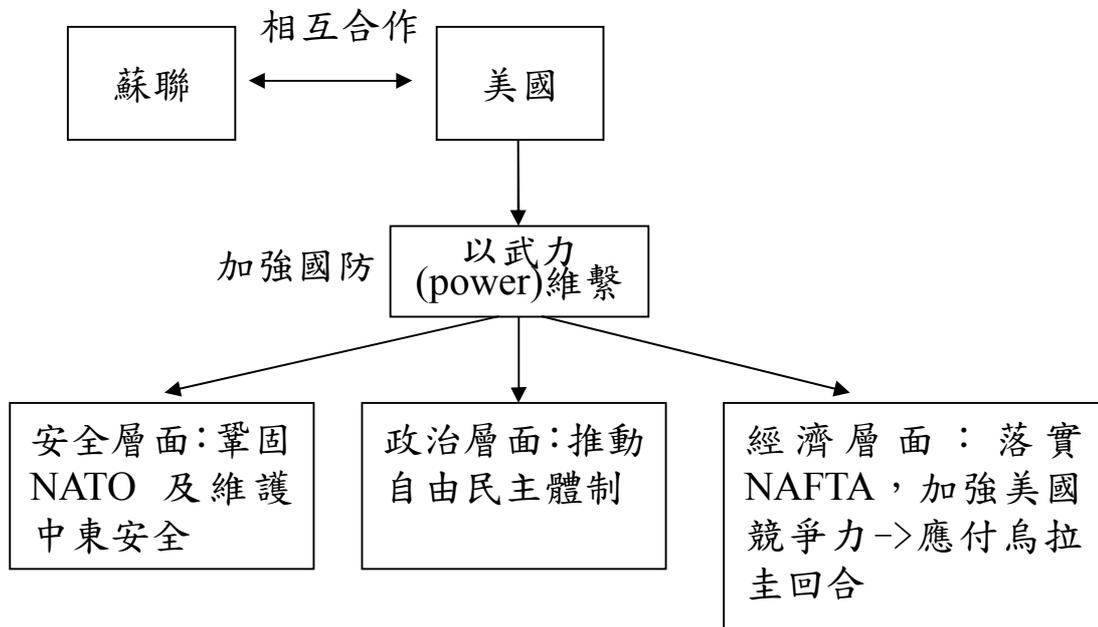


圖 3-1：老布希的世界新秩序構想圖

資料來源：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憬藝，頁 46。

老布希希望能在擁有絕對主導優勢的情況下，與東亞各國進行多邊的互動並建立起互信機制，保障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利益，並在未來領導東亞政策走向時，能得到東亞各國的支持。從老布希「世界新秩序」的構想中我們可以發現，他所期待的是東亞區域內，各國的權力能夠平衡，而在此均衡下由美國負責引領東亞各國的對外政策走向、經濟發展與安全政策制定。為了達成此目標，區域性且多邊性的溝通管道必不可少，如同前文所提到的，老布希規劃下的美國對東亞區域政策的未來走向將是以溝通代替衝突、以經濟代替軍事，減少不必要的衝突產生，這正是美國在東亞區域內最有利的發展方式。

<sup>131</sup> James Baker, 1991, "American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pp. 1-18.

## 貳、柯林頓時期

柯林頓在經濟蕭條時當選總統，美國此時正面臨在國際政治議題、高度互賴的國際經濟中，漸漸失去優勢地位、美國對世界的整體影響力開始下滑的情況，柯林頓上任後最主要的工作即是：對內振興國內經濟，恢復整體國力；對外關係上，則試圖恢復美國過往的榮光，而兩者相輔相成，塑造出柯林頓日後的整體決策模式。

### 一、從振興經濟局勢開始

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在競選總統期間，曾經以競選的口號：「笨蛋，問題出在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來向美國人民宣告，他在總統任期內的主要目標是將美國內政主題作出一番修改，並用往後的經濟表現來做為政績。柯林頓上台之初，美國預算赤字相當於 GDP 的 5%，國債也持續上揚，聯邦政府支付的利息也越來越高。但是等到柯林頓上台後，卻迅速解決了預算赤字的問題，並於 1993 年提出的經濟改革計畫，<sup>132</sup>一方面要增加公共投資，另一方面則要削減聯邦財政赤字及鼓勵民間的投資。整體來說，柯林頓整個經濟政策以短期來看是企圖以「擴大公共投資」刺激經濟景氣；長期而言，則希望藉改善基本經濟體質來提升美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這些目標成為柯林頓執政時期，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全球戰略的部署、區域安全的維繫、推廣民主與自由市場等目標，皆建立於柯林頓的經濟政策之上。<sup>133</sup>

<sup>132</sup> William J. Clinton, 1993, *A Vision of Change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 C.: Th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2-11.

<sup>133</sup> 衛嘉定，1993，〈美國總統柯林頓之總體外交新架構〉，《問題與研究》，第 32 卷，第 5 期，頁 25-26。

柯林頓經濟政策與過往兩位共和黨總統不同的地方在於，柯林頓政府強調國家機關在經濟發展中所能扮演的角色。這一轉變意義如下：其一，在世界經濟區域化的浪潮下，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經濟中如有國家機關的支持將更加如魚得水。其二，以政府領航的方式取代過往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策。<sup>134</sup>他以國家為單位重新思考對外經貿政策的觀點，追求雙邊公平貿易利益的同時，也積極強調維持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必要性，防止全球經濟陷入另一波的貿易保護主義之爭。實際上，柯林頓執政後，美國經濟政策表現亮眼是不爭的事實，不但是因為有前人的努力把握時機裁減國防預算，在經濟政策上又有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和魯本(Robert Rubin)使金融體系穩定，強調投資及科技使資訊工業大幅成長，精簡政府節省資源提高行政效率。<sup>135</sup>有了以上原因，柯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經濟政策才能穩健的走下去。

## 二、對東亞發展政策—新太平洋共同體

柯林頓在 1992 年主政之後以國家為單位重新思考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觀點，並表現在對外貿易政策的規劃上，柯林頓比以往的美國政府更為加強單邊的「國家主義」在對外貿易的重要程度。不同於以往的是，他所採取的不是貿易保護策略，而是強化了雙邊貿易的公平性以及維持全球多邊自由貿易的必要性。<sup>136</sup>將焦點放在以「經濟的力量」維持美國在全球的利益，更進一步的維持美國在全球層次裡的重要地位。

他並於 1993 年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New Pacific

---

<sup>134</sup> 同註 1，頁 75。

<sup>135</sup> 卜大中，1994，〈柯林頓新政府與麻省理工經濟學派的理論〉，《美國月刊》，第 8 卷，第 8 期，頁 89-100。

<sup>136</sup> 同註 1，頁 78-79。

Community)，提倡希望從過去的美、日同盟開始，在亞太地區的駐軍、亞太多邊安全體系、中美全面性交往、對亞太區域的經貿關係、以及依靠政治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等，作為出發點，與東亞區域內各國建立起「合作性交往」(Cooperation Engagement)的新夥伴關係。柯林頓的東亞戰略包含兩大部分：首先是汲取功能利益，在全球「擴張」戰略的前提下，達到拓展「經濟安全」、推廣民主體制的人權外交政策、以及確保東亞區域內的「權力平衡」；第二，擴張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地緣勢力範圍，亦即如何有效的將美國本身對外戰略目標、策略機制與東亞區域發展做結合，而能有效地達到影響東亞區域未來的發展方向。<sup>137</sup>

柯林頓藉著參與 1993 年 7 月的 G7 高峰會出訪亞太區域，這是他擔任總統後的第一次出訪。而在這次出訪中，柯林頓發表了三篇有關亞太議題的演說，表達他對東亞區域的重視。首先，在同年 7 月 5 日在舊金山的演講，他說：「我正在傳遞一項訊息」(I'm sending a message.)強調亞太經濟利益對美國的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第二，同年 7 月 7 號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說：“Work On Framework to Continue, For U. S. and Japanese People.”柯林頓強調要建構「新太平洋共同體」有三大要務：(1)美、日關係的強化，確保「美日安保條約」；(2)更為開放的區域與全球經濟；(3)民主與人權體制的建立。以及最後在南韓國會的演講：“Spread of Nuclear Weapon Must Not Replace Cold War.”他期待能在不以核武競賽為前提的情況下，解決北韓核武飛彈危機，並在演說中提到希望中國也能接受此一國際規範。<sup>138</sup>

柯林頓政府的東亞政策就建立於上述架構的優勢下，希望透

---

<sup>137</sup> William J. Clinton, 1993. “Building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 28, pp. 485-488.

<sup>138</sup> William J. Clinton, 1993, “Fundamentals of Security for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29, pp. 509-512.

過三大功能途徑來體現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利益：<sup>139</sup>(1)經濟議題：解決與東亞國家間龐大的貿易逆差以及提昇 APEC(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的地位成為「亞太經濟共同體」(Asia 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2)安全議題：維持與舊有盟國的雙邊安全條約、強化與他國軍事合作，並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多邊安全對話論壇、防止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3)政治議題：人權標準與民主體制的普及化、全球化，藉此牽制東協積極主導欲聯合中國建立「單一亞洲意識」的發展。(見圖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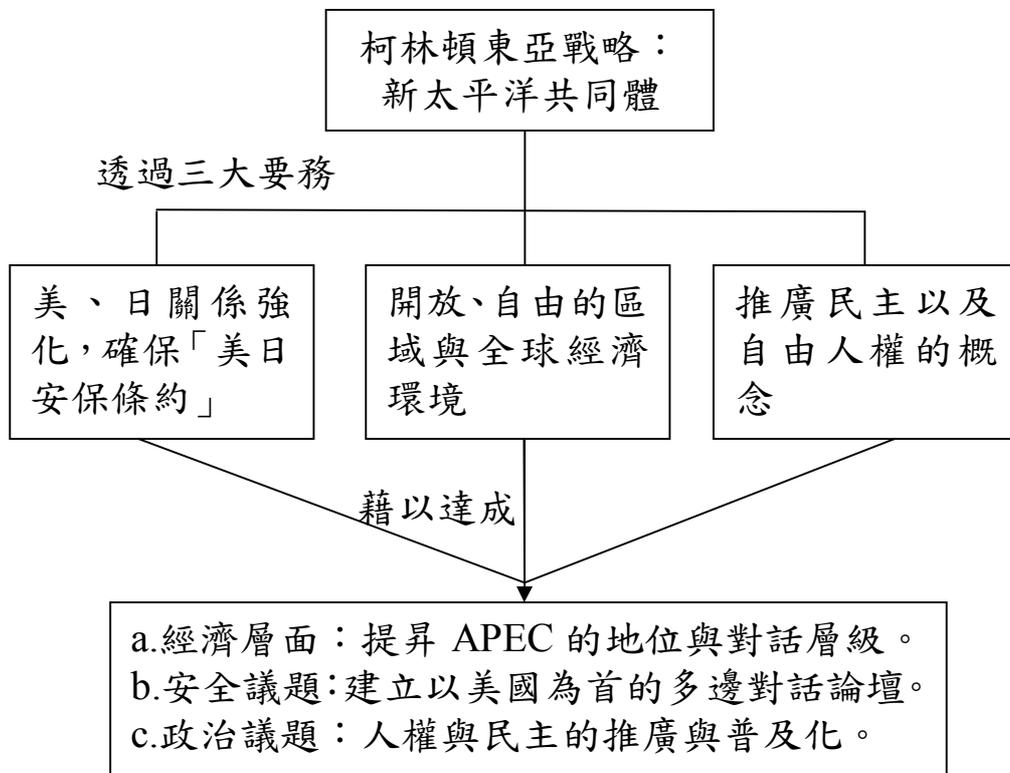


圖 3-2：柯林頓東亞區域政策的「新太平洋共同體」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對於柯林頓而言，中國在其心目中的定位隨著時間有慢慢改變的趨勢，從選舉期間的「劊子手」、「惡棍國家」到執政時期的

<sup>139</sup> 同註 1，頁 86-88。

「應積極合作的新興強權」，我們可以做出的解釋是，上台之後的政治現實迫使柯林頓明瞭美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向外與全球同步，而目前最有利的市場就是中國。這些都可以從柯林頓在 1996 年 11 月 20 日在坎培拉(Canberra)所發表的宣言中觀察到，他說：「～美國的意圖不是要圍堵中國，而是與之保持接觸。穩定、開放與繁榮的中國，應當是對其在世界上所處位置充滿信心並願履行身為『大國』之職責...。為了因應對穩定環境的挑戰，美國為此追求三項目標：更加強大的聯盟，更深入與中國交往和追求更大程度的民主社會。」<sup>140</sup>在此之後，柯林頓政府將美國對東亞區域政策做了更進一步的強化。除了強調中、美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著重在長期性與全面性的關係外，還將美國影響東亞區域的版圖擴大，藉此以相互協商、長期合作、全面發展，來解決東亞區域的各項議題。<sup>141</sup>

## 參、小布希時期

21 世紀初，身為當時最受歡迎的美國州長之一，媒體和共和黨內部都認為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是最有可能出線參與 2000 年總統選舉的候選人人選。小布希在當選州長連任後便表達了參選總統的意願，不久後就宣布他正式角逐參選，他將自己描述為一個「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者」(Compassionate Conservative)，對內他主張大幅減稅以解決多餘的預算，並且承諾對教育體制做改革；對外，則強調要與拉丁美洲保持更緊密的政治、經濟關係，對東亞區域則將由前總統柯林頓對中國所推動「戰略夥伴關係」重新定調，變成在政治上是「戰略競爭對手」，在經濟上則是「建設性的合作夥伴關係」，將中美戰略關係分割為政治與經濟兩個層

---

<sup>140</sup> William J. Clinton, 1996,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to Parliament."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Nov. 20, 1996.

<sup>141</sup> 同註 30。

面，分別處理之。<sup>142</sup>而筆者認為，小布希在處理全球議題上可以用「九一一」事件做區分，以下將探討之。

## 一、「九一一事件」前的全球策略

小布希上任初期施政重點著重在內政的調整，在對外關係上則持續以推動北約(NATO)的東擴、巴爾幹半島的駐軍、重申對俄羅斯及中國的外交政策、並持續加強經濟全球化等議題的發展。<sup>143</sup>不過在小布希首任任期內，那些身為鷹派的閣員，例如：國防部長羅斯斐勒(Donald H. Rumsfeld)、副國務卿佛維茲(Paul D. Wolfowitz)以及當時身為國家安全顧問的萊斯(Condoleezza Condi Rice)，就曾經向小布希建議要以「國家利益本身制定政策，而非考慮那些虛幻的國際利益。」<sup>144</sup>而小布希有鑒於柯林頓時期美國政府所強調的「人權外交」與「經濟外交」的成效不彰，故走向強調實力、軍力為後盾的外交政策，以營造一個對美國「絕對安全」的國際環境。

小布希執政初期就表現出要重建美國過往以軍事武力為後盾，來領導全球區域發展策略的野心，他走向過去美國「單極體系」的策略模式，<sup>145</sup>在許多全球性或是區域性的議題上都展露無遺。例如：撤回對京都議定書與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議案的支持、以及對俄羅斯的反彈道飛彈條約(ABM)。小布希政府開始著手進行之前遭到 ABM 條約限制和國會反對的國家飛彈防禦計畫(National Missile Defense)，<sup>146</sup>藉此遏止那些他口中的

---

<sup>142</sup> 許志嘉、許湘濤著，2003，〈「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與東亞大國關係的發展〉，《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臺海局勢》。台北：大屯，頁 81-83。

<sup>143</sup> Stephen M. Walt, 2001, "Beyond bin Laden: Reshaping U. 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 3, p. 56.

<sup>144</sup> Michael Hirsb, 2002, "Bush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 Vol. 81, No. 5, p. 32.

<sup>145</sup> 同註 31。

<sup>146</sup> George W. Bush, 2006, *President Bush Speech on Missile Defenc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流氓國家的威脅，這其中也包括了北韓與中國。

## 二、「九一一事件」後全球策略的重整

「九一一事件」的爆發對於美國政治菁英、政府與人民有了全新的挑戰。小布希開始重新調整他在全球事務上的戰略佈局，其中，美軍試圖以反恐名義進入東亞地區，就是此一戰略思想的一部分。小布希將東亞地區視為「發生潛在衝突的高危險區」，並確定其將出現一個「擁有強大資源後盾的競爭對手，因此從孟加拉灣到日本海的東亞沿海地帶是一極具挑戰的地區。」<sup>147</sup>美國對東亞的新戰略，不僅是為了打擊東南亞日益猖獗的恐怖主義，更重要的是使美國能重新將軍力佈署於東南亞區域，完成全球軍事戰略調整之功能。小布希認為除了需要友邦的支持外，更要得到全球的認同，因此他將「反恐行動」昇華成「反恐戰爭」從此獲取全球各國的支持。<sup>148</sup>

而在「九一一事件」爆發之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若訪問中國往往會受到來自國內反對的壓力。但隨著事件爆發，小布希藉著同年10月在上海舉辦的APEC會議訪問中國並拜會其領導者，倡議中、美應該一起推動東亞區域內的反恐戰爭佈局。<sup>149</sup>雖然美國積極尋求與中國的合作，但主要的訴求仍是依照小布希政府所認為的「建設性合作關係」為主軸，不過值得玩味的，小布希政府從未以夥伴關係來期許與中國進行雙邊互動。我們可以從當時的國務卿鮑威爾(Colin Luther Powell)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談論到的：「我們既不用『競爭對手』一詞，也不用『戰略夥伴』，是因

<sup>147</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Available from: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2001.pdf>

<sup>148</sup> Barry R. Posen, 2001,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Grand Strategy, Strategy, and Tac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p. 51.

<sup>149</sup> David Shambaugh & Robert S. Lituak, 2001, *America and China Get a Chance to Improve Their Relati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p. 8.

為我覺得不能用一句話就涵蓋複雜的美中關係。」<sup>150</sup>

以上的言論我們可以從小布希政府對中國政府雖一面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另一面也維持著早先對中國政策的三項基礎：(一)積極走向「建設性合作關係」，依照鮑威爾的解釋：「在能合作處合作，在有歧見處對話，而在有嚴重歧見處，則互讓對方知曉歧見產生的根源，以尋求解決之道。」<sup>151</sup>；(二)爭取中國全面支持反恐戰爭：主因是，小布希政府認為當時的東亞區域會是下一個恐怖攻擊產生的場域，因為東亞區域內的種族多元、宗教多元與文化多元特性，尤其是伊斯蘭教信眾就超過兩億人口。美方認為如單靠美方本身是無法阻擋、消除在東亞區域內的不安定因素。<sup>152</sup>因此，美方極力拉攏中國與其他東亞區域國家加入反恐戰爭，藉此穩定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利益與優勢；(三)持續一中政策及對台安全承諾，小布希在北京與江澤民會面時曾公開表示，美國仍維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並會遵守三個聯合公報的內容。他強調，美方對台灣問題的立場始終沒變，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決。

小布希低調的處理中方希望以台灣問題換取反恐合作的策略，我們藉此認為小布希政府其實故意忽視，過去由柯林頓政府時期所提倡的「全方面交往政策」的關係定位，小布希政府依舊認為不論在政治、經濟、還是區域安全議題上，中國會成為美國在全球與東亞區域內的最佳合作對象，也會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競爭對手。

## 肆、歐巴馬時期

<sup>150</sup> Lanxin Xiang, 2001, "Washington's Misguided China Policy," *Survival*, Vol. 43, No. 3, p. 19.

<sup>151</sup> 金燦榮，2002年2月19日，〈鮑威爾：中共既非戰略夥伴亦非競爭對手〉，《中國時報》，版11。

<sup>152</sup> 陳佩修，2004，〈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國土安全任務與反恐聯盟建構〉，《全球政治評論》，第5期，頁109。

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Jr.)美國開國以來第一位非裔總統，也是近 30 年來第二位民主黨籍的總統。與同黨的前任總統柯林頓一樣，對國內，歐巴馬面對的是美國國內嚴重的金融危機及受其所波及的全球經濟危機。對外，美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駐軍問題、國際恐怖主義的勢力、中東以色列與阿拉伯之間的衝突、北韓及伊朗的核武問題和全球氣候問題。<sup>153</sup>這些問題都考驗著剛上台的歐巴馬政府，在這種內憂外患頻生的情況下，歐巴馬必須調整內部政策以及矯正過去八年美國對外態度，積極尋求國際間合作以期能順利的因應各項問題，並能促使受到金融海嘯影響而一蹶不振的美國經濟復甦。

## 一、重新定位美國的全球政策

歐巴馬的執政理念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得到充分體現。他以十足的信心面對這些挑戰並自信美國是當今世界的強國，有足夠的勇氣與毅力突破這項難關。他同樣認為美國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才是促使美國能成為強國的關鍵。因此，對內為了消除由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他採取大膽的改革，如制定耗資巨大的經濟復興計劃、醫療改革、移民政策調整、能源戰略修訂、稅收政策調整、教育體制改革等。對外則強調溫和、柔性的外交策略，不只與盟友再度加強合作與溝通，甚至對那些美國的「敵人」伸出友誼之手，希望能以溝通、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而非以武力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sup>154</sup>

---

<sup>153</sup> Obama, Barack, 2009,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President\\_Barack\\_Obamas\\_Inaugural\\_Address/](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President_Barack_Obamas_Inaugural_Address/)。

<sup>154</sup> 引述自 Obama 就職演說摘要：“Today I say to you tha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re real. They are serious and they are many...They will not be met easily or in a short span of time...On this day, we gather because we have chosen hope over fear, unity of purpose over conflict and discord...it has been the risk-takers, the doers, the makers of things - some celebrated but more often men and women obscure in their labor, who have carried us up the long, rugged path towards prosperity and freedom.”詳見，Obama, Barack, 2009,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President\\_Barack\\_Obamas\\_Inaugural\\_Address/](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President_Barack_Obamas_Inaugural_Address/)

有別於小布希將所有心力放置在「九一一事件」後的反恐戰爭，歐巴馬正視了美國在全世界中，只是最具有影響力的國家其中之一，在全球策略區域化的演變下，美國要面對的是歐盟、拉丁美洲、中東世界以及東亞區域。對於這些區域組織、聯盟或是國家，歐巴馬不願再讓美國缺席任何一場重要的政治、經濟或環境的高峰會。例如，在 2009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Rodham Clinton)帶著龐大代表團出席在泰國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並在曼谷機場宣布「美國回來了」。<sup>155</sup>此外，她也代表美國與東協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這顯示出，歐巴馬政府對美國在東亞區域宣示未來的戰略環境與發展將更加的關注。美國將重新調整對東亞區域甚至是整個亞太區域的政策佈局，並藉著以「交往」為手段，靠著自由市場的價值、人權的維護來影響東亞區域的整合與發展態勢。

## 二、積極的對東亞政策

歐巴馬對東亞區域內兩大強國，中國與日本，表達出極端重視的態度，在他上任初期就率團分別拜訪在東亞議題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兩國領導者。對他而言，日本是美國在東亞內最堅強的盟友，一直以來都與美方互動良好，加上美國與其諸多相關利益，讓歐巴馬一上任就表示要繼續加強與日本的友好關係，因此在 2009 年 11 月訪問日本時，即對當時的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表達應當加強美、日雙方的同盟關係，提出了「日美同盟關係是亞太地區穩定的基軸」的論點，<sup>156</sup>足見歐巴馬對日本的友好態度。

---

<sup>155</sup> 陳成良，2009 年 7 月 23 日，〈參與東協論壇，希拉蕊宣示美「重返」亞洲〉，《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l/23/today-int2.htm>。

<sup>156</sup> 中國評論新聞網，2009 年 10 月 6 日，〈美專家：歐巴馬政府歡迎「對等的日美關係」〉，<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10/9/6/2/10109621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096217>

至於中國，因為這幾年來中國在各個方面都有著長足的發展，尤其是在軍事層面。為此，歐巴馬再次強調美國與日本、南韓兩國同盟的重要性，以及維持東南亞國家友好的關係，並積極爭取與俄羅斯跟中國合作，延續六方會談，以外交手段解決東亞區域內事務。即使這段時間之中，歐巴馬政府做出許多另中方感到不悅之事，例如：達賴與歐巴馬的會面、對 Google 退出中國市場事件或是在今年 3 月提出的 64 億美元對台軍售獲得國會通過...等，<sup>157</sup> 以上諸多問題，均透露出歐巴馬對自身理念的決心，將經濟歸經濟、宗教自由歸宗教自由、外交歸外交。

所以筆者認為歐巴馬的東亞政策總結來說建立在以發展為主體、以平衡為特徵的全面性接觸戰略、同盟與合作夥伴兩者並存並重，透過這幾點達到重返東亞政治核心的目的，與東亞各國建立友好的關係，並藉機發揮大國的影響力。

## 第二節 美國政府對東亞的實際行動

90 年代的世界權力與經濟結構，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後兩極體系的崩潰，以及日漸熱絡的經濟區域整合，展現出有別於過往受單一強權控制的風貌。正因為過去世界各國是受到兩大強權的操控，形成壁壘分明的兩股勢力團體，在兩極體系瓦解的情況下，之前受影響的國家了解到與其以單一國家的身分與世界各國進行互動，不如組織盟友再與他國競爭，這樣的風險相對來說比較低也擁有更多可圖的利益。因此，區域與全球之間的雙邊互動關係從 90 年代開始風靡全球。

這種改變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過往由軍事實力來主宰的國

---

<sup>157</sup> 引述自中央社，2010 年 2 月 5 日，〈華郵社論讚許美以軍售履行對台義務〉，奇摩新聞網，[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d/a/100205/1/1vxr7.html](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d/a/100205/1/1vxr7.html)。

際策略，轉變成以經濟利益、貿易問題以及國家安全為考量的新觀點。但對於美國來說，從世界的兩極體系瓦解後，雖然仍是一個另其他各國望塵莫及的超級強國，可是緊追在後的幾大強國對美國形成的威脅也令美國政府從來不敢因此鬆懈。尤其是在東亞區域，崛起後的中國與經濟、科技超群的日本以及核武議題的北韓，這種一超多強的情況，美國該怎麼改變它面對世界情勢的態度，又該採取怎麼樣的行動呢？本節，就先探討冷戰過後美國在全球的利益為何？並在東亞區域議題上，採取何種作為？

## 壹、全球戰略佈局

冷戰時，為了與蘇聯一爭高下，美國進入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所謂的「全球外交政策」的時代，其外交政策成為百分之百的國際主義。<sup>158</sup>爾後，從美國國會決定出的對外政策中可以發現，美國決定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與安全，不但在經濟與軍事發展上都要更加宏觀，另外還必須向世人展露美國深信的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價值。美國至此開始，將外交政策的走向往現實主義的方向邁進。<sup>159</sup>

美國政府注意到，有兩大議題在後冷戰時期有著重大的變革。首先，全球政治及安全議題的重要性，被區域間的政治、經濟互動所取代；第二，以往在全球軍事霸權領導下的權力結構，將被區域性次級霸權支配的權力所取代。<sup>160</sup>簡而言之，美國政府了解到區域間的政治、經濟、安全...等議題，並非單靠一國之力就可以獨立解決，多邊的交往、合作才是對未來與多方競逐的發展上最有幫助的方式。所以，美國在全球利益的策略佈局，首重

---

<sup>158</sup> 同註 35。

<sup>159</sup> 同註 36。

<sup>160</sup> 同註 50。

自身經濟實力的穩定成長；第二，美國開始與各區域組織發展合作性夥伴關係，期待能以最小的成本，去影響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並穩定國際安全。這種做法，被學者們稱為「美國領導，責任分攤」的聯盟關係模式。<sup>161</sup>

其中對西太平洋的東亞區域策略，成為美國最重要的目標。原因是，縱使歐洲擁有較多的競爭對手，但那些國家在意識型態上與美國並無太大的歧見；相反地，在東亞區域，首先要防止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擴散。第二，要面對的是擁有廣大市場、也有驚人軍事實力的中國。第三，則是要應付種族、宗教多元的東南亞區域，以防止威脅區域安全及國家安全的勢力產生。因此，美國對於東亞區域的重視，反應在其加強東亞區域內的駐軍、加強與同盟國的合作關係、大力推動多邊安全的對話機制，更重要的是與中國進行全方面的接觸，希冀在東亞區域議題上能與中共多合作、少衝突，防止中國成為美國在東亞區域內發展的絆腳石。

## 貳、對東亞區域的發展策略

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對東亞區域之策略，首先表現在老布希執政時期的國務卿貝格(James Baker)所提出的「新圍堵政策」之上。貝格主張美國應透過政治層面的人權外交，經濟層面的亞太經合會，以及安全層面的多邊論壇。用這些方式來保障美國在東亞區域內的利益。<sup>162</sup>

以貝格提出的主張為基礎，繼任的柯林頓政府在1993年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New Pacific Community)，<sup>163</sup>期待以自由貿

---

<sup>161</sup> 同註 143。

<sup>162</sup> 同註 152。

<sup>163</sup> Condoleezza Rice,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1, pp. 47-50.

易、經濟互惠、以及政治民主化等方式來影響東亞區域內各國，建立「合作性交往」(Cooperation Engagement)的新夥伴關係。到了1993年7月至9月間，柯林頓政府才重新確立新的「全面交往」策略。<sup>164</sup>對照之下，此一策略的產生很明顯的是因為美國希望在21世紀能脫歐入亞。<sup>165</sup>為未來美國在東亞區域的領導地位奠定基礎，而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對東亞政策圍繞在三大主題，也就是政治、經濟與區域安全議題。所有作為接脫離不了這三大主題之範疇，而這三大主題又區分成幾點不同的要素，筆者將為此分類探究之（見圖3-3）：<sup>166</sup>

## 一、政治議題

美國在冷戰後持續地維持在東亞地區的駐軍與許多的雙邊同盟條約，為的是保持其能在政治、經濟與軍事議題上的全程參與，並維持其領導地位。特別針對日本，不論是前亞太助理國務卿羅德(Winston Lord)還是前國防部長培里(William Perry)都認為在東亞區域議題上持續地與日方保持戰略夥伴關係，以及在區域安全上，都是美國能在東亞區域站穩的關鍵。<sup>167</sup>

除了日本之外，美國政府更積極與其他東亞周邊國家發展同盟關係，以便對中國作制衡以及誘導，並與美國競逐東亞區域利益的主要策略相配合。這就是為了維持美國在亞洲的超強地位，又與東亞區域內各國分攤責任的重大政策。

另外，美國也在東亞區域內積極推動美國式的自由、民主與

<sup>164</sup> 王高成，2005，《交往與促變：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交往策略》。台北：五南，頁131。

<sup>165</sup> 劉曉竹，1996，〈美國對華政策新動向〉，《北京之春》，第36期，頁83。

<sup>166</sup> 廖苔君，2000，〈後冷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之分析：從建設性交往至戰略夥伴關係〉，碩士論文，東海大學，頁14-17。

<sup>167</sup> 周煦，1996，〈美國柯林頓政府的亞太安全政策〉，《美歐月刊》，第11卷，第3期，頁6。

人權，不論是戰時還是戰後都一直是美國所推動的基本價值。而透過柯林頓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架構下，美方認為，促使東亞區域各國注重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發展，將使區域內各國受國內輿論影響，不會輕易的爆發衝突，使將來的區域及國際秩序更加穩定、安全。因此，在東亞區域內民主自由的國家越多，對美國在此的發展也有利，而美國也繼續將維護人權並協助他國發展自由民主，當作美國未來在東亞區域的發展目標之一。

## 二、經濟議題

在亞太地區，雖然有亞太經合會為亞洲地區各國的經濟議題作處理，但是亞洲區域各國經濟發展實力太過懸殊，因此經濟整合成為一項嚴峻的挑戰。即便這項挑戰如此艱難，美國還是不願從此脫離，原因在於，東亞地區廣大的市場、廉價的勞力成本以及美國本身在此的龐大貿易逆差，所以就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美國在此的利益遠大於弊端。並且在促進東亞區域整合後，東協的經濟發展，也將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助力。

隨著蘇聯的瓦解，美國暫時不再擔心會有任何霸權在亞太區域內興起與之抗衡，因為無論是東協還是中國，尚無法獨立稱霸於亞洲。不過，維持東亞區域的繁榮穩定是符合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全球戰略佈局的，所以與東亞區域內大國間友好關係的保持，也就成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相當重要的外交政策了。

另外，美國積極地與東協進行交往與發展雙邊情誼，因為東協的穩定與經濟上發展的利益，都與美國在後冷戰的全球發展策略的利益吻合，所以美國支持多邊的安全對話機制，以及與東協

國家發展良好的雙邊關係，<sup>168</sup>而這些都是美國在新世界格局下的策略。

### 三、區域安全議題

在既有的亞洲策略下，加強多重的協調與建立多邊的安全保障機制。美國希望在東亞區域呈現的是權力均衡的情況，而在此均勢下，美國依舊能維持其領導的地位。所以，與東亞區域各國的雙邊對話是必不可少的。

而這是為了防止核子武器對世界的威脅，美國本身在這項議題上採取：(一)維持自身的核武威脅力，為友邦提供保護傘；(二)佈署「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System)，對抗東亞區域擁有彈道飛彈發射系統的國家；(三)無限期防止核武擴散條約；(四)對東亞區域各國提出簽署全面禁止核試條約；(五)強化「核子供應集團」與國際原子能總署之功能；(六)敦促各國遵守「飛彈技術控制機制」(The 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sup>169</sup>

---

<sup>168</sup> The White House, 1996/11/24,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Press Briefing Mike McCurry and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Luzon Ballroom the Westin Philippine Plaza Hotel Manila.

<sup>169</sup> 同註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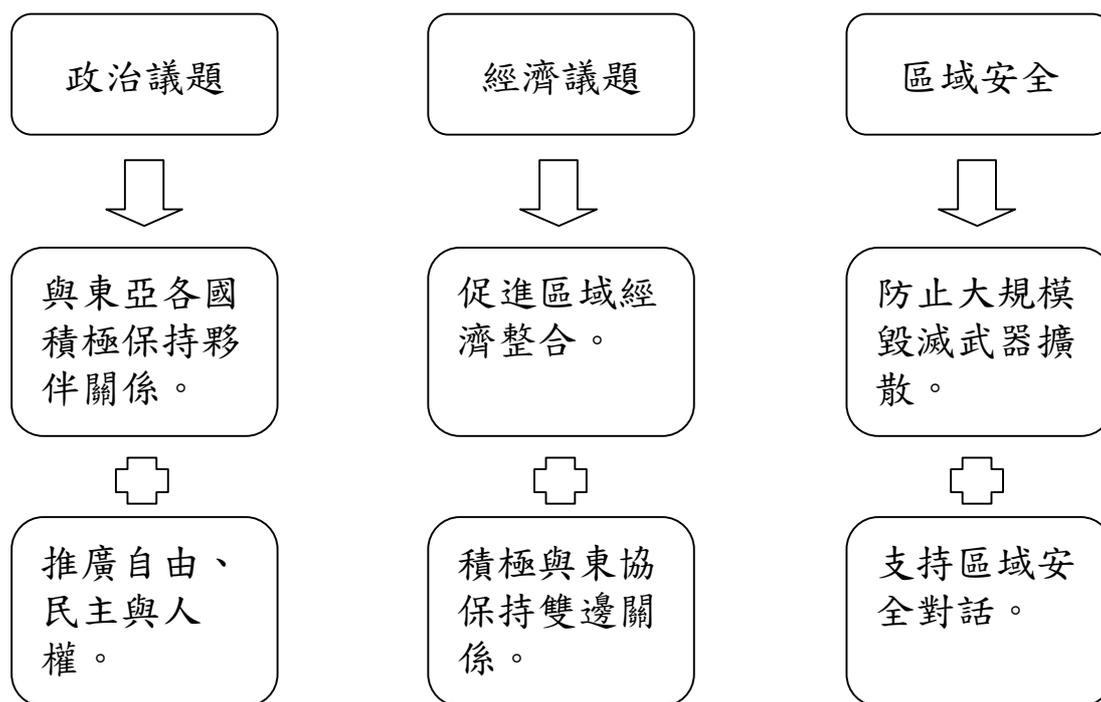


圖 3-3：美國對東亞發展政策三大主題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如同前文一再強調的，在經濟自由、政治民主化與國際安全的議題上對東亞區域盟友關係的確保與整合，成為美國在冷戰後對東亞區域的三大重要目標。爾後，隨著「九一一事件」的爆發，美國政府也將反恐議題帶入處於民族、宗教多元的東亞地區，希望能與東亞區域內各國相互合作以防止恐怖攻擊的再次產生。因此，美國希望在東亞區域內的大國——中國與日本——能負起大國該盡的責任，而對其它國家則希望能支持美國所提倡的全球反恐戰略，即便不願因內政問題以實質的軍事行動援助美國，但也可以為美國極其盟友提供情報與精神上的支持。所以，美國從 20 世紀末到現在對東亞區域的重視只增不減，表現在它各種對東亞地區的政策上。

### 第三節 東亞區域的回應

近百年來，東亞區域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或是軍事武力以及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都經歷了巨大的改變。造成這種改變的，乃是因為「全球化」這股風潮，它不只推動了東亞區域的改變，也改變了世界上其它國家的面貌。對於東亞區域來說，或許在 20 世紀末，成為世界兩大極權國家競逐的場域，是改變最大且最劇烈的時代。東亞區域內的國家，被迫站在天秤的兩端選擇其效忠的意識型態，而許多國家在這場競逐中犧牲慘重。這兩大強權對東亞區域影響甚巨，其中一方更是將其影響力延伸到現在 21 世紀，美國至今仍對東亞區域的政治、經濟以及區域安全政策有著深刻的影響。在東亞各國紛紛獲得獨立，並開始追求獨立自主的對外存在價值。最後，筆者將探討東亞區域對美國介入東亞區域事務的回應。

#### 壹、對主權的回應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亞區域各國不但紛紛取得獨立地位，同時接收了來自西方世界的意識型態，發展出與過往完全不同的政治型態；相較於過去東亞區域充滿著濃厚的君主專制氣息，現今大多數東亞區域國家都受到來自歐美政治制度的影響，採取了立憲制度作為國家政治體制新的發展方向。

而當美國將政治民主作為領導東亞區域內各國的三大策略之一，美國期待東亞區域的國家能因為政治民主化，成為跟美國有相同意識型態的盟友而非在意識型態問題上相互競爭的敵人，因為如果只是單純的意識型態競爭造成兩國的齟齬，會是最遭的情況。不過即便如此，美國所強調的民主，只不過是西方民主典範，

<sup>170</sup>其與東亞各國目前所實現的民主模式仍有所不同。而東亞區域各國，也因為傳統的道德價值信仰（例如：儒家思想），而產生所謂的「亞洲式民主」(Asian-style Democracy)。如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提到的：「與美國政治評論家的意見相反...我認為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紀律應多於民主，過度的民主會帶來紀律鬆散與無秩序狀態。」<sup>171</sup>

在這一波民主化的浪潮下，東亞區域內部分的國家針對於1993年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權會議」，共同發表一篇代表亞洲國家民主人權觀點的「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強調「人權雖是普世價值，但應銘記各國之間各有特點，並有各自不同的歷史、文化與宗教背景」，因此不贊成任何人或是國家、組織以人權「作為提供援助的條件」或「施加政治壓力的手段」。<sup>172</sup>這種聲明，清楚表示了即便美國成為東亞區域各項議題的領導者，東亞區域各國仍有其政治上的自主空間，不會完全受美國的壓迫。

## 貳、經濟議題的改變

目前主導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兩股勢力，一是由東南亞各國在1967年成立的「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另一個則是由美國領導、澳洲提議組織而成的「亞太經合會」。其中東協的成立，一開始是為了防止共產黨的擴張，而成員國政經條件差異過大，所以少有實質的經貿合作。

---

<sup>170</sup> Guillermo O'Donnell, 1997, "The Myth about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Yun-han Chu and Hung-mao Tien, 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rends and Challenges*. New York: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105-129.

<sup>171</sup> Clark Neher and Ross Marlay, 1996,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The Winds of Chang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 52.

<sup>172</sup> Christine Loh, 1995, "The Vienna Process and the Importance of Universal Standard in Asia," in Michael C. David, eds., *Human Right and Chinese Values: Legal,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5-167.

1997 年發生的東南亞金融風暴，美國的態度與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諸多援助措施失當，促使東南亞各國自覺必須建立一套適合東南亞國家政經條件的區域經濟政策方向，才能使區域內各國經濟發展穩定且不易受外來勢力干擾。

相對來說，亞太經合會就屬於開放性的論壇模式，做出的決議往往不受個別會員國接受，因此相較於東南亞國協，亞太經合會的約束力較弱。而亞太經合會的主要目標：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貿易與投資便捷化以及經濟與技術合作，<sup>173</sup>這三大主要目標分別為了：降低關稅壁壘、方便商業活動進行以及各種技術的開發合作，從中不難發現美國對亞太經合會的影響力，這些條件大多是美國為了能在東亞區域間，進行公平且自由的經濟貿易策略。亞太經合會成員國的地理區域之廣、涉及的國家與人口之多、整體經濟實力之大都成為美國在發展自身利益時所覬覦的目標。

當然，美國雖然在幫忙創建亞太地區經濟整合工作的功不可沒，但是，過於注重自身的利益，漠視其他國家產生的困境，甚至有時以經濟議題來干涉他國內政，導致在 1997 年金融風暴後，東亞區域形成了一股反美與排美的浪潮。原因在於，美方對於受金融風暴影響的亞太區域國家，所希冀能以 APEC 模式解決危機的想法予以否決，堅持使用 IMF 的紓困方案，其中相關的申請方案過於嚴苛，讓部分受害國苦不堪言。<sup>174</sup>此外，美國藉此以低價收購大批因金融風暴破產的企業，更使東亞國家的國民經濟面受到巨大的挑戰。

## 參、國際安全的發展

<sup>173</sup> 劉大年，2002，〈APEC 的回顧與展望〉，中華經濟研究院，  
<http://www.peaceforum.org.tw/filectrl/TE0110001.htm>

<sup>174</sup> Fred Bergsten, 2000, *Towards a Tripartite World*. New York: The Economist, pp. 20-22.

冷戰後，美方的東亞區域安全策略：一、防止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二、台海問題；三、南海領土主權爭議。雖然美方從未公開表示過，以上幾點策略形成的主要背景原因是因為中國在蘇聯瓦解、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呈現快速成長的趨勢，而其軍事、經濟力量的發展儼然成為美國政府眼中的下一個蘇聯。在 20 世紀末、21 世紀前，美方主要對東亞區域的國際安全政策大多是與東亞區域內各國相互合作並加強其同盟關係，為的是藉此防止中國的擴大，並拉攏中國使其即使不是合作夥伴，也不致於成為必須與之競爭的對手。

隨著「九一一事件」的爆發，改變了美國對外安全政策的方向，「全球反恐」一詞，頓時成為全世紀所注重的焦點。由於「九一一事件」的震撼力非比尋常，世界各國大多願意與美國配合，甚至是東南亞國協中許多信奉伊斯蘭教之國家，願意在 2001 年與美國發展跨單位抵抗恐怖主義夥伴關係(Inter-Agency Partnership to Fight Terrorism)。<sup>175</sup>

東南亞國協的加入對於美國來說猶如一劑強心針，因為這與美國大力提倡「區域安全合作」相符，透過建設性的合作交流、溝通以及增進國與國之間的軍事互信與軍事透明程度，這完全正中美國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由「美國領導，責任分攤」的政策模式。<sup>176</sup>更令美方感到振奮的是中國方面也同意加入這場反恐戰爭的行列，以同樣身為聯合國會員理事國的身分來支持美方對國際安全的政策推動，使得美方能無後顧之憂的對付恐怖份子。<sup>177</sup>

---

<sup>175</sup> 黃奎博、蘇紫雲，2003，〈「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全球戰略之調整〉，《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臺海局勢》。台北：大屯，頁 27。

<sup>176</sup> 同註 168。

<sup>177</sup> 同註 146。

## 第四節 小結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獨霸世界的強權國家是不容爭議的事實。世人多以為美國是因軍事實力以及科技進步造就現有實力能夠登峰造極，並藉此掌控世界、領導世界，只是光靠此二項目是否就真的能獨霸世界？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國家間的「相對權力」是主導國際關係運作的主要力量，但這股力量並不會自行運作，而時要透過決策者（個體層次）對國際局勢的認知(perception)作出決策，透過國家機器（整體層次）的運作，才能將這股力量運用自如。

美國政府自後冷戰以來，將其對外發展政策分為三個層面：一、經濟層面：美國最強大的軟實力，幾乎與世界各國都建立起貿易夥伴關係，甚至是意識型態相左的國家。靠著經濟貿易，美國在全球都有廣大的市場並掌握了各個國家的經濟脈絡，使得如有國家想與美國進行軍事上的競賽，國內的經濟勢必會先被拖垮，因此幾乎沒有任何國家敢以軍事武力脅迫美國。二、政治層面，雖然有學者認為美國所傳遞的民主、自由理念，只不過是世界上諸多意識型態中的一種，而且常常被詬病成「西方式的民主」。但無法否認的是，越來越多國家走向以自由、民主為基礎的政治體制。三、在軍事層面：美國不再以自身強大的武力為後盾，而是期盼與世界各國分攤國際安全的責任，在前兩個因素下，美國更希望以合作、談判的方式取代衝突與對立。因此，對各個區域國家都採取「預防性防禦」的策略，以交往或介入、調停的方式塑造美國相對安全的環境。

正因為如此，冷戰後的歷任美國總統雖然著重的重點有所不同，但均以此三項原則為主軸發展對外關係。在老布希時期，依

靠著「世界新秩序」來維持美國在世界領導地位下的權力與正當性之穩定，並猶如世界警察般維護全球政、經局勢之安全；在柯林頓時期，全球化概念取代了老布希的「世界新秩序」，以經濟力量為出發，大幅發展軟實力的結果，造就了世界繁榮。世界維持了短暫的和平，以經濟協商取代了軍事衝突，美國也因此大幅受惠；在小布希時期，為了抑止恐怖主義的盛行，開始調整美國在全球戰略的佈局，加強與東亞區域之關係、以武力來領導區域安全政策，與中國聯手合作打擊恐怖份子。幾位不同領導風格的總統，以其個人的決策引領了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對外政策發展出不同的走向，也驗證了新古典現實主義所主張的，「權力」必須透過決策者與國內政治的「承接傳送」，才會形成國際關係中的政策基礎，所以外交決策行為無法排除決策者與國內政治的影響力。<sup>178</sup>

---

<sup>178</sup> 洪銘德，2008，〈從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布希主義的根源〉，《國會月刊》，第36卷，第2期，頁40-61。



## 第四章 冷戰後中國在東亞區域議題的策略

東亞區域在 20 世紀末期，成為世界強權爭奪區域政治、經濟領導權的激烈場域。無論是因全球戰略佈局而將影響力深入東亞的美國，還是近幾年經歷改革開放之後崛起速度驚人、又希望建立獨立自主國際地位的中國，又或者是在東亞區域內各個國家為了各自的利益與生存空間產生的結盟與合作組織，目的都是為了分食東亞市場這塊大餅。東亞地區長期以來充斥著歷史問題、現實安全、經濟發展等議題，而中國在經濟改革開放後決心與世界接軌，以區域主義為基礎，開始積極倡議建構和平的區域環境以及致力推動敦親睦鄰的外交政策。

中國近年來，透過經濟和安全利益的接觸(engagement)與合作來滿足與東亞區域的互動，一方面與個別國家發展雙邊關係，另一方面則透過多邊運作的過程，積極提昇正式的區域制度以加強彼此的合作。中國官方也一再重申，中國不會也不願，不管是在亞洲或是在其他地區，成為霸權。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而論，主要是避免以及防止區域間的聯盟對中國的安全利益產生威脅。另外，美國是現今最有可能挑戰中國主權的國家，所以中國需要與東亞國家建立平衡關係（至少能將這些國家試圖圍堵中國的欲望降低或中立化），並重新在東亞地區建立三角的安全環境。<sup>179</sup>

本文既然依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主張，那著重的焦點自然放在政治菁英之人格特質、價值信仰等層面。尤其是中國領導人的理念意志一直以來扮演著指揮中國政府機關決策的關鍵性力量，

---

<sup>179</sup> 宋興洲，2011，《中國東亞外交政策大綱》。台中：東海大學政治系，頁 1。

這也正符合新古典現實主義所認為的，「權力」需透過決策者與國內政治的傳接才會產生效用，而一國之對外政策也就無法排除決策者與國內政治的影響。筆者將在此章探討近代中國的三位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以及胡錦濤，如何運用「權力」達到影響對東亞以及美國的政策之發展與運用。接著，筆者將以中國政府在受到領導者「權力」運用的情況下，探討中國對外政策的發展與調整。最後，則是東亞國家與組織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與改變所作出的回應。

## 第一節 領導階層的對東亞政策

學者羅斯諾(James N. Rosenau)認為任何政府在環境改變下，為了適應新的環境也會改變自己讓自身適應新的環境，而外交政策就是政治系統面對國內或國外環境挑戰下的反應，而變化又可分為內在及外在兩種，種類包括人事、政治，以及社會經濟變化。<sup>180</sup>另外，就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關係密切，而且政治和經濟的動態性也彼此相關。也就是，國內政治的動態性是促成外交政策改變的原因。例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為了維持其政權並防止國內動亂影響穩定，乃採取「外交以服務於國內經濟建設」。

而學者 Rose 認為，「外交政策的選擇是由實際的政治領袖和精英所決定，所以他們在相對權力的認知(perceptions)上很重要，不僅僅是物質力量的相對數量而已。」<sup>181</sup>同樣地，Zakaria 也主張，「政治人物，不是國家，是國際事物的主要行動者，而他們對權

---

<sup>180</sup> James N. Rosenau, 1981, *The Study of Political Adaptation*. London: Frances Pinter, pp. 47-49.

<sup>181</sup> Gideon Rose,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pp. 144-172.

力轉換的認知，而不是客觀的手段，則是關鍵」。<sup>182</sup>換句話說，國內的穩定，是部分透過與東亞區域的接觸而保證經濟成長，而且是確信沒有外來政治和經濟的挑戰，方能維持。所以筆者將在此一章節，透過探究在冷戰結束後中國的三位領導者，如何以自身對國際局勢的認知、對國內政治的判斷影響中國整體對外決策的方向。

## 壹、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指導策略

伴隨著先經濟後國防的富國強兵政策，中國經濟實力得以快速增長、軍事武力也因此而增強，中國的政治影響力日漸擴大，帶給西方國家潛在的威脅感。西方國家認為，假若中國在此時任意倒向美蘇兩強權的其中一方，將可能會造成二極體系的失衡，這不是世界各國所樂見的情況。對於美國來說，它更不希望中國的崛起，造成共產勢力有能力一舉奪下東亞的領導權，並向歐洲大陸繼續擴張，因此，美國積極的尋求與中國當局進行溝通與談判的管道，因此，即便無法拉攏中國成為的盟友，但美國也不願讓中國成為強大的競爭敵手。

而在 1989 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藉此鎮壓希望能改革政治風氣的年輕人。這項行為，深深地影響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觀感，更加深了世界各國對中國抗拒。不過，此時期的美國領導者——老布希，憑藉其個人經驗，做出政策調整；另外，事件爆發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緊急處理，讓整起事件最後能平安落幕。筆者將從此介紹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鄧小平如何處理此項危機，並藉此改變中國整體政策的走向，以因應國際環境的挑戰。

---

<sup>182</sup> Fareed Zakaria,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14.

## 一、韜光養晦，改變發展策略

在鄧小平執政時期，影響中國國際形象最嚴重的事件乃是在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當時正值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紛紛垮台之際，中國抗蘇的戰略價值消失，使得此一事件爆發後，中國受到世界各國的聯合抵制。<sup>183</sup>在面對世界各國施以的經濟制裁以及政治遏制之際，中國國內局勢也更顯混亂，有許多人難以保持冷靜，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也有人希望能夠向解體後的蘇聯學習，向資本主義靠攏。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最終以「韜光養晦」等二十八字，來因應外界如潮水般的批評。<sup>184</sup>而在國際關係上，有賴當時的老布希政府的對中國局勢的認知與東亞政策走向，使得中國並未受到「長期」的處罰，只獲得象徵性的懲罰。<sup>185</sup>

「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政府於1989年6月24日召開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宣示，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對外政策不變，並會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與其他國家發展關係。<sup>186</sup>1990年3月，鄧小平指出，中國對外政策還是兩條，第一條是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新政經秩序。維持與所有國家往來，對蘇聯和美國更要加強往來，不再搞意識型態的爭論。鄧小平指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五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而和平共處五

<sup>183</sup> 許志嘉，2000，《中國外交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台北：水牛，頁31。

<sup>184</sup> 這「廿八字方針」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善於守拙、絕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摘錄自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頁320-321、353、363。

<sup>185</sup> 老布希憑藉其曾擔任駐中共聯絡處主任時的觀察，認為不適宜孤立中國，反而強調因「持續保持交往」，他相信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助於政治改革，因此他選擇暫停雙方領導人與政府層級的互動、停止武器販售與國際金援。同註118。

<sup>186</sup> 中國中央文獻研究室，1991，〈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中）》。北京：人民出版社，頁545。

原則不僅成為與他國簽署雙邊條約、公報、宣言、聲明等國際性文件中得到了確認，也得到聯合國以及各區域組織所通過的宣言與決議書的肯定。鄧小平順應了冷戰結束後世界多極化與自由民主化的潮流，適時改變中國對外發展關係，藉以讓中國趕上了國際局勢的變化。<sup>187</sup>

## 二、務實外交路線

在「天安門事件」後，於 1990 年鄧小平所構思出的基礎上，中國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地介紹了中國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內容：(一)每個國家皆有權選擇自身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二)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必須嚴格遵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三)國家之間應當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和睦共處、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四)國際爭端應通過和平方式合理解決，而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威脅；(五)最後，各國不分大小強弱都有權平等參與、協商、決定世界事務。<sup>188</sup>透過中國國際新秩序的藍圖，我們可以理解鄧小平此階段希望的是一個穩定、多元與相互尊重彼此差異性的和平國際環境，以保持他所推行的「改革開放運動」能讓中國的經濟發展能順利成長茁壯。他更在 90 年代初，將眼光放到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調整上，考量到東南亞國家的戰略價值與功用，中國與所有東南亞國家建交，形成全面性的外交關係。<sup>189</sup>

鄧小平反對亞洲安全體系，支持東協維持和平、中立的政策。亞洲安全體系的構想是由蘇聯在 1975 年時所提出的，蘇聯企圖以此聯合亞洲國家對抗美國霸權，並控制這些亞洲國家。而鄧小平

<sup>187</sup> 許玉明，2003 年，〈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與國際政治、經濟新格局〉，

<http://www.54479.com/study/shownews.asp?newsid=303>

<sup>188</sup> 王立勇，2000，〈冷戰後中國外交戰略的重大發展〉，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http://ch.shvoong.com>

<sup>189</sup> 宋興洲，2005，〈中國崛起：修正型強權或現狀型國家？〉，《全球政治評論》，第 11 期，頁 53。

知曉蘇聯此舉一方面是為了與美國抗衡，另一方面卻是為了圍堵中國的崛起，假借亞洲安全體系之名，行包圍中國之實。因此，鄧小平繼承了來自毛澤東的東亞政策思想，全力支持東協的發展並與其發展友好關係。中國反對超級強權對亞洲的統治，並反對兩大強權在東亞區域內進行的競爭。<sup>190</sup>事實上，此階段的中國政府雖然基於現實經濟利益考量而減少對西方世界的攻擊與批判，但中共反對霸權主義、反對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態度未曾改變。另外，對於主權的維護，中共更不吝於以武力維護其領土、主權的完整性，並積極推動軍事的現代化，以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區域性或全球性戰爭。<sup>191</sup>

在 1991 年南巡後，鄧小平明白到在冷戰結束後，經濟發展將成為中國不變得重要利益，主要原因是唯有透過經濟發展才得以提昇整體國力，鞏固整體國力後才能維繫中國政權以及在國際地位的穩定與安全。換句話說，鄧小平執政後期開始，將中國未來的發展利益定位在展現政權的穩定、國家安全、經濟發展以及和平統一等四個層面，而這四個層面的利益也相互的連結，使得鄧小平後的執政者們皆圍繞在這些議題上發展中國整體國力。<sup>192</sup>因此，中國自 90 年代初期對領土主權爭奪上的強硬態度，可以看出中國在鞏固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上是不容挑戰的。但就安全議題而論，中國對國家安全議題已經從反帝國霸權主義轉向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關係，更積極的與美國維持和平共處的關係，避免與之產生衝突，影響到中國未來在東亞區域的發展。

自此中國擺脫從毛澤東以來僵化的意識型態影響與孤立主義政策，透過鄧小平對國際世局的了解，進行更加務實與合作的外

---

<sup>190</sup> 同註 105，頁 288-289。

<sup>191</sup> 張雅君，2003，〈十六大後的中共外交：相互依賴深化下的利益、挑戰與政策取向〉，《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頁 1-25。

<sup>192</sup> 趙全勝，1999，《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圍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法》。台北：月旦出版社，頁 97。

交政策。中國的政經發展，一轉過往強調自力更生、政經體制封閉的形態，開始積極推動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並修正了過往激進的外交政策。展向出大國應有的風範，並透過務實的外交獲取在國際社會上應有的地位。

## 貳、江澤民時期

江澤民，中國共產黨第三代的領導人，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時接任中共總書記。其背後一直有鄧小平的陰影存在，導致上任後有幾年的光景，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無太多創新的建樹，或許是受胡耀邦與趙紫陽的影響，江澤民的作為不但保守，甚至還刻意模仿前任領導者——鄧小平。直到鄧小平在 1992 年南巡時，提出冷戰後唯有經濟發展才能提昇中國的國力，藉此發展上海、深圳、珠海等地的經濟特區，以經濟成長鞏固國家實力並維繫中國政權以及國家安全。<sup>193</sup>江澤民至此才在鄧小平的默許下，在政治、經濟與外交上做出屬於自己的風格，穩定中求發展即是江澤民執政時期最好的風格寫照。

### 一、延續中的新發展

20 世紀 90 年代初，隨著兩極體系的瓦解，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相結合，大力發展區域性經濟合作，以成為世界經濟發展與佈局的重要趨勢。而此時也正逢中共世代交替的階段，以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為核心的政治集團開始重新運作中國的整體發展政策。在遵從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對外方向上，江澤民提出一套屬於自己的見解，在遵循「相互尊重、協商一致；循序漸進、穩步發展；相互開放、不搞排他；廣泛合作、互利互惠；縮小差距、共

---

<sup>193</sup> 同上註。

同繁榮」的原則下，<sup>194</sup>中國作為日漸崛起的角色，對區域性組織投入了更多的關注。

隨著時序的演進，江澤民對於國際局勢的認知日益完善且豐富，在基於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局勢的基礎下，江澤民仍認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脈動的主流，人民要合作、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成為他的信念。他說：「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世界的力量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sup>195</sup>如同世界各國在 20 世紀末期的發展，江澤民也體悟到了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正邁向以經濟實力取代武力威脅、以溝通取代紛爭的方向，因此江澤民在鄧小平於 1992 年南巡發表講話後，方使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係，大力展開國際及區域間的經濟合作，使中國能在 20 世紀末銜接上世界發展的趨勢。

江澤民在體認到世界的多極化、經濟及國家安全的區域化是無法避免的趨勢後，為了中國往後在國際上的地位與發展，提出幾項新的構想：（一）強調各國、尤其是強國應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世界的多樣性與依存性相輔相成，多樣性產生互補性，依存性產生相互合作的需要，差異不該是發展正常關係的阻礙，而應是加強相互合作與交流、促進共同發展的動力；<sup>196</sup>（二）多極化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列強彼此以經濟相互牽制，戰爭的產生相對減少，有利國家的發展與進步；（三）多極化下，各國有競爭也有合作；有摩擦也有協調，彼此之間的關係相輔相成，可

---

<sup>194</sup> 朱陽明、王生榮、陳舟，2001，〈中國亞太安全戰略的地緣戰略基礎〉。收錄於，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頁 329。

<sup>195</sup> 江澤民，2001，《論「三個代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頁 181-182。

<sup>196</sup> 湯光鴻，2003，〈試論江澤民國際戰略理論的理論體系〉，《南京政治學院學報》，<http://www.54479.com/54479/ReadNews.asp?NewsID=444&BigClassName=&BigClassID=18&SmallClassID=17&SmallClassName=&SpecialID=24>

避免全面性的衝突產生；<sup>197</sup>

而身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的一國，江澤民也知曉自己所肩負的任務，身為世界多極體系中的一極，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積極影響其他行為國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並沒有變化，中國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加強友好往來與合作關係。江澤民先後訪問以上各洲，而副總理錢其琛在外長任內也連續六年訪問非洲國家，他也以觀察員身分列席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充分表現中國貫徹此一政策的堅定性與一貫性。

隨著影響力不斷的向上提昇，中國主動加強與世界的聯繫，不但在全球性事務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身為東亞國家的一員，更加關注在東亞區域內的發展。自 1990 年中國與印度恢復了邦交，緊接著又與新加坡、汶萊建立了外交關係，與東協的關係進展到一個新的階段。1991 年，江澤民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實現了與越南關係的正常化，並以和平解決兩國在領土上的爭議。<sup>198</sup>此一階段的中國，在江澤民繼承鄧小平外交思想上，形成以和平穩定為基礎的發展政策，無論是與西方強權之間的關係，還是與東亞鄰國之間的關係，皆積極展開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風範，積極改善、穩定與發展和世界的合作。

## 二、積極建立國際新秩序

中國在經歷 80 年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江澤民的和平發展原則，這十幾年來快速的發展讓積弱不振的

---

<sup>197</sup> 羅元志，2004，《冷戰後中國的戰略選擇對亞太安全體制形成之影響》，碩士論文，台灣私立東海大學，頁 86-87。

<sup>198</sup> 同註 114。

中國，快速崛起進入了另一個全新的境界。但是挑戰也隨之而來，「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頓時成為國際之間流行的話題與專注的焦點。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因為蘇聯瓦解連帶影響共產勢力對此一區域的影響力，而從冷戰前就與東亞各國積極互動的美國，儼然成為此一區域內的新興強權。此時的中國也因為近幾年改革的結果，總體經濟實力也蒸蒸日上，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發展，還是外交上與東亞各國關係的好轉，均有長足的進步，加上歷史與地緣關係，使其成為東亞區域中的強權接班人的態勢也越趨明顯。<sup>199</sup>

這種氛圍之下，江澤民轉化了過往中國意識型態中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他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的繼承與發展，是中國未來在全球化下發展的理論基礎。江澤民認為，只要不去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藉由經濟全球化的機會發展經濟，中國政權的威望也可以因此而保住。<sup>200</sup>在此前提之下，加上適逢美國對東亞政策調整，中美之間在國際與東亞區域展開一段新的互動關係，讓許多評論家認為中國未來將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競爭者」，<sup>201</sup>而這也符合江澤民所期待的和平發展，並非一味的敵對關係。

1997年2月鄧小平過世後，同年3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中強調，中國採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繼續在和平共處五原則基礎上發展對外關係，並將持續採取對外開放政策，進一步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經貿關係，同年10月底至11月初，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美國進行正式國事訪問。江澤民訪美期間，兩國聯合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兩國元首決心致力於

<sup>199</sup> Denny Roy, 1994, "Hegemony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pp. 149-168.

<sup>200</sup> 同註 38。

<sup>201</sup> Thomas E. Ricks, 2000, "Changing Winds of U. S. Defense Strategy," *Herald International Tribune*, May, 2000, pp.27-28.

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也就是建立全面、長期、穩定的雙邊關係。而從當年美國國家戰略報告，將中國從原先的「非敵非友」國家專列為應努力爭取增進合作的主要對象，<sup>202</sup>可以得知江澤民這趟美國之行，加強了兩國對彼此相互依賴共存的程度。

另外，同年在江澤民的強烈邀請之下，中國、日本、南韓三個主要東亞國家，加入東協 10 國的多邊對話合作機制，「東協加三」的合作範圍廣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多元合作的方向。中國更在 2001 年汶萊的非正式高峰會中提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構想，此種構想建立在雙邊貿易公平化與自由化的目的之下。而中國在 21 世紀初積極的與東協組織進行溝通，主要是因為中國想以「亞洲主義」來對抗以美國為首的「亞太主義」開放性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也期待東協國家能給予支持一同抵抗美國在東亞的戰略目標。<sup>203</sup>

上述的對外政策，其後在中國舉行的「十六大」會中，由江澤民的政治報告上可以見到：「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我們始終不渝的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現今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我們主張建立公正合理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主張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多樣化；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我們繼續改善和發達國家的關係，……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擴大共同利益，解決分歧。……我們將繼續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團結與合作，……。我們將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sup>204</sup>在鄧小平去世後，中共第三代政權終於能毫

---

<sup>202</sup> 同註 197，頁 73。

<sup>203</sup> 林若霄，2002〈由競爭走向整合：21 世紀中國與東協的安全關係〉，收錄於宋國誠編，《21 世紀中國：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卷 2》。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315-320。

<sup>204</sup> 江澤民，2002 年 11 月 17 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

無顧忌的放手一搏，而深知必須透過維護與促進世界各國共同利益來鞏固自身利益的江澤民，最終將中國帶上與世界脈動同流的方向，中國在國際上不再只是一個單獨的個體，而是成為在全球性事務與區域性事務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 參、胡錦濤時期

胡錦濤，是鄧小平過世前所隔代欽點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中共十六大後即陸續從江澤民手中接任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共中央軍委...等中共官方要職，更在之後接下國家軍委主席，成為名義上集合黨、政、軍權力於一身的中國實質領導者。而他也不負所託，在政治、經濟及外交層面上的改革令世人有目共睹。當世界面臨經濟全球化、區域性議題大行其道、國際安全備受重視以及反恐戰爭的開始，胡錦濤的新政將如何把中國帶上國際的舞台，並從跟隨者變成領航者。又，在東亞區域上，胡錦濤如何幫中國作定位以應付來自美國的壓力。胡錦濤的權力現正如日當中，其政策之方向與評價尚未有統一之意見、政策的外來發展也尚不明確，但筆者將是要探究至他上台以來的對國際事務的態度與思想，將如何引領中國在 21 世紀的發展。

### 一、繼承過往，迎向未來

時值 21 世紀初，911 事件爆發不久，身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加上歷史與地緣關係的影響，中國成為美國反恐戰爭中舉足輕重的角色，爭取中國的支持遂成為美國在東亞區域的首要任務，而這項任務間接促成中、美之間領袖級人物的對話。<sup>205</sup> 江澤民在事件發生當晚便致電慰問美國總統小布希，並在同年 10 月於

---

<sup>205</sup> 同註 150。

上海舉行的亞太經合會非領袖會議上，堅定中國反對恐怖主義的立場，2002年2月雙方在北京二次會面時，江澤民再度重申此一立場。<sup>206</sup>中美雙方在短短半年內舉行兩次高峰會，並達成若干協議，雙方的交流突破了以往只由外交部門負責的階段，高層領袖的互相拜訪，使得雙方「建設性夥伴」的關係更加密切。

身為鄧小平隔代挑選出的繼承人，胡錦濤背負著中共老一派政治菁英的期望，不過這並不表示胡錦濤必須要刻意與江澤民的政策方向做切割的舉措。相反的，胡錦濤也利用江澤民在領導中國時有用的思想，來調整自身的政策方向。在意識型態上，胡錦濤推崇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並逐步將其與馬列毛鄧的思想歸納在一起，形成屬於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思想的源頭。<sup>207</sup>其次，以「科學發展觀」為基礎的中國近代經濟發展政策，強調中國現在必須同時追求質、量的取向上邁進，不只在社會發展階段更加積極，另外在整體國力上也追求創新能力的提升。第三，在國際外交部分，胡錦濤則強調「中國必須全面融入國際體系、積極尋求與國際合作的機會，多加重視多邊主義的特徵。」<sup>208</sup>中國至此，不再急於向世界證明自身的價值，胡錦濤將焦點放在中國能在國際上的作為與角色，轉化過往領導者對外思想，演變成新的「和平、發展與合作」的國際觀。<sup>209</sup>

## 二、和諧世界的展望

時至今日，中國對待他國關係的態度仍是以鄧小平時代所確立的方針「和平共處五原則」上，追求與各國之間共同利益，

---

<sup>206</sup> 同註 142，頁 85。

<sup>207</sup> 楊開煌，2007，〈胡錦濤改革政策之繼承與變革〉，收錄於楊開煌主編，《胡錦濤政權之續與變論文集》。台北：問津堂，頁 2-3。

<sup>208</sup> 朱立群，2007，〈觀念轉變、領導能力與中國外交的變化〉，《國際政治研究》，第 7 期，頁 10。

<sup>209</sup> 俞錚、廖雷、王運才，2004 年 4 月 24 日，〈博鰲亞洲論壇 2004 年年會開幕演講〉，《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4/24/content\\_1438259.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4/24/content_1438259.htm)

並努力解決雙邊的歧見與衝突。這層關係，因為中國開始與全球性及區域性經濟組織接軌而進一步的發展，中國成為國際經濟秩序下的一部分，也得到了能影響世界經濟局勢的實力。

隨著胡錦濤在 2004 年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構想以及「全面融入國際體系、積極尋求與國際合作的機會，多加重視多邊主義的特徵」的對外關係發展趨勢，中國成為全球最受重視的政治實體之一。中國的一舉一動皆會影響世界各國，而身處其周遭的國家更是膽顫心驚。但是，在 2005 年的聯合國成立 60 年高峰會上，胡錦濤再次向世人宣示，中國將以「努力建設持久的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前提，提倡透過對話、協商、談判、合作等方式重新建構國際新秩序。又在之後，不斷拋出「和諧地區」、「和諧亞洲」的概念，「和諧世界」儼然成為胡錦濤的外交戰略框架。<sup>210</sup>在此框架下，透過正式外交途徑的方式影響他國政策，胡錦濤提出「全方面外交」政策，以「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外交為舞台」來進行外交戰略佈局。<sup>211</sup>

在上述政策下，中國與東亞國家紛紛進行外交政策的調整。

(一) 對東協：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加入《東南亞合作友好合作條約》，支持東協在區域內的主導地位，反對外來強權的干預；並與東協合作磋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為東協組織不可或缺的夥伴。(二) 對東北亞國家：無論是在歷史爭議還是領土主權爭議上，中國拋棄過往的成見，以更實質的國家利益為考量，強調「區域安全比歷史爭議重要」、「現在和未來的發展比過往的歷史重要」，以此在經濟議題、國際安全及反恐議題上與東北亞國家建立合作關係。<sup>212</sup>

<sup>210</sup> 2006 年 6 月 15 日，胡錦濤在「上海合作組織第六次元首高峰會」致詞時提出共建「和諧地區」的概念。同年 6 月 17 日則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上提出共建「和諧亞洲」。

<sup>211</sup> 楊潔勉，2005，《大合作：變化中的世界和中國國際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275。

<sup>212</sup> 章旦隆，2007，〈胡錦濤的對外政策：戰略目標與策略運用〉，收錄於楊開煌主編，《胡錦濤政權

中國自鄧小平以來政策的延續精神，從務實外交、確保國家利益為主的現實主義態度，到江澤民對外的敦親睦鄰、積極參與，最後至胡錦濤和諧世界的概念，讓中國快速的與周遭國家建立起友好關係，而儘管中國的崛起仍對美國的經濟帶來極大的好處，但在其他層面的影響卻讓美國嚴肅以對，這或許是中國領導者在實行其外交政策時所沒想到的發展。(見圖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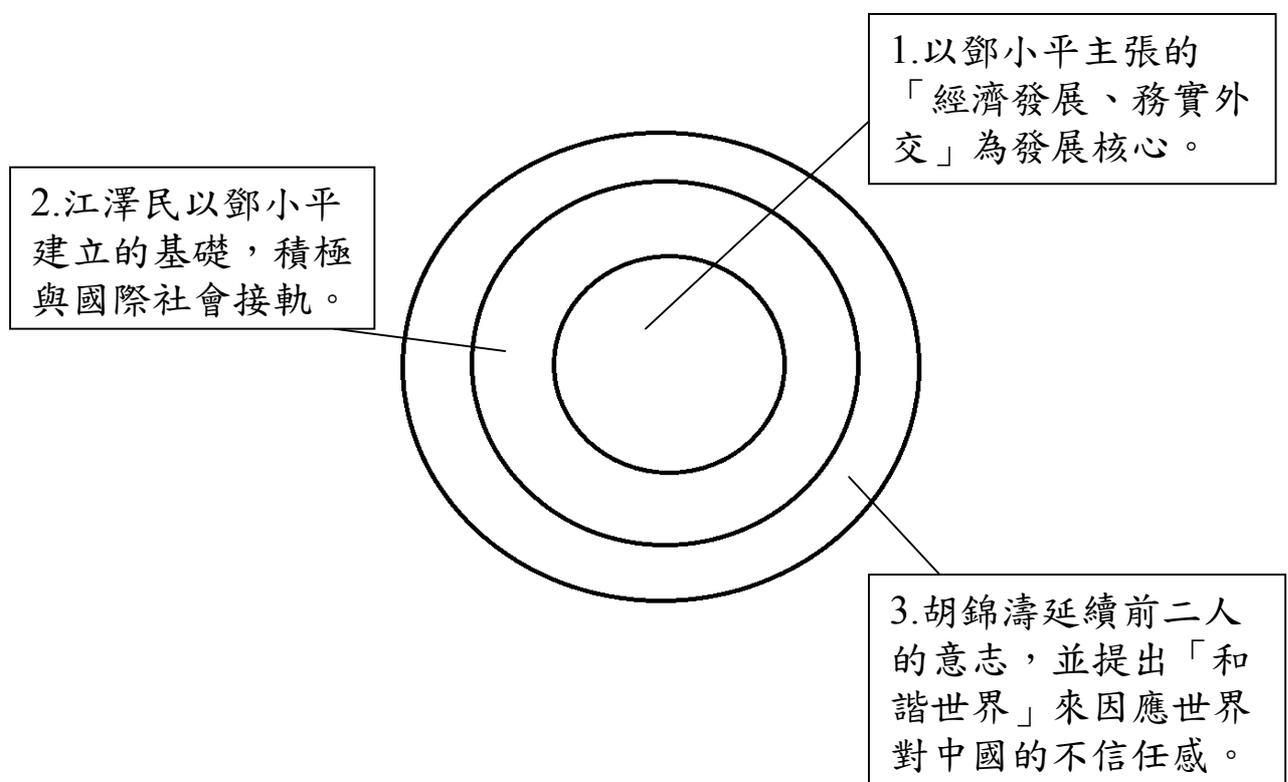


圖 4-1：中國對外政策的延續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 第二節 中國政府對東亞議題的調整與改變

---

之續與變論文集》。台北：問津堂，頁 300-312。

基本上，從中國在冷戰後三位領導者對東亞區域議題的調整上，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現今發展的大策略(grand strategy)有四個主要目標。第一，維持國內的政治穩定：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二，保護領土的完整：透過外交協議的方式進行，而非透過軍事手段；第三，發展強大的軍事力量：抵制西方軍事技術的主宰，以保障國家利益不受威脅；第四，加強其地緣政治的影響力：保持政治槓桿作用(political leverage，即以政治作為手段達成目標)、獲得經濟利益、並取得能源。簡言之，中國目前的大策略，可以說是經過「算計」(calculative)，並由三個部分所組成：為促進經濟成長，不再以意識形態作為途徑；慎重地限制使用武力；以及擴大參與區域性及全球性多邊論壇。<sup>213</sup>

而冷戰結束後的國際局勢朝向政治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替正在進行「改革、開放」運動的中國，找到一條累積自身實力並以此獲取資源的方式。爾後，區域化的盛行，使得美國無法以一己之力干預全球事務，逼迫其必須與各區域性組織合作，而中國正因為身處東亞區域佔有地利與戰略位置之便，加上改革成果顯現，以此在美國介入東亞事務之際與之相互競逐。目前東亞區域，仍處於由美國所主宰的霸權穩定與權力平衡下的和平狀態。不過，中國雖目前並未嘗試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政經秩序，但仍維持一貫的敦親睦鄰對外方針，其實力增長之驚人，又和平崛起政策之思想頗受東協國家支持，使中國在東亞區域議題上逐漸有與美國分庭抗禮之勢態。

## 壹、經貿發展

在鄧小平時期開始追求以經濟發展代替整體國力發展的中國

---

<sup>213</sup> 同註 179。

整體政策走向，促使接下來的幾十年間，中國以經濟政策為主體的方展方向，率先體現在東協組織中。以東協為主的多邊合作呈現著蓬勃發展的趨勢，但穩固的多邊安全體制尚未建立。冷戰後，由於地區經濟發展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成立，使得東亞地區各國紛紛萌生建立政治與安全合作的意識。澳大利亞外長曾建議過效法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的模式來建立亞太安全合作會議；加拿大提出過召開北太平洋安全會議；日本則在 1991 於東協會議上，提出建立地區性安全論壇的構想。<sup>214</sup>

因為懲越戰爭，東協才認知到中國在區域發展議題上與東協有相同的戰略利益考量，而中國本身就是維持區域安全性的主要角色。又，在全球金融風暴的爆發，改變了中國的產業結構，與過去的差別是，過去依賴企業被動的自我調整，現在改由政府積極補助強勢誘導。中國現今經濟政策大規模重整的趨勢，以日益明顯。除了發展策略的改變，強力擴大內需，將市場重心從國際轉回國內，也是中國處理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的重點之一。中國政府將此一政策分為兩個層次，第一，是區域整合層次，二是國家發展層次。就區域整合層次來看，外來資金流入減少以及外部市場的萎縮同樣衝擊著中國與東協，此時中國必須加強與東協的合作，並且與亞洲地區的其他國家例如：日本、韓國加強交流。此一思維，受到東協秘書處秘書長蘇林(Surin Pitsuwan)的支持，他亦認為區域合作將會是應對當今全球經濟危機的良方，因為即便強大如美國，也無法自行解決此一危機。<sup>215</sup>

整體而論，中國與東亞國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上，有互補也有相互競爭，中國政府是否能嚴守本身自改革以來一貫自我要求

---

<sup>214</sup> 方華，2000，〈亞太安全架構的現狀、趨勢集中國的作用〉，《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 期，頁 11。

<sup>215</sup> 王勉、李佳鵬，2008，《應對金融危機孤掌難鳴，中國與東協需攜手渡難關》。引述自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459154.html>。

的立場，保持「和平發展」、「多邊公平公正」、「多方合作」等目標邁進，成為未來值得關注的焦點。

## 貳、外交決策的調整

中國在面臨受到美國所主導的東亞局勢時，一直以來期待能由多邊發展來取代由美國單獨支配的局面。而從中國對外政策來看，對東亞區域各國效果並不一致。在東北亞，自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在亞太區域的經濟與外交影響力大增。在「和平崛起」的條件下，中國獲得快速的發展，且並未因此與美國交惡。而面對北韓核武問題，在美國極需中國此一盟友的支持下，中國適時透過經濟援助向北韓提出終止核武發展的要求，調解東亞內不穩的政治局勢，並展現出中國對東亞區域事務的影響力。<sup>216</sup>

中國對美國政策又以 1982 年中共十二大為界，分為前後期。前期，以戰略三角關係為主，中美聯手抗蘇，中美戰略合作程度較高。1982 年 9 月和 12 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和五屆人大五次會議後，則確立了「中國在同外國的關係中將不從屬於任何超級大國或大國集團，不同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結成同盟或戰略關係，也不聯合一家去反對另一家；在國際事務中，中國根據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國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來決定自己的立場；中國希望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和蘇聯改善和發展關係。」這便是至今中國政府仍在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接著在胡錦濤的「全面性外交」政策的意識型態下，中國對國際組織和多邊國際機制採取積極參與的態度。此時的中國了解到，為了維持大國的地位，就必須與世界體系接軌，並採取多邊

---

<sup>216</sup> Michael Mazarr, 1997, *North Korea and the Bomb: A case Study in Nonprolifera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p. 96.

主義的思維；且正因國際局勢朝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國際事務因此更加複雜化，惟有以「合作、對話、減少對抗」，才能確保國家的利益。這種思考脈絡下的中國政府，對於東協各國的睦鄰政策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因為東協一方面在維持美、中、日三國在此區域的權力平衡，另一方面，也未忽視俄羅斯與印度的影響；東協的政策使得各強權無法在東南亞區域獲得絕對性的支配權力。<sup>217</sup>因此這與胡錦濤所希望的「和平崛起」的目標一致，並中國在此曾關係上獲得一定程度的戰略利益。故中國全力支持東協的權力均衡策略，並願協助東協的發展。

## 參、與美國在東亞區域的競合

冷戰的結束，造成國際局勢劇烈變化，中美關係經歷了一連串艱辛的過程。隨著合力抗蘇的戰略基礎消失，美國對自身實力的過度膨脹以及藉著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趁機干預中國內政的結果，導致中美雙方關係一度緊張。不過，世界的變革不如美國單方面所想的朝向美國單極體系傾斜。相反的，在冷戰期間受到美、蘇影響而起的區域組織，彼此相互依賴、相互制衡，整體世界走向多極化的結果日益明顯。對此，正如同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多極化趨勢在全球或地區範圍內，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新的發展，世界上出現各種新的分化和組合……。多極化趨勢的發展，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及繁榮。」<sup>218</sup>

如果我們已不同的角度來觀察美、中兩國的關係，可以發現：

一、以全球層面的角度：中美兩國在 90 年代後有共同的利益基礎：（一）維繫全球及區域內的和平穩定並促進經濟發展；（二）

<sup>217</sup> 蘇浩，2003，《亞太合作安全研究：從啞鈴到橄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 167-168。

<sup>218</sup> 江澤民，1997，《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46-47。

防止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擴散；(三) 打擊國際犯罪組織以及阻止恐怖主義的發生；(四) 維護生態環境；(五) 維護世界金融體系正常運作。因此，中美兩國在 90 年代開始就對東亞區域的發展有良性的互動。

二、區域層面的角度：身處東亞的中國以及自認為是亞太國家中一員的美國，更應該在東亞區域內加強彼此的合作以面對各種挑戰，為東亞區域的穩定與繁榮做出貢獻。三、從雙邊關係的角度上觀之，兩國加強雙邊經貿、法律、環保、能源、科技、教育和文化的交流合作以及兩國軍隊往來等方面不僅以獲得相當程度的發展，而且其雙邊關係更會刺激周邊國家的快速成長。

在 90 年代後，中、美的關係曾因許多事件而使兩國產生齟齬，導致雙邊關係偶爾會急遽降溫或產生僵局。但這些齟齬大多只造成兩邊在外交關係上的交惡，並未升高到政治、經濟及軍事層面，尤其是 1997 年後雙邊建立了「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後，兩方的共同目標顯得更為明確。2006 年雙方更進一步建立部長級「戰略經濟對話」，而現今對話層級有更向上延伸的趨勢。在經貿議題合作關係上，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一大是歐盟），而中國在 2007 年取代加拿大成為美國的最大進口國。2007 年雙邊貿易總值增長了 15%，其中，中國從美國進口 693.8 億美元，出口 2,327 億美元，順差達到 1,633.2 億美元之譜。<sup>219</sup>

綜合上述，中國與美國在東亞區域實質上應該是合作取向大於競爭取向，雙方在各層面的關係上都緊緊相扣，如果只有單一國家存在勢必會導致東亞區域局勢失衡。中國在鄧小平高瞻遠矚的情況下，以務實的經濟利益取向以及和平共存的態度介入東亞區域事務，改變過往中國給他國的不良印象，而其後繼者無論是

<sup>219</sup> 相關數字彙整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網站：<http://zhs.mofcom.gov.cn/>。

江澤民還是胡錦濤也謹守此一政策脈絡，造就了現今中國在東亞區域間良好的發展環境。而美國也在各領導人對中國的改觀之下，以溝通、利誘的方式將中國帶進世界體系之中，並讓其遵守國際規範。這不但符合美國的利益，也順應了中國從 20 世紀末就開始希冀的情境——與世界接軌。

### 第三節 東亞區域的回應

歷史上記載著許多分分合合的故事，不只是人，就連國家也是一樣，中國歷史五千年來與周遭國家的互動也是如此紛紛嚷嚷的渡過。幾千年前，中國自視為天朝上國，與周邊國的關係與其說是在相互交流，不如說是在享受「供奉」的感覺，古時的中國並未產生任何平等對待他國的思想，而自認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都優於其他「番邦」。事實上，幾千年前的中國的確有此影響力，甚至時至 21 世紀，仍可見到古中國文化對中國周遭國家的影響，例如：日本的漢化、東南亞國家的儒學...等。

時至今日，中國雖已不復千年前之榮光，但經歷了內憂外患以及世界戰爭的洗禮，新的中國又再度走上世界的舞台。在一連串的政治鬥爭下，中國政權交付至共產黨手中，而同一時間，世界也因民主與專制、資本與共產等意識型態的劃分，而一分為二。在 1980 年代末，世界兩極體系的競爭終於落幕，象徵西方霸權的美國正式成為全球性霸權，對於正要發展崛起的中國形成了在各方面的威脅，尤其是中國所在的東亞區域因為之前意識型態競爭的關係，許多國家對中國都採取相對不友好的態度，使得中國在東亞的發展困難重重，更遑論在全球的發展了。不過，隨著近幾十年來中國領導者對政治改革的努力，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國開始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原則，不再以意識型態分歧的緣由影響中國的對外政策開始，接著是江澤民的「和平、發展」以及胡

錦濤的「和諧世界」的概念，讓東亞各國紛紛有與中國建立起建設性的夥伴關係的想法。這種想法根基於，冷戰後全球性霸權的美國介入東亞區域事務有關。在這一章節，筆者將探究有關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這幾十年間，東亞各國對中國對外政策的回應。

## 壹、政治主權

美國為了解決中國「崛起」、俄羅斯「再起」的發展可能、以及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從老布希時代開始就積極在東亞區域間佈署軍力，無論是「新圍堵政策」還是後來柯林頓政府的「新太平洋共同體」，都是為了加強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安全佈局。因此，大部分的東亞國家，紛紛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表達對美國霸權主義的不滿，並提倡全球多極化發展的必要性。<sup>220</sup>而自從 911 事件爆發後，區域反恐議題更讓中國成為東亞區域內能呼風喚雨的角色。美國積極的拉攏中國加入「反恐戰爭」的行列、東協各國在歷史與政治上對中國的認同、中國的戰略位置與軍事實力、以及中國與東亞區域中不安定因素的關聯，使得中國在東亞區域安全議題上能有所影響力。

當中國領導者在 911 事件後提出：一、世界威脅呈現多元化、全球化的趨勢，共同利益變多、相互依存度提昇，世界各國應以聯合國組織為主導，透過談判和平解決紛爭、停止軍備競賽防止恐怖平衡的產生。二、憑藉著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原則，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促進共同經濟利益，並進行安全合作。三、東亞區域的合作將落實在上海合作組織與東協區域論壇中。<sup>221</sup>此宣言無疑是在 21 世紀後中國向亞太各國宣示自己不但仍將遵守既

<sup>220</sup> 蔡東杰，2007，《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頁 61-63。

<sup>221</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7 年 7 月 31 日，〈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vhy/1136/1138/t4549.htm>。

定的「和平共處」原則，更將遵守聯合國的制度與規範。而憑著中國和平友善的外交態度，以及在經濟與文化議題上的尊重，東亞各國漸漸有推崇中國之意，讓中國在東亞區域內有躍居領導地位的意味。

## 貳、經濟議題

中國在經歷經濟改革與對「市場」思想上的修正，開啟了中國近幾十年來未曾有的發展新局面。中國開始強調以經濟穩定發展來代替過往的軍事發展，藉此換取國家的穩定與繁榮，並以提升經濟實力換取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地位的提昇。所以，參與區域性經濟組織成為中國邁入國際的第一步，也是東亞各國與中國最多接觸的地方。接下來將以東協與亞太經合會的發展，來探討東亞區域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回應。

### 一、東協與中國

中國的雙邊關係直到 1980 年代，才因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影響有所好轉。對東協而言，一個好戰的共產國家出現將不利區域安全及經濟的發展，而且可能引起其他強權再次介入產生更大的衝突。因此，透過與中國聯手，共同解決越南侵攻中南半島事件，東協與中國對東亞區域的和平穩定出現意識上的一致性。<sup>222</sup>不過，對於經濟利益的競爭，中國國內市場龐大的商機，讓許多跨國企業紛紛將資金轉進，造成東協的外資流入減少；而中國進幾年來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成長驚人，促使東協擔心中國會因此擴充軍備，以武力解決領土糾紛，這對在南海與中國有領土糾紛的東協各國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壓力。

---

<sup>222</sup> 同註 116，頁 150-151。

## 二、亞太經合會

中國在 20 世紀末幾位領導者意識型態代領下，將加入亞太經合會作為與國際接軌的重要管道。亞太經合會對中國在經濟層面的重要性，主要是藉此打破過往中國商品在對外貿易上所受到的歧視，而且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目標並不以和東亞國家發展互賴關係為侷限，而亞太經合會正式達成此一目標的階段性舞台。因此，當中國提出超越其他會員國的開放計畫，表現出中國為了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所做出的積極行動。<sup>223</sup> 中國在亞太經合會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爭取區域內各國的認同，企圖結合東亞諸國對抗美國與日本的影響力，中國不希望亞太經合會成為美國的東亞區域政治和區域安全的戰略目標，因此，中國曾以行動反對外國政府干涉他國區域政務為由，向美方抗議。而這也符合了東亞其他國家所希冀的主權獨立、以及自主的外交生存空間的思想。

## 參、區域安全議題

隨著經濟發展的快速，中國企圖在外貿和資金層面加速與東南亞和日本經濟的整合，成為穩定東亞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心，而中國經濟的復興，伴隨而來的是政治影響力的擴張以及潛在軍事威脅的可能，這是 21 世紀下東亞區域各國必須正視的問題。這其中避諱衍生出各種國際關係上的衝突與挑戰，尤其是中國與東亞國家間的關係，更成為必須要解決的首要議題，世界最終仍將接受中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的強權，即便它不是全球最強盛的強權，也會成為強權之一。<sup>224</sup>

<sup>223</sup> 吳玲君，2001，〈中共 APEC 策略與角色的轉變：新現實主義的分析〉，《問題與研究》，第四十卷，第三期。頁 5-10。

<sup>224</sup> 林蔭庭譯，John Naisbitt 著，1996，《亞洲大趨勢》。台北：天下文化，頁 23-34。

當中國以和平崛起的姿態來發展對外關係時，東協即利用此點來平衡美、日對東亞安全議題上的主導性，形成以美、中、日三足鼎立的情況。儘管東協國家已經發覺中國將對東亞區域事務有潛在的影響力，但大多數的國家仍願意相信與中國透過經濟發展為前提的交往，將會約束中國這個崛起中的強權。而透過 1997 年的金融風暴後，東協國家更難以抗拒中國在政治、經濟以及區域安全議題上的影響能力，大多數的東亞國家被北京政府低姿態與友善支持者的形象給深深吸引，使得東亞各國對中國整提形象大大的提升。<sup>225</sup> 中國，已不再是區域內的威脅，而是主要的合作對象與整合的推行者。

## 第四節 小結

中國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威權統治之下，終於在鄧小平的改革下，開始朝向國際體系積極的發展。不再執著於意識型態的對決，而是以更為實務的經濟利益，來面對世界各國的發展以及全球化的政治局勢。另外，在外交事務上，中國秉持著和平外交的理念，持續以「敦親睦鄰」的態度與周遭國家交往。比起美國，同樣身為東亞國家一員的中國，或許更能感受到來自東亞國家所期待的在國際上應獲得的待遇，因此，中國在東亞各國間的影響力開始慢慢累積了起來。

北京政府和平友好的對外政策以及對內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一方面顯示出中國在與世界接觸後了解到要富強整體國力的必要策略，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對內統治權的再強化。在這種發展思維下，區域和國際環境的穩定是絕對必要的，穩定的環境可以讓中

---

<sup>225</sup> 楊昊，2009，〈東協—中國關係的新局面與新思維〉，「東亞政經論壇」學術研討會，新世紀東亞與台灣政經發展教學研究計畫、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治經濟學研究所主辦，國立成功大學。

國更快速的發展經濟，進而提昇整體國力的進步，並在國際上獲得更重要的影響力。

自 1985 年鄧小平揭櫫世界進入和平發展時期的說法後，其實就宣告了中國未來政治經濟的佈局方向，以經濟為首的發展策略，帶動國家整體實力的向上提昇，成為中國在後冷戰時期的第一階段改變。之後，隨著江澤民的上台，中國更加積極的參與世界體系，讓自己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員不再讓人輕易忽視，更開始承擔起大國應有的責任。現今，在胡錦濤的領導下，以「和諧世界」為口號，<sup>226</sup>中國開始致力於改善與周邊國家之關係，希望能以和平大國的身分依存於世界體系之中。所以，對於後冷戰時期至今的中國來說，依靠著領導者判斷所建構起來的經濟與對外政策，成為中國在全球策略上追求自身發展的重要手段。

中國從領導者至政府決策的對外策略的改變，其本質上都是中國對東亞各國在中國崛起時產生的疑慮所作出的回應。藉此我們可以理解中國領導者們對於周邊鄰國對中國的觀感甚為重視，這種外交政策思維的轉變，可從本文所強調的新古典現實主義下的視角得到一定的解釋，因此當我們在討論近十幾年來中國崛起所產生的各種現象時，就不易再被綁手綁腳，能以更廣闊的視野來探究其與美國以及其他東亞國家間的互動關係。

---

<sup>226</sup> 同註 209。

## 第五章 東亞區域對美、中的態度與回應

自二十世紀末，全球化的浪潮影響了整個國際社會的生態。全球化的影響隨著科技的進步、透過資本主義的流動，遍及了世界各個角落。其波及層面之廣，上至政治、經濟、國家安全，下至文化、娛樂與生活。而國家在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先面對區域化的過程，原因之一，是國家的行為會受其周遭鄰國的影響，在政治、經濟、及國家安全等議題上，相互聯繫並建立起相互依存的關係，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區域體後再向外擴張。其二，對於國家實力（尤其是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來說，它們很難以個體的方式去面對在全球化後所產生的各種衝擊與改變，在為了不被世界淘汰又能與世界接軌的情況下，區域組織的形成就成了這些弱勢國家最好的寄託。<sup>227</sup>由此，各國為了因應全球化的浪潮，紛紛開始與鄰近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並進一步形成區域組織來共同合作、面對未來的挑戰。

若依照學者蘇浩對區域組織興起的定義，將透過以下重要因素而形成：相互連結和接近的地緣環境、經濟利益相互關連、保障安全的共同目標、相近的文化、政治上明確的意願以及核心國家積極的推動。<sup>228</sup>在東亞區域中也具有幾個重要區域組織，符合了上述所強調的因素：首先，是自二十世紀中，因政治上的需要所構築起的東協組織，其構成之目的除了一開始的反共抗蘇、鞏固國家政權穩定外，依近幾年東亞經濟快速發展下，也開啟了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議題；第二，在區域議題下，「東協區域論壇」則是為了因應日益重要的區域安全議題，東協各成員國在區域安全上共同努力推行、以及相互合作下產生的結果；第三，則是中

<sup>227</sup> Ian Clark, 1999,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4-48.

<sup>228</sup> 蘇浩，2003，〈東亞區域合作機制的建立極其對地區國際關係的影響〉，收錄於袁鶴齡主編，《全球化 VS 區域化：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契機與挑戰》。台北：鼎茂，頁 59-62。

國與東協在 2002 年簽署的「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FA)所建構出的「東協加一」、「東協加三」、以及在未來的「東協加六」...等更多的東亞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參見表 5-1)；最後，是以促進亞洲地區經濟成長、合作、以及自由貿易的重要論壇，並在成立後被視為是美國外交經濟政策所主導的「亞太經合會」。<sup>229</sup>這些東亞區域內的主要團體以東協以及亞太經合會為首，領導了東亞區域內的政治、經濟以及區域安全議題的發展態勢。

而美、中兩國都具有推動東亞區域合作的意願，這兩國也都具有區域內相對優勢的政經條件，因此，可以預見的是將來只要兩國在東亞區域內能相互合作，必可在東亞區域發展的進程中發揮積極帶動的作用。

表 5-1 東亞區域主義發展概況

年代	重要事件
1967	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成立
1971	東協發表「和平、自由與中立區(ZOPFAN)」宣言
1976	首屆東協高峰會、通過「東協友好同盟宣言」並締結「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1992	東協高峰會通過設立「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構想，並

<sup>229</sup> Miles Kahler, 2000, "Legalization as Strategy: The Asia-Pacific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 pp. 549-571.

	於翌年啟動進程
1994	成立「東協區域論壇」(ARF)
1998	通過「東協投資區框架協定」，預計在 2010 年成立
2002	「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
2003	中國提出「三國自由貿易區」與「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倡議
2003	東協通過「第二次峇里協定」，決定在 2020 年成立東協經濟、安全及社會與文化共同體，作為「東協共同體」
2004	中國與東協在寮國永珍簽署「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朝推動成立自由貿易協議區（東協十加一）的方向推進
2005	在吉隆坡進行第 9 次東協加三峰會，會上明確提出以東亞共同體為中心議題的「吉隆坡宣言」
2010	東協次區域組織為建立東協共同體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部分自行整理、部分引用自蔡東杰，2007，《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頁 166。以及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  
<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news.aspx>。

接下來，筆者將在此章節探討在美、中兩大強國交互影響下的東亞區域會如何對這兩大強權在區域中的決策做出回應。並且

東亞區域內的兩大組織又是以何種態度去回應兩大國在此競逐產生的議題，以及在面對全球性的議題上，東亞區域將以什麼樣的角度去處理之。

## 第一節 東亞區域與美國的互動

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東亞區域安全的架構是以美國和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澳洲等國之雙邊軍事同盟所輻射出的扇形結構為主，構成一完整的集體防衛架構。<sup>230</sup>爾後，隨著蘇聯崩解，取而代之的是以「和平崛起」為主軸快速發展的中國。而美國現在的東亞策略主要焦點其實著重在「日本」及「中國」兩大東亞既有強權之上。在美、日關係中，雙方隨曾對彼此的雙邊安保關係進行修正與調整，讓日本能在此協議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但，事實是，美國仍在美、日關係中扮演主導者的角色，而日本採取扈從的低姿態作為；相對的，即便自柯林頓政府時期與中國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可惜的是，兩國之間仍有許多衝突與對立面至今仍無法解決。<sup>231</sup>

另外，美國與東協各國的合作關係其實也可說是非常的薄弱。一方面是兩者之間的經濟、軍事上有著天壤之別的巨大差異；二方面，東協各國並非像中東地地區蘊含豐富的天然資源，在資源的汲取上無法引起美國的關注，直接影響了美國對此區域的關注；最後，東協並不是真正完整的區域組織，被某些學者說成是「發育不良的區域」(stunted regionalism)，<sup>232</sup>也因為如此對美國的威脅性也相對較低。這些原因構成了美國對東協的消極與被動，也是造就兩者互動關係不頻繁的主因。筆者將在此節探討的就是

---

<sup>230</sup> 同註 131，頁 4-5。

<sup>231</sup> 同註 139。

<sup>232</sup> Gilbert Rozman, 2004, *Northeast Asia's Stunted Regionalism: Bilateral Distrust in the Shadow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4.

在如此不對等的互動關係之下，東協組織與亞太組織將如何對美國的東亞政策做出回應以及對未來的發展可能。

## 壹、政治及區域安全議題的回應

東協在發展初期突顯了兩項特徵：外在事件具有催化的效果，例如：當美國在 1969 年提出「關島主義」(Guam Doctrine)，預示要將軍力撤出中南半島。使得東南亞國家將發展重心轉向至國際安全層面上。<sup>233</sup> 以及，成員國之間產生了矛盾：一方面各國強調區域上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各國積極尋求本身在東亞區域的戰略價值以及影響力。造成東南亞各國紛紛在美、中兩國之間選擇支持的對象，但又不願受這兩國的影響、指揮的畸形情況。<sup>234</sup>

隨著冷戰的結束，東協各國開始極力思索未來的東亞秩序該如何建立，東南亞地區又該如何發展。其中，新加坡率先於 1989 年 8 月宣告，願意接納美軍進駐其軍事基地，而菲律賓也表達贊成，支持美國繼續留在亞洲。<sup>235</sup> 但馬來西亞與印尼則表達不願與美國合作的立場。這反映出東協國家仍對美國在東亞區域駐軍與否和東亞區域內的「和平、自由、中立」是否有相關性，另外，國家主權與區域安全責任的界限為何，也成為東協國家在冷戰後爭論不休的主題。而在 1992 年前，東協都還未曾建立有關安全議題的多邊架構論壇，因為其原本強調的是有關政治、外交、經濟、社會及文化合作...等，並沒有存在將國家安全與軍事議題作為合作的重點。

### 一、東協對政治議題的回應

<sup>233</sup> Michael B. Yahuda, 1996,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pp. 87-90.

<sup>234</sup> Michael Antolik, 1990, *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 New York: East Gate, p. 142.

<sup>235</sup> 莫大華，1996，〈後冷戰時期東協的軍備競賽與區域安全〉，《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頁 53。

東南亞一些國家在 1960 年代面臨內部安全議題上的考驗，各國政府都面對的是共黨的叛亂以及種族分離主義的威脅，因此在考慮的軍事同盟能帶來的反效果後，東南亞國家將焦點放在加速地區經濟成長、社會的進步以及文化的發展，以降低對內部政權不穩的威脅。尤其是在經歷東南亞國家間的相互對立、衝突以及對領土主權的爭奪後，有識的東南亞國家紛紛體認到籌組共同組織的重要性，而東協就此因運而生並成為在冷戰體系下的產物。<sup>236</sup>

東協國家強調對國家自主性的認同，乃因自 1967 年成立至今，42 年來的風風雨雨，面對的是世界強權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威脅，但其仍以提昇東協地位至如同歐盟(European Union, EU)的目標前進。東協各成員國注重彼此間的互動、希望以平等的夥伴關係，加速區域經濟的發展、國家社會的進步以及文化發展的興盛為宗旨。不過，自冷戰結束後，隨著東歐共黨的瓦解、蘇聯的垮台，也造成整體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出現重大變革，想當然耳，也促使東協不論在政治、經濟和安全議題上都進入一個結構性的轉型期。隨著美、俄勢力淡出東南亞後，頓時的權力真空，促使東協必須面臨來自追求國家正常化的日本和崛起中的中國雙方面的競爭；這兩國的作為，促使東協在 90 年代末積極尋求透過主動參與東亞區域事務的機會，藉以提高東協在東亞區域的地位以及影響力。<sup>237</sup>

而隨著中國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並以和平大國的身分積極拉攏東協國家，美國感覺到如不再強化與東協之間的關係，美國對東協的影響力將逐漸降低。對此，美國以美、日聯盟

---

<sup>236</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Alan Collins 著，2004，《東南亞的安全困境》。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頁 194。

<sup>237</sup> 張心怡，2006，〈評析當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因應之道〉，《歐洲國際評論》，第 2 期，頁 13-16。

為核心，加強與東協國家之間的雙邊互動關係，並向東協國家宣揚美國式的自由、民主與人權。美國現在對東協國家的積極交往與維繫雙邊友誼，主要是因為現今東協的穩定與經濟上的利益，都符合美國自身發展的利益，<sup>238</sup>並未牽制中國對東協的影響所作出的全球戰略佈局。當然，東協也知道美國的反應其來有自，所以目前除了在1994年正式成立「東協區域論壇」是美國在東協中唯一參與的組織外，<sup>239</sup>東協仍是以國對國的方式與美國合作，並未讓美國進入東協體制中，扮演其世界強權的領導角色。

## 二、東協區域論壇對區域安全議題的回應

東協區域論壇的成立主要是受到外在因素，例如：美國對東亞事務的介入、中國的崛起、東南亞種族衝突...等急速發展的影響；而並非僅依靠會員國之共識而產生。<sup>240</sup> 依照美國學者 Sheldon W. Simon 的論點，非傳統威脅已經成為東南亞區域安全的重點，其影響之甚，比過往的國家侵略來的更為劇烈。<sup>241</sup>自從 911 事件後，國際間提高了對恐怖主義的警戒心，但相對的也鼓舞了恐怖份子的行動。相應的例子越來越多，例如：印尼峇里島(2002年)、雅加達(2003及2004年)、英國倫敦(2005年)...等，顯示出恐怖份子日趨積極的行為。東協各國也因在東亞區域內爆發的幾起恐怖攻擊事件警覺此一議題必須透過各國加強彼此間的反恐協定與增進彼此的情報交流與溝通，<sup>242</sup>才能完整的對抗恐怖主義。<sup>243</sup>

---

<sup>238</sup> 同註 173。

<sup>239</sup> Amitav Acharya, 1995, "Making Multilateralism Work: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presented in Pacific Symposium,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and U. S. Pacific Command, Feb. 22-23, 1995.

<sup>240</sup> 同註 17, 頁 13-14。

<sup>241</sup> Ashley J. Tellis, 2004, "Assessing America's War on Terror: Confronting Insurgency, Cementing Primac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Analysis*, Vol. 15, No. 4, p. 37.

<sup>242</sup> 例如：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柬埔寨和泰國在 2002 年簽訂的協議，強化各國間的航空、電腦及罪犯管制。

<sup>243</sup> Jurgen Ruland, 2005, "The Nature of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Challenges," *Security Dialogue*, Vol. 36, No. 4, p. 554.

東亞各國間存有許多差異是眾所皆知的事情，也因為如此，讓東亞區域內包含著許多傳統與非傳統的安全議題，但區域內的新安全觀尚未建立，而受到來自外來強權的干預，再加上傳統大國的心態與現實利益的摩擦，<sup>244</sup>讓東亞安全議題陷入於膠著難解的情況。學者 Gilbert Rozman 甚至說東亞區域是「發育不良的區域」(stunted regionalism)。<sup>245</sup>事實上，許多表面看似恐怖主義活動的事件，其實根源來自傳統的主權與民族紛爭有關，當前能制約東亞安全情勢的最主要因素，一方面還是在於冷戰兩極體系崩解後的多極局勢，另一方面冷戰後興起的「多邊主義」也透過全球化，在東亞區域發揮積極且正面的影響作用。<sup>246</sup>

而美國在東協區域積極推動與各國間的雙邊反恐合作；美國在身受恐怖主義之苦後，仍未降低其國際的影響力，但它仍希望借題發揮鞏固自身在東亞區域內的單極體系勢力，<sup>247</sup>並增強在東亞區域的駐軍完成其「全球戰略佈局」。美國在 2001 年後數度與東亞國家提昇彼此之間的雙邊關係，例如：在 2002 年與印尼舉辦雙邊國防安全對話、同年又與馬來西亞簽署「合作對抗恐怖主義宣言」，並在美國的支援下成立「東南亞區域反恐中心」、或是賦予菲律賓及泰國「非北約成員的主要盟國」的地位，提昇經濟、軍事上的補助。而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羅斯斐勒(Donald H. Rumsfeld)，也曾在 2004 年的「亞洲安全會議」上提出，美國將加強在東亞的駐軍以追捕恐怖份子，並期待東亞各國的幫助。<sup>248</sup>

---

<sup>244</sup> 王帆，2005，〈東亞安全模式：共存、並行，還是置換？〉，《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11 期，頁 16-17。

<sup>245</sup> 同註 231。

<sup>246</sup> John Gerard Ruggie, 1992,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pp. 561-598.

<sup>247</sup> Fred Halliday, 2002, *Two Hours Shook the World: September 11, 2001: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London: Saqi Books, p. 215.

<sup>248</sup> 同註 148。

而此時的東協各國，對於美國以反恐名義介入區域事務大多未以負面的態度對待之，連印尼、馬來西亞這些伊斯蘭教國家也未在東協論壇上表達強烈反對之意。<sup>249</sup>原因在於，這兩國雖受國內伊斯蘭教信徒的影響不敢在第一時間發表對反恐議題的立場，但在美國介入下能獲得的資源與利益，又令這些國家的領導者們覬覦不已。對此，美國將重點擺在消除東南亞國家中的激進伊斯蘭教主義者以及各國國內的恐怖組織與叛亂團體身上。從這些具體的外交行為轉變，可以看出，美國的動機與意圖以及東協國家在東亞區域安全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的轉換。<sup>250</sup>這個轉變改變了以往美國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的獨斷行為的態度，美國政府與東協在反恐議題的影響下，以協商和談、共同支援、互助的策略方式來運作。對東協國家來說，911 事件擴大了區域內各國政府部門的合作層級，也加強了與美國在多邊主義上的互助合作。

## 貳、經濟議題的回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包含東亞、南太平洋和北美在內的國家，以太平洋為聯繫的樞紐，形成一個跨區域的地域關連體，「亞太地區」遂成為國際關係舞台上一個眾所皆知的名詞。亞太區域因為有美國、中國及其他世界經濟大國，成為多邊國際關係活動下一個重要的舞台。然而，就東亞各國的利益需求，現今亞太區域組織似乎無法滿足東亞國家間相互協調與合作的直接利益，這或許是因為傳統價值觀以及歷史因素的關係，使得東亞各國在美國帶領的亞太組織下仍感受到來自外來強權的干涉，因此無法徹底的展開心胸對話。

現今，亞太區域中作重要的國際組織莫過於「亞太經合會」，

---

<sup>249</sup> 同註 149。

<sup>250</sup> 同註 149。

其建立於 1989 年 11 月，澳大利亞、美國、日本、韓國、新西蘭、加拿大及當時的東協六國在澳大利亞舉行了亞太經合組織首屆部長級會議，象徵這一區域性組織正式成立。到了 1991 年，亞太經合會的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在韓國舉行，會議通過《漢城宣言》，正式確立了這一組織的宗旨和目標，即「為本地區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持經濟的增長與發展；促進成員間經濟的相互依存；加強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減少區域貿易和投資壁壘。」<sup>251</sup>另外，由中國與東協積極合作下產生的「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衍生出東亞區域整合的版圖重組問題，在以上述架構為主下，東協預計與東亞其他國家簽立更多相同的全面經濟合作協定，打破由亞太經合會所主導的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模式。筆者接下來就將探討的是亞太經合會與美國的互動關係，以及對東協經濟協定在對美國的影響及其回應。

## 一、亞太經合會的回應

亞太區域是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利益最鉅的區域，因為，不論就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擴散、還是對美國價值觀下的自由、民主與人權概念的挑戰，都是美國在全球戰略下最難以處理的部份。因此，自老布希時期以降，美國開始追求在全球經濟上的卓越開始，能否有效掌控亞太政經局勢的發展，將會影響其全球戰略的成敗。為了因應全球化下的政治局勢改變，美國以亞太區域的地緣特質以及既有的利益佈局，整理出兩個重要的概念：(一)在地緣結構下，美國延續了自冷戰時期以來的基本戰略軌構，仍以扇形結構為其戰略基礎，做為因應亞太安全形式與持續介入亞太政經發展的憑藉；<sup>252</sup> (二) 為掌握新的戰略態勢

---

<sup>251</sup> John Ravenhill, 2001,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

<sup>252</sup> 同註 1，頁 59-62。

與利益走向，在鞏固海洋戰略架構的同時，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構想，一方面作為美國主導亞太局勢發展的藍圖，另一方面，則藉以統合亞太區域的經濟、軍事與政治利益相關政策。<sup>253</sup>

當柯林頓以經濟政策帶領美國國內的經濟復甦，也對美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做出更近一步的強化之下，其在東亞區域的霸權地位就得要透過亞太經合會才得以實現。但雖然美國自「西雅圖會議」中透過其威權界定 APEC 的性質與走向，特別是在多邊貿易的自由化。自 1994 年的《茂物宣言》以及之後的《馬尼拉宣言》後，宣布有關全面貿易自由化、降低進出口關稅等議題，<sup>254</sup>就此 APEC 的發展正如美國所預期的。根據 APEC 的自由化目標，其所謂「開放性區域主義」大致有幾個特徵：<sup>255</sup>第一，對非成員國的開放性，亦即在組織內部推動自由化的政策，也適用於其他非成員國；第二，對其它次區域集團(例如：NAFTA 和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包容性；第三，賦予參與國之間互動的靈活性與自願性的協調、合作；第四，以漸進的途徑推動自由化的目標。而這些自由與開放性的運作方式或許正是 APEC 的特徵，但此種運作方式也突顯出美國對亞太區域的干涉與介入，而 APEC 不過是為了滿足在亞太區域、甚至是全球利益的跳板而已。也正因為 APEC 最後仍是以美國的強勢領導為基礎，無法真正滿足東亞國家的發展需求，所以在東協區域論壇中形成的排美傾向，也就成為了東亞國家對美國介入東亞區域政經發展的反動。<sup>256</sup>

## 二、東協經濟協定帶來的影響

---

<sup>253</sup> 同註 135。

<sup>254</sup> 林欽明，1999，〈APEC 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2 卷，第 12 期，頁 13-16。

<sup>255</sup> 張伯偉，2001，《APEC 貿易自由化及其影響》。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頁 50-52。

<sup>256</sup> Mark T. Berger, 1999, "APEC and Its Enemies: the Failure of the New Reg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5, No. 5, pp. 1013-1030.

美國在冷戰後陷入新現實主義與新理想主義，以及新孤立主義與新全球主義的二元爭辯中。前者涉及美國該以何種角度去處理外交結盟策略；<sup>257</sup>而後者則考驗了美國對外的軍事策略，究竟該獨善其身，還是建立集體安全體系，避免一個充滿混沌的世界產生。<sup>258</sup>美國陷於各種不同的思緒中，所以每當不同的執政者上台時，對外政策也就隨其意識型態及對外認知而改變，使得美國對外政策一直無法擁有長遠性，並時常陷入矛盾中。同時，在東亞區域內又因潛在的霸權競爭者在進行合縱連橫的外交手法、東亞各國也因多極化讓自主性相對的提升，使得美國對東亞區域的「管理」也日趨困難。

而當中國與東協進行一系列的高層互訪，雙方認為彼此的關係已取得長足的進步，正進入一個「長期穩定、日益成熟的新階段」。<sup>259</sup>隨著 1997 年金融風暴的影響，中國與日本等東亞國家挺身幫助東協度過此一危機，讓東協了解到，彼此之間在經濟上相互依存，只有加強東亞國家間內部的協調與合作，才能解決自身所面臨的困境並創造良好條件，為此東亞必須要建立某種合作機制。正因為如此，東協經濟合作協定因運而生，首先藉由中國與東協之間的經濟合作架構，預計在未來形成東協自由貿易區概念的鼓勵，中國拉攏了日本及南韓推動現今我們所知道「東協加三」機制。而經過東亞諸國的努力，「東協加三」以成為東亞區域內經濟合作的主要管道，發揮著推動地區經濟融合的作用，<sup>260</sup>也成為之後「東協加六」或是其他相同發展的最好的借鏡。

東協透過經濟合作機制的力量以形成涵蓋東南亞所有國家的

---

<sup>257</sup> Zeev Maoz, 1997,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pp. 162-198.

<sup>258</sup> Arthur Schlesinger Jr., 1995, "Back to the Womb: Isolationism's Renewed Threa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4, p. 8.

<sup>259</sup> 馬燕冰，1996，〈東盟加速一體化及對地區的影響〉，《現代國際關係》，第 1 期，頁 27-31。

<sup>260</sup> 同註 225。

地區合作團體，現今以促成了三年一度的首腦定期正式會議、外長會議、經濟部長會議等制度安排，其一體化程度為東亞區域之最。<sup>261</sup>當東協的功能從政治層面的對話擴及到經濟層面的合作，並期待美國有更加積極的回應。但是，正因為亞太經濟結構開始改變，而美國希冀將亞太經合會制度化的願望也未能達成，美國在東亞區域內的經濟力量因而有所鬆動。更重要的是，由中國與東協所形成的「亞洲主義」，因為彼此間信任度的增加、經濟合作更為自由、中國加入 WTO 帶與東協更好的機遇來看，<sup>262</sup>美國在此的影響力也大不如前。對此，筆者做出的解讀是，東協經濟協定帶來的影響是東亞各國自主性的提升，它們願意接納以區域經濟合作為前提的中國與東亞國家，而不願再受來自美國「亞太意識」的箝制。

## 第二節 東亞區域對中國的回應

學者 David Shambaugh 在「中國參與亞洲事務：重塑地區秩序」(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一文中認為，中國自 1990 年代後，為了因應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兩極體系崩解後世界權力的失衡，發展出對世界的新觀點。這些觀點主要建立在下述四個基礎之上：一、多加參與區域組織，與周邊各國建立有好關係；二、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提昇雙邊關係；三、拓展區域經濟發展，增強整體國力；四、在國際安全上，降低各國對中國的不信任感。<sup>263</sup>在這四項基礎上發展的中國，憑藉著經濟實力快速成長，對東亞區域的影響已經擴展至更為廣泛的政治與區域安全議題。中國倡導相互依存、尋求新的協議，並且願意考量其它國家的利益與需要，已讓 20 世紀末的中國獲得區域內絕大部

<sup>261</sup> 門洪華，2005，《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266。

<sup>262</sup> 同註 1，頁 100-101。

<sup>263</sup> David Shambaugh, 2004,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p. 64-99.

分國家的好感。如同 David Shambaugh 所認知到的，一個具建設性、一個在乎對方感受及一個威脅性漸低的強權，已經逐漸獲得東亞區域各國的支持並漸漸獲得在東亞區域內的領導力。<sup>264</sup>

東亞區域中，中國的定位一直隨著時代的推移在不斷的改變著。無論是幾千年前的天朝上國、近百年來列強眼中的俎上肉、或是近幾年來崛起的大國，中國至今仍屹立不搖的處在東亞區域內，並對周遭各國產生多樣及深遠的影響。而近年來中國的崛起，周遭國家都共享均沾，唯獨美、日在考慮到亞太區域的既得利益及東亞的安全議題上，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憂心忡忡。美國尤其擔心中國的崛起，會打亂亞太區域的權力平衡以及自身在亞太的利益。<sup>265</sup>本節就將探討在冷戰後，面臨中國崛起的情境下東亞區域組織如何面對中國的新外交政策，以及如何回應中國的改變。

## 壹、在政治及區域安全議題上的回應

自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國積極發展「全方位外交」的外交政策，在區域發展的策略上，透過多邊發展的模式，以「睦鄰友好」政策配合「合作夥伴關係」穩定與亞太周邊國家關係，參與國際組織正是其目標之一。從中國加入 WTO 到與東協簽立自由貿易區協定，中國積極涉外的態度不言可喻。但在冷戰前的中國，則是東亞各國避之惟恐不及的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各國，原因是東南亞各國在冷戰時期紛紛受到共產主義的威脅，而背後的支持者就是中國與蘇聯。如今，時過境遷，蘇聯垮台、中國走出屬於自己風格並與東南亞各國積極建立友好關係，這種情況下的東南亞各國該如何應對？而東協組織又會如何回應中國積極希望參與的決心？

---

<sup>264</sup> 同註 263。

<sup>265</sup> 洪兵，2000，《剖析美國利益》。北京：世界知識，頁 171-179。

## 一、後冷戰以來東協的回應

東亞區域組織中，東協於 1967 年成立。其成立原因大致可歸內為以下幾點，(一) 美國為了實行圍堵政策而在幕後支持東南亞各國反抗共產勢力；(二) 越戰的擴大與印尼新政權在政變後對外態度的改變（蘇哈托發動政變成立的新政權，極需鄰國的承認，已獲得正當性）；(三) 東南亞各國有感於過去東南亞間因為過於堅持自身立場忽略相互溝通，導致區域內局勢緊繃。現今正是改變的關鍵，因此在泰國外長的積極奔走、協調下，東協的成立成為可能。<sup>266</sup>

東協自 1967 年成立以來，就一直對中國心存戒備。部分學者將東協與中國的互動關係，劃分出三個不同階段：<sup>267</sup>

第一階段：相互敵視：自 1960-1970 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內，東協國家與中國的關係充滿不安，主因是中國對東協國家內的共黨團體提供支援，企圖顛覆原有政權；另外中國在 1965 年涉入印度的政變，以及對馬來西亞內政的干預，造成此一時期東協國家對中國存有畏懼感。

第二階段：關係解凍：雙方關係解凍的初始，是來自美方的善意表現，美、中兩國在 80 年代開始關係正常化後，東協國家受此鼓舞開始有較正面的評價。第二個原因，中國與蘇聯的反目，支持東協國家對越南的侵略行為進行制裁。最後，中國在新任領導人鄧小平的領導下，進行一連串的改革開放運動，刺激雙邊貿易與投資越趨熱絡，中國也開始與東協各國建立互信機制。基於

---

<sup>266</sup> 同註 10，頁 164-167。

<sup>267</sup> 同註 78。

以上原因，東協與中國雙方關係開始解凍，並對往後東亞區域發展埋下深厚的根基。

第三階段：曖昧時期：雙方自關係解凍後，就積極透過擴大貿易與投資的規模達成自身經濟成長的願望；中國利用亞洲金融危機時，向東亞各國展現自身與過往不同的面貌，加強與深陷金融危機國家的關係。而東協也意識到，中國崛起已經成為既定的事時，要與此種強國維持穩定關係的最佳方式就是強化雙邊經濟的相互依存度。

最終，東協擺脫了過往作為區域強國上那令人窒息般的威脅感。同樣身為東亞國家的中國為了追求本身整體國力的卓越，以友善且積極的態度開啟與東協的合作關係。東協力圖在大國之間保持權力的平衡，藉此維護自身的安全與爭取經濟的成長。對於此一時段的中國，東協試圖與中國維持良好的關係，但又對其崛起抱持著戒備的態度。

## 二、東協區域論壇對中國的回應

東亞國家領導者在冷戰後開始慢慢意識到，隨著西方殖民制度的結束、全球化經濟發展的風潮下，東亞國家需要根據自己的利益，按照本身對國際環境的認知，以自身的行為模式來處理自己所面臨的問題。正如同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英國國會的演說中提到的：「白人控制亞洲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一些亞洲國家開始堅持要以亞洲的方式解決亞洲的問題，也就是說，亞洲的大國能解決它們與小國之間的問題。」<sup>268</sup>而東協就是在東亞各國（或者該說是東南亞各國）在有對區域意識的共同概念後，所成立的第

---

<sup>268</sup> 李光耀，2000，《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台北：世界書局，頁47。

一個符合東亞意識的國際多邊合作組織。東協組織首先注意的是，建構一個有效的亞太安全機制以確保區域安全維護，1994年7月於曼谷首度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會議，顯示出東協國家對於區域間安全合作的重視性。東協區域論壇的目標在營造有利於區域關係發展的氣氛，藉以更有效處理雙邊或多邊問題。而中國企圖以多邊集體協議取代雙邊結盟關係，以阻止會中任何會對中國造成不利的決定。

早期來說，中國在區域安全議題上，對東亞區域安全組織採取比較消極的態度，但在東協受到美國影響下，一再地強調東亞或東南亞的「權力真空論」，絕大多數的東亞國家，開始認為中國有意填補此一空缺的威脅下，形成「中國威脅論」，而中國為了消除這些東協國家之不安，方才開始積極參與亞太安全對話機制，並共同制定規則以達自我約束之目的。由此可見，中國在東南亞的地位已隨著經濟實力與政治影響力的與日俱增而水漲船高，在此區的影響力甚至超越美、日兩國。<sup>269</sup>附帶一提，就中國而言，即便其與東亞諸國一般在主權議題上不願多做退讓，但這並不代表沒有緩衝的空間。以中國與越南在南海主權上的爭議為例，中國與越南多次的協商，終於在2000年12月25日簽訂有關東京灣的海域界線和合作協定，並同意在未來談論更廣泛的爭議。隨後，中國也與東協簽立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目的在於預防與東協國家在領土主權上的衝突並多增進合作的空間。<sup>270</sup>

## 貳、經濟議題上對中國的回應

---

<sup>269</sup> 蔡佩蓉，2002，〈從區域主義的實踐—論中共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之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21期，頁50。

<sup>270</sup> Stein Tonnesson, 2003, "Sino-Vietnamese Rapprochemen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rritant," *Security Dialogue*, Vol. 34, No. 1, pp. 55-70.

美國在透過澳洲所提議、日本為推手下所建立起來的亞太經濟合作會下，來進行對東亞區域的掌握，並塑造出「亞太區域」意識。在日本對外政策是追隨美國的情況下，中國在亞太區域的生存環境就顯得嚴苛了起來。美國在為了維繫其霸權地位的同時，不斷透過同盟經驗以及「中國威脅論」來拉攏日本，並以在政治、經濟及國家安全議題上的幫助，讓日本政權成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傀儡，來影響中國崛起對美國的威脅。<sup>271</sup>另一方面，對中國來說，亞太區域是主要的國際舞台，也是中國在政治、經濟以及國家安全上同時存在的地區。對於亞太區域的環境建構，中國有切身的利害關係，也有著大國該負起的責任。亞太經合會以及東協會以怎樣的態度來處理中國崛起的議題，又對後冷戰時期的中國產生何種回應？將是筆者所要探究的。

## 一、亞太經合會的回應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成立是因應80年代區域主義風潮而產生的，在歐洲共同體擴大、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也逐漸醞釀成熟，再加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遲遲不能完成協議，以出口導向為經濟政策的東亞各國開始接受政府間區域經濟合作的構想。<sup>272</sup>而中國此時正因國內政治體制的約束，在90年代前並沒有去尋求參與由西方資本主義所構建的經濟合作組織的計畫。直到鄧小平上台後，<sup>273</sup>中國才開始發揮其經濟實力所創造出的影響力。

中國相當重視亞太經合會帶來的經濟效益，因為在加入之前，中國商品的對外貿易在外國市場受到歧視性的待遇，亞太經

---

<sup>271</sup> 杜默譯，Clyde Prestowitz 著，2004，《美國遊戲》。台北：大塊，頁284-285。

<sup>272</sup> 李登科，1993，〈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32卷，第11期，頁40-42。

<sup>273</sup> 同註180。

合會所提倡的貿易自由化正好彌補中國在這塊的空缺。並且，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不光只侷限在東亞區域內而已，全球化、國際化才是自鄧小平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的，而此與世界幾大強國串連起來的亞太經合會，自然成為中國在發展經濟時最好的對外舞台。亞太經合會的三大宗旨：加強開放多邊貿易體系、自由且開放的貿易投資、加強區域內的互助合作發展。<sup>274</sup>對中國造成的影響現象在其積極配合度上，不但在 2005 年降低工業產品關稅到 10% 外，還比其它會員國減少了四千項商品的進口關稅到 30%，並取消 170 種商品的進口管制與關稅配額。這些作為再再顯示了亞太經合會的三大主旨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反映了中國為了加入世界經濟體系所做的努力。<sup>275</sup>

亞太經合會作為東亞區域內最重要的多邊性貿易合作機制，讓中國對能在此一場域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機會無法等閒視之。自中國加入後，在會議中曾多次提到要與東協、日本以「亞洲方式」來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理念，而且與東協一同表達支持亞太經合會成為東亞區域中一個自由開放、不具約束力、且有彈性的諮詢性機制，藉此對抗美國將其制度化的野心。中國在亞太經合會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透過爭取區域認同感，結合東協國家的勢力打擊美、日希望擴大經合會功能的想法。至今，中國此一目的可說是成功的，美國雖曾對次提議要將亞太經合會擴張成政治及安全性的區域論壇，但目前仍未見其功，因此美國在亞太經合會的影響力也未見提昇。

中國透過亞太經合會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中逐漸提昇自己的價值，首先，自 1991 年加入起，就開始爭取東協國家間的合作，抵制已開發國家的主導勢力；第二，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對受

---

<sup>274</sup> 同註 249，頁 173-176。

<sup>275</sup> 同註 223。

害國給於援助、並加強對外開放，目的在展現提供公共財的能力與意願；第三，1999年至21世紀初，中國開始主導亞太經合會，並發起「博鰲論壇」釋出中國將由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決心，承諾推動區域內經濟成長的決心，目的在建立區域霸權的地位進而影響亞太經合會合作機制的規則。最後，2002年至今，中國推動了東協加三，更率先完成與東協之間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建立起中國在亞太區域上的領導地位。<sup>276</sup>

## 二、東協經濟協定給予的回應

在經濟合作議題上，東協之所以願意首先選擇中國簽署 FTA 的主因之一，相對於美國與日本傾向對東南亞國家「分而治之」的政策，中國則較為尊重其整體性，而且也積極的希望能促進東亞區域的整合，例如：在 2000 年中國提出「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將經濟利益連結在一起，又在 2002 年 11 月正式簽署「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顯示出中國對東亞區域的整合之積極度。<sup>277</sup>而另一個原因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東協國家越來越難以抵擋中國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影響力，大多數的國家也被中國現在的低姿態與友善的形象給說服，甚至解除了「中國威脅論」帶來的恐懼。<sup>278</sup>中國甚至在 2009 年 4 月公開宣示要權力支援東協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國希望藉由與東協國家簽署的「中國投資協定」(ASEAN—China Investment Agreement)設立 100 億美元的投資合作基金(China—ASEAN Fund on Investment Cooperation)、提供 150 億美元的合作計畫經費...等，來加強雙方的合作關係。在其他層面的支援補助更是不勝枚舉，這些作法不

<sup>276</sup> 吳玲君，2005，〈中國與東協區域經濟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5 期，頁 15-16。

<sup>277</sup> 蔡東杰、洪銘德，2009，〈美中兩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軟實力構築與競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0 卷，第 1 期，頁 69-70。

<sup>278</sup> 同註 223。

但揭示了中國對於經營與東協之間的關係將更加積極，也顯示出東協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上必須得到更多來自中國的支持。<sup>279</sup>

經濟成為中國用來維繫與東協關係的主要方式。東協除了豐富的天然資源可供中國工業發展外，該地區五億的人口更可以消化中國過剩的貨物，加上東協早在 1980 年代就開始大量投資中國，這幾項原因促使雙方貿易大幅的成長。<sup>280</sup>事實上，在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啟動前，雙邊貿易年成長率都超過 30%，特別是在 2001 年全球經濟成長緩慢的情況下，中國與東協之間的投資與貿易額仍增長了 5.3%。<sup>281</sup>由此可見即便在全球經濟成長緩慢、甚至減速的情況下，東亞區域的經濟還能逆勢而為，可見中國與東協之間經濟實力的驚人。東協自始自終都將焦點放在加強亞洲區域整合以及在全球經濟主導權的提升上。而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東亞區域顯然需要一個新的發展模式，以減少對西方貿易夥伴的依賴。<sup>282</sup>此時的中國，就成為了東協最好的夥伴了，且當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區上路後，雙邊的貿易成長勢必更加快速，而這正符合了東協對經濟發展的希冀。

### 第三節 小結

學者納林(Shaun Narine)認為，東亞區域組織中，ASEAN 和 APEC 的亞洲各國大多堅持自身國家主權不得被區域性制度給侵犯的神聖性，而大部分東亞國家所重視的正是國內政治的正當性。<sup>283</sup>事實上，東亞區域各國大多主張，希望透過多邊交往的制

---

<sup>279</sup> 同註 223。

<sup>280</sup> 同註 277，頁 61。

<sup>281</sup> 詹中原，2006，〈東協加三的發展與對中國的影響—政策面的探討〉，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5/CL-R-095-030.htm>。

<sup>282</sup> 管淑平，2009 年 10 月 26 日，〈東協十加六一亞太催生共同體〉，《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oct/26/today-int3.htm>。

<sup>283</sup> Shaun Narine, 2004, "State Sovereignty,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3, pp. 423-450.

度與組織，來協助參與其中的成員國增強自身的主權與國力發展，而非限制主權的自主性與發展方向。我們以下述三個觀點來探究之。

## 壹、中國的角度

中國從改革開放運動後，其經濟平均成長率從 1970 年代的 6.5% 提升到 1980 年代的 10% 以上，使其擠身於東亞新興經濟體之列。隨著其進出口貿易額的快速成長，根據 WTO 的統計，中國佔全球貿易比重從 1990 年代的 1.7% 升高至 2009 年的 9.6%。中國成為世界經濟中一個重要的角色。<sup>284</sup> 事實上正因為如此日本將中國視為強大的國際競爭對手與主要威脅來源；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崛起，打亂了由美國帶領之就有權力秩序，其結果是東亞區域陷入更激烈的經濟競爭。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來說，其從未希望能挑戰區域秩序，這是根據 Tim Huxley 所認為：「中國認識到它對於超級強權的地位有重大的責任，最優先的要務是要維持區域及全球政治穩定和遵守國際規範，而非對歷史性的頭銜做意識上的追逐。」<sup>285</sup> 而 Ralf Emmers 也同意此一觀點，他認為中國對於目前東協區域論壇中的國際規範，仍處於口頭上同意，但遇到與國家主權利益相關的事務時又習慣虛應一應故事的態度帶過。<sup>286</sup>

## 貳、美國的角度

而就美國在東亞的政策來看，美國政府對東協的立場伴隨著「中國崛起」的影響，美方因此積極尋求維持雙邊安全聯盟的關

---

<sup>284</sup> 數據引述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2010 年春季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一）》，<http://big5.ec.com.cn/gate/big5/ccn.mofcom.gov.cn/spbg/show.php?id=10452&ids=>

<sup>285</sup> Tim Huxley, 1998, "A Threa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Rejoinder," *Security Dialogue*, Vol. 29, No. 1, p. 117.

<sup>286</sup> Ralf Emmers, 2001, "The Influen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Factor With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3, No. 2, p. 286.

係，作為東亞政策之基石。另一方面，對中國則建立起「建設性交往」的模式，無論雙邊會談、高層人員的互動、資訊與技術的交換。在這兩方向下，美國認為依靠東協區域論壇只能營造出東亞區域安全的環境，改變中國的態度和傾向才是真正實質的重點。<sup>287</sup>又經歷過 911 事件後，在東協區域論壇中推行反恐戰爭，將其視為與東亞各國的共同利益來處理。美國對於東協區域論壇在處理反恐戰爭上的議題，並未試圖從中得到什麼協定，而是把其視為一個集合討論之場所並非一個制定制度的正式場域。<sup>288</sup>事實上，東協區域論壇的確並沒有在區域安全議題上有實質上的貢獻，也並未能帶領東亞區域執行這些政策，正因為如此美國在此的利益可說是微乎其微。<sup>289</sup>

即便東協所屬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ISIS)提出透過東協的「後部長會議」，讓各國外長得以廣泛討論區域安全的構想，該項建議於次年為東協部長級會議所接受。接著在 1992 年，由於中國與東協之間對南海主權的爭奪，刺激東協組織發表所謂的「南海宣言」，新加坡也跟著在同年的東協高峰會再次提到區域內各國相互溝通的重要性。<sup>290</sup>在 1994 年正式成立「東協區域論壇」(ARF)作為區域內最重要的安全對話機制，而 ARF 也是美國在東協中唯一參與的組織，且其在論壇中並非、也無意處於領導之地位。<sup>291</sup>

## 參、東亞區域組織的角度

東亞區域的安全議題成為 90 年代後被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多極的複雜政治結構、經濟高速的發展、還有就是此區域也是具

---

<sup>287</sup> Evelyn Goh, 2004,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in United States East Asia Strateg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1, p. 64.

<sup>288</sup> 同註 286，頁 59。

<sup>289</sup> 同註 286，頁 59-61。

<sup>290</sup> Michael Leifer, 1996,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1.

<sup>291</sup> 同註 225。

全球影響力大國最密集的區域。<sup>292</sup>而也因為如此，多方權力競逐的結果也就造成東亞區域安全的不穩定性，以下針對幾個衝突點分別說明之。

## 一、朝鮮半島核武危機

長久以來，北韓在蘇聯的援助下積極研究核能發展。當然蘇聯也曾為了此議題與北韓簽署有關核能建設的協議，並希望其能加入「核子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sup>293</sup>不過，北韓不願接受國際體制的規範甚而引發核武危機，最後的結果是，在1994年美國與北韓達成「框架協議」但最後仍在2002年的伊拉克戰爭期間被北韓廢棄，因此，被當時美國的小布希政府稱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以政經議題向北韓勒索，至此又爆發新一波的核武危機。相對的，與此同時東亞國家也紛紛圍繞著這項議題希望透過改善、調整與北韓的關係，例如：南韓透過兩國貿易提昇兩國關係、日本則透過歷史議題向北韓表示善意、或是中國透過經濟援助向北韓提出終止核武發展的要求...等。<sup>294</sup>由上述可以看出，在此議題上美國與東亞國家的政策取向走上不一至的方向。

## 二、領土主權爭議

東亞區域間的領土主權爭議自古以來都是極具威力的話題，這不但涉及各國天然資源的利益、更涉及到歷史與意識型態的爭議。而這些議題現今被帶入區域議題的探討中，也讓在東亞區域具有影響的兩大強國深陷泥淖（或者該說其中一國——中國，本身

---

<sup>292</sup> 倪峰，2001，〈論東亞地區的政治、安全結構〉，《美國研究》，第3期，頁8。

<sup>293</sup> 于迎麗，2004，〈朝核問題與東北亞安全合作〉，《國際觀察》，第6期，頁35。

<sup>294</sup> 同註214。

就是這場主權爭奪的事主之一)。在東亞區域中關於領土主權爭議，主要有以下兩者：(一) 釣魚台：台、中、日，三國競相爭奪此一系列島的主權，其中日本最為積極強調此領土之主權，並於 2005 年公然接管此島上的設施。<sup>295</sup>相對而言，中國從這幾年才對此議題有強烈的反應，但也只限於宣示性的喊話，並無實質作為。而美國則在 2010 年由國務卿希拉蕊(Hilary Clinton)提出：釣魚台列嶼議題，屬美、日安保條約的範圍之內，警告中國不得妄動。<sup>296</sup>(二) 南海主權爭議：此區域除了因海底蘊藏石油以及天然氣等資源外，也正處亞太海域的重心，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因此引來區域內各國的強奪。<sup>297</sup>為解決此一問題，中國曾在 1992 年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來表達其友好態度；對此，東協則於同年以「南海宣言」作回應，希望各國自制。<sup>298</sup>後來在各方磋商下，終於在東協「10+1」的高峰會上決議，達成合作的共識。

總結來說，美國在東亞主權問題上著墨較少，大多保持促談者的角色，希望區域內各國能以談判代替衝突，而這也符合自冷戰後美國對東亞的政策。不過自 911 事件爆發後，美國進入新保守主義的世界觀，重新定位了東亞區域政策，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並將某些國家定義成「邪惡軸心」，然後高舉著反恐大旗，堂而皇之的在東亞地區進行軍事佈署，完成其「全球戰略目標」；另一方面來說，中國自改革開放後積極爭取與他國的關係建立，並向各國展現其「大國風範」，並希望能以「和平發展」展現其誠意，所以中國至今對領土主權的爭議大多以共同合作的方式

<sup>295</sup>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家安全組，〈釣魚台主權爭議與護漁問題〉，2005 年 7 月 6 日，

<http://www.npf.org.tw/Symposium/s94/970714-NS.htm>

<sup>296</sup> 張佑之，2010 年 10 月 29 日，〈希拉蕊談釣魚台 中國強烈不滿〉，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1010290238&q=%E5%B8%8C%E6%8B%89%E8%95%8A%E8%AB%87%E9%87%A3%E9%AD%9A%E5%8F%B0+%E4%B8%AD%E5%9C%8B%E5%BC%B7%E7%83%88%E4%B8%8D%E6%BB%BF>

<sup>297</sup> 陳鴻瑜，1987，《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衝突》。台北：幼獅文化，頁 12-25。

<sup>298</sup> Bob Catley and Makmur Keiliat, 1999, *Spratlys: Th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pp. 161-162.

來謀求互利，希望能藉此獲得東亞各國的信任。

## 第六章 結論

在探究美、中兩國在東亞區域對權力的相互競逐以及造成的改變之後，我們可以發現新古典現實主義其實就是現實主義的演變。具體的說，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提出的理論性問題包括：一、在何種情況下，國家會擴張其海外的政治利益？二、一個國家的外在行為及其國內的動員，呈現何種關係？三、政治精英如何認知並考量世界政治中的權力(實力，power)？國家就其本身的相對權力而言，如何評估並適應變遷？國家在對外環境中針對威脅與機會如何回應？是否不同的國家在回應上採取不同的方式？對於國家結盟的各種策略，如何解釋其間之差異及變化，例如，是否採取平衡(balance)、推諉(buck-pass)、依靠權勢(bandwagon)、緊綁而無法脫離(chain-gang)，或是完全避免結盟？<sup>299</sup>

透過上述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性問題，筆者認為是可以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探究美、中兩國在東亞區域競合之議題，並歸結出對未來發展的展望。美國可以在經濟及區域安全議題上獲得它的利益、中國藉著政治影響力的擴大能夠更加快速地發展整體國力、東亞各國則透過這兩大強權的制衡可以提昇自身的國際地位與保持自身的主權性，既然三方都能從此得到利益，那麼這或許是未來最好的發展。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根據本篇論文第一至第五章的討論，筆者認為可以藉由新古

---

<sup>299</sup> Randall L Schweller, 2003,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London, MIT Press. pp. 317-318.

典現實主義探討美、中兩國在東亞區域之競合，從兩國的對外政策（整體層次）以及領導人對國際環境的認知與主張，可以證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確具有解釋力，而且這正彌補了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的不足。就本文主張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而言，國家的首要目標是追求國家利益與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因此在國際間處於無政府狀態的不確定環境下，國家會自行塑造有利於國家本身的環境。

首先，美國藉著全球化以及區域化發展的契機下，在東亞區域推行美國式的自由、民主與人權，雖然有學者認為美國所傳遞的民主、自由理念，只不過是世界上諸多意識型態中的一種，而且常常被詬病成「西方式的民主」。但無法否認的是，越來越多國家走向以自由、民主為基礎的政治體制。

美國利用其強大的軟實力，以經濟與世界各國都建立起貿易夥伴關係，甚至是那些意識型態相左的國家。靠著經濟貿易，美國在全球都有廣大的市場並掌握了各個國家的經濟脈絡，使得如有國家想與美國進行軍事上的競賽，國內的經濟勢必會先被拖垮，因此幾乎沒有任何國家敢以軍事武力脅迫美國。

另外，當美國不再以自身強大的武力為後盾，而是期盼與世界各國分攤國際安全的責任，在前兩個因素下，美國更希望以合作、談判的方式取代衝突與對立。因此，對各個區域國家都採取「預防性防禦」的策略，以交往或介入、調停的方式塑造美國相對安全的環境。

第二，中國政府則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威權統治之下，透過鄧小平的改革開始有了務實的發展。不再執著於意識型態的對決，而是以經濟利益的建立，加強與區域以及全球的發展佈局。這是

為了，一方面要顯現出中國與世界接觸後，提昇整體國力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顯示了為了加強統治權的正當性，整提的國力提昇是必須的。這兩方面的影響，促使中國認知到區域和國際環境的穩定是絕對必要的，穩定的環境可以讓中國更快速的發展經濟，進而提昇整體國力的進步，並在國際上獲得更重要的影響力。

所以，透過外交政策上對周遭國家的示好，中國秉持著和平外交的理念，持續以「敦親睦鄰」的態度與周遭國家交往，建立起和平、繁榮的東亞環境，以此形成了適合中國發展的態勢。而且比起美國，同樣身為東亞國家一員的中國，或許更能感受到來自東亞國家所期待在國際上應獲得的待遇，因此，中國在東亞區域、甚至在國際中的影響力，都開始慢慢累積了起來成為日後不可忽視的力量。

而這兩國領導者也在政治、經濟、區域安全議題上下足功夫，例如：美國自老布希以來的「世界新秩序」、柯林頓的「新太平洋共同體」、甚至小布希的「建設性合作關係」；又或者是中國自鄧小平起的「務實外交」、江澤民的「國際新秩序」、還是胡錦濤的「和諧世界」。皆可看出無論是從「整體層次」還是「個體層次」兩國為了追求國家利益與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可說是不遺餘力的在爭取。這兩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正是憑藉著兩國領導者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美國加強其在全球霸權的領導地位並試圖藉著合作夥伴關係以影響友邦整體政策的走向；中國則以和平發展為目標，不再強以壓迫式的態度和軍事武力做後盾來執行其外交政策，改以務實的態度、互利的經濟外交與包容的文化外交為主要手段。這兩國的做法都實實在在的影響了東亞各國與他們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由此，我們或許可以理解到為何新古典現實主義會認為國家

試圖運用權力來引導國際體系朝向符合自身偏好與目標的方向發展與前進，因為不只是安全議題，其他諸如：國際政治上的權力、經濟的發展、科技的交流...等議題，都會成為一國發展的目標。而國家要如何行使權力，透過本文可以看出個體層次將權力向整體層次的承接傳送是必要的、也是有關的，所以美、中兩國在冷戰後對東亞區域的競合才會產生今日東亞區域各國對美、中兩國的回應。

## 第二節 省思與未來展望

筆者在以新古典現實主義探究美、中在東亞區域競合後，用以下幾點對美、中以及東亞區域國家在現今國際環境下的現狀做出省思以及對他們在未來的發展提出看法。

### 一、美國與東亞區域間的互動漸趨分歧

國家主權在東南亞國家討論區域安全議題時仍是最重要的核心議題，即便是面對亞洲金融風暴時也是一樣。不過東亞意識自發展開始，外在事件都牽動了其處理反應，尤其是那些影響了東亞區域安全的議題。<sup>300</sup>所以從美國在二戰後的介入、關島主義、尼克森重起與中國溝通的大門、越南入侵柬埔寨、冷戰的結束、南海主權爭議、到最近的恐怖攻擊事件、反恐戰爭等行動，無不顯示東亞在處理區域性事務上的被動反應。

而現今的美國在東亞區域的政策有與東亞國家所期待的幫助開始有了關鍵性的分別。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對東亞各國主權

---

<sup>300</sup> 張志剛，2005，〈建構中的東盟安全共同體：一種建構主義的視角〉，《國際理論》，第7卷，第3期，頁34。

的干涉，逐漸令東亞各國開始心生不滿。首先在區域安全議題上，東亞區域安全議題會成為 1990 年代後全球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多極的複雜政治結構、經濟高速的發展、還有就是此區域也是具全球影響力大國最密集的區域。<sup>301</sup> 也因為如此，多方權力競逐的結果也就造成東亞區域安全的不穩定性，例如：朝鮮半島核武危機，美國將北韓定位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並以政經議題向北韓勒索，至此又爆發新一波的核武危機；相對的，與此同時東亞國家則紛紛圍繞著這項議題希望透過改善、調整與北韓的關係來解決核武問題，<sup>302</sup> 這明顯地表現出美國與東亞國家間的歧異點。

其次，領土主權爭議。東亞區域間的領土主權爭議自古以來都是極具威力的話題，這不但涉及各國天然資源的利益、更涉及到歷史與意識型態的爭議。而這些議題現今被帶入區域議題的探討中，也讓在東亞區域具有影響的兩大強國深陷泥淖。美國一開始在東亞主權問題上著墨較少，大多保持促談者的角色，希望區域內各國能以談判代替衝突，而這也符合自冷戰後美國對東亞的政策。不過自 911 事件爆發後，美國進入新保守主義的世界觀，從新定位了東亞區域政策，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並將某些國家定義成「邪惡軸心」，然後高舉著反恐大旗，堂而皇之的在東亞地區進行軍事佈署，完成其「全球戰略目標」。

最後，在經濟議題上，美國在亞洲金融風暴時並未適時的支援東亞各國，反而利用國際貨幣基金(IMF)所提出的削減公共性支出、允許利率上揚及貨幣匯率自由浮動等相關因應策略，使得亞洲金融風暴使東亞區域陷入更為嚴重的經濟蕭條與社會動亂。另外，美國想將亞太經合會制度化的構想也讓東亞各國感到不安，

---

<sup>301</sup> 同註 284。

<sup>302</sup> 同註 208。

東亞各國不願讓此一自由貿易平台成為美國掌控東亞政經局勢發展的場域。

## 二、中國與東亞國家互動升溫、區域霸權之勢儼然成形

中國從改革開放運動後，其經濟平均成長率之高，使其在短短 10 年內擠身於東亞新興經濟體之列。隨著其進出口貿易額的快速成長，根據 WTO 的統計，中國佔全球貿易比重也從 1990 的 1.7% 升高至 2009 年的 9.6%，中國已然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下一重要的角色。<sup>303</sup>事實上正因為如此日本將中國視為強大的國際競爭對手與主要威脅來源；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崛起，打亂了由美國帶領之就有權力秩序，其結果是東亞區域陷入更激烈的經濟競爭。

不過，就目前的互動來看，中國與東亞區域間的互動更具政治性及經濟性的雙重目的。首先，中國積極與東協簽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並拉攏日、韓等國加入東協加三，希望藉此開拓與東亞區域間的經濟自由化的發展。而中國與東協在此議題上也算是各取所需、相輔相成。在 2010 年東協對中國的出口將成長 48%，而中國對東協的出口也可達 55% 之譜。兩方成為彼此的市場經濟利益所在，中國在近年更超越美國成為東協第三大貿易國。加上前文所提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確立後，雙邊的成長勢必更加迅速、互動也將更加緊密。

在政治層面上，中國則透過拉攏東協突顯其在東亞區域的重要性，而非美國所言之具威脅性的大國。在和平發展上，中國正逐漸降低其在東亞各國間存在的威脅感，這不僅改善了與東亞國家間的外交關係，更可以順勢獲得區域內領導者的角色，擺脫來

---

<sup>303</sup> 同註 222。

自美國與日本的威脅。這也對中國在東亞區域的戰略佈局有明顯的幫助，透過善意的大國和平崛起為訴求，可以將中國勢力延伸至東南亞區域，防止美、日之間形成的新圍堵之勢。<sup>304</sup>

正如同先古典現實主義所言，國家首要目標是追求國家利益與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因此在國際間處於無政府狀態的不確定環境下，國家會自行塑造有利於國家本身的環境。所以在此情況下，中國對東亞區域各國間的互動就不能顯得太過於激烈，中國對此採用的方式，不但加強了雙邊的互動，更同時加強了中國在東亞區域的主控權，藉由與東亞國家頻繁的互動，中國與東亞國家間的互動有逐漸昇溫轉好的趨勢。

### 三、美、中的互動對東亞區域的影響

自冷戰期間開始，美國就主動且積極地希望打開中國的對外大門。從尼克森到雷根，在到冷戰後的歷任總統，美國都體現了一個事實，國際不能將中國排除在外。但之中矛盾的地方又在於，美國不信任中國的未來發展，深怕這逐漸復甦的大國會成為美國在東亞區域或是國際利益上的絆腳石，更怕中國成為世界的第二個強權國家，對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受到動搖。同樣的，中國也積極地在尋找與世界接軌的方式，而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在後冷戰時期也的確闖出自己的一翻天地，透過經濟發展來與世界各國連接。當然，崛起後的中國也深怕國家再遭受動亂而影響整體發展，因此與東亞各國的互動都十分小心，並持著和平發展的口號積極向外建立友好關係，當然對美國也不例外。

---

<sup>304</sup> 宋鎮照，2010，〈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啟動之區域政經意涵：台灣的因應與思維〉，《海峽評論》，第230期，頁22-25。

兩國就抱持著這種小心翼翼的心態在東亞區域的政治、經濟及區域議題上過招。無論是從政治上以「亞太主義」對抗「亞洲主義」、從經濟上美國希望加強亞太經合會的功能；中國則強調透過東協組織的力量來領導東亞經濟發展、又或者是在區域安全議題上美國以反恐名義加強駐軍還是中國穩定中求發展開拓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這些相互競合的結果，對東亞區域來說其實是利大於弊的。東亞各國一直試圖以集體的力量提高在地區性及國際性事務上的影響力，並以維繫強國在東亞區域內的權力平衡為目標，而美、中兩國在此場域的競逐正好就幫助了東亞國家的發展，例如：在政治議題上，藉著中國低姿態的示好，確保東協的安全與發展、二來提昇在區域內扮演角色的價值，拉攏中國以對抗美國的強勢作為；在經濟議題上與中國合作，藉此從中國高經濟成長的發展過程中學習經驗；最後，在區域安全議題上則與多國相互合作，防止東亞區域內隨時可能產生的衝突，並在反恐議題上與美國相互配合，防止國內的動亂產生。

最後，在美、中競合下的東亞區域發展正朝向正面且積極的方向邁進。中國無意取代美國成為區域霸權、美國的角色受東亞各國影響力提昇的影響以無法獨霸東亞區域，加強與東亞各國之間的友好互動與溝通，成為美、中兩國極欲爭取的選項，也成為美、中兩國在解決東亞區域議題上的重要目標。

# 參考書目

## 壹、中文部分

### 一、書籍

Frank, Andre Gunder, And Gills, Barry K., 2004,《世界體系：500年還是500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著，1991，《康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4，《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王高成，2005，《交往與促變：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交往策略》。台北：五南。

中國中央文獻研究室，1991，〈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中）》。北京：人民出版社。

尹慶耀，1973，《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  
毛澤東著、人民出版社編，1991，《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4，《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朱陽明、王生榮、陳舟，2001，〈中國亞太安全戰略的地緣戰略基礎〉。收錄於王生榮主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江澤民，1997，《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江澤民，2001，《論「三個代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李文志，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憬藝。

李光耀，2000，《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台北：世界書局。

-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
- 杜默譯，Clyde Prestowitz 著，2004，《美國遊戲》。台北：大塊。
- 松本一男，1993，《毛澤東評傳》。台北：新潮社。
- 林若雱，2002〈由競爭走向整合：21世紀中國與東協的安全關係〉，收錄於宋國誠編，《21世紀中國：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卷2》。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315-320。
- 門洪華，2005，《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周恩來，1980，《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林慧如、李弘元等譯，木村福成、丸屋豐二郎、石川幸一等著，2004，《經略中國，布局大亞洲》。台北：經濟新潮社5。
- 林蔭庭譯，John Naisbitt 著，1996，《亞洲大趨勢》。台北：天下文化。
- 洪兵，2000，《剖析美國利益》。北京：世界知識。
- 張中雲，1998，〈試論鄧小平關於對外開放與外交戰略之間關係的思想〉，《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張立平，2003，〈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保守思潮〉，任曉、沈丁立主編，《保守主義理念與美國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三聯書局。
- 章旦隆，2007，〈胡錦濤的對外政策：戰略目標與策略運用〉，收錄於楊開煌主編，《胡錦濤政權之續與變論文集》。台北：問津堂。
- 張光，1995，《中國的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譯，1984，《美國歷任總統就職演說集》。台北：黎明文化。
- 張伯偉，2001，《APEC 貿易自由化及其影響》。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Alan Collins 著，2004，《東南亞的安全困境》。

-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頁 194。
- 許志嘉，2000，《中國外交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  
台北：水牛。
- 許志嘉、許湘濤著，2003，〈「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與東亞大國關係的發展〉，《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臺海局勢》。台北：大屯。
- 張亞中，2003，《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
- 張亞中、孫國祥，1999，《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
- 陳峰君，1999，《當代亞太政治與經濟分析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陳啟懋，2000，《中國對外關係》。台北：吉虹資訊。
- 陳鴻瑜，1987，《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衝突》。台北：幼獅文化。
- 葉自成，2001，《新中國外交思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外交思想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黃奎博、蘇紫雲，2003，〈「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全球戰略之調整〉，《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臺海局勢》。台北：大屯。
- 傅啟學，1987，《中國外交史》。台北：商務。
- 楊開煌，2007，〈胡錦濤改革政策之繼承與變革〉，收錄於楊開煌主編，《胡錦濤政權之續與變論文集》。台北：問津堂。
- 楊潔勉，2005，《大合作：變化中的世界和中國國際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廖光生，1988，《排外與中國政治》。台北：三民。
- 趙全勝，1999，《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圍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法》。  
台北：月旦出版社。
-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
- 蔡百銓譯，Dewi Fortuna Anwar 著，1998，《印尼與東南亞國協：外交政策與區域主義》。台北：國立編譯館。
- 蔡東杰，2007，《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
- 盧子健，1990，《一九四九以後中共外交》。台北：風雲出版社。

- 韓念龍，1988，《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5。
- 謝益顯主編，1997，《中國當代外交史》。北京：中國青年。
- 蘇浩，2003，〈東亞區域合作機制的建立極其對地區國際關係的影響〉，收錄於袁鶴齡主編，《全球化 VS 區域化：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契機與挑戰》。台北：鼎茂。
- 蘇浩，2003，《亞太合作安全研究：從啞鈴到橄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蘇紹智、高輝等著，2007，〈中共意識型態研究〉，《中國研究導論》。台北：陸委會。

## 二、期刊

- 卜大中，1994，〈柯林頓新政府與麻省理工經濟學派的理論〉，《美國月刊》，第 8 卷，第 8 期，頁 89-100。
- 于迎麗，2004，〈朝核問題與東北亞安全合作〉，《國際觀察》，第 6 期，頁 35。
- 王帆，2005，〈東亞安全模式：共存、並行，還是置換？〉，《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11 期，頁 16-17。
- 王崑義，2007，〈中國的和諧外交與對南太平洋的擴展〉，《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3 卷，第 3 期。頁 65-69。
- 方華，2000，〈亞太安全架構的現狀、趨勢集中國的作用〉，《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 期，頁 11。
- 朱立群，2007，〈觀念轉變、領導能力與中國外交的變化〉，《國際政治研究》，第 7 期，頁 10。
- 朱景鵬，1999，〈區域主義、區域整合與兩岸整合問題之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8 期，頁 76。
- 吳玲君，2001，〈中共 APEC 策略與角色的轉變：新現實主義的分析〉，《問題與研究》，第四十卷，第三期。頁 5-10。

- 吳玲君，2005，〈中國與東協區域經濟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5期，頁15-16。
- 李登科，1993，〈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32卷，第11期，頁40-42。
- 宋興洲、林佩霓，2009，〈東南亞國脅與區域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25期，頁7-8。
- \_\_\_\_\_，2009，〈東南亞國協與安全區域〉，《全球政治評論》，第25期，頁13-14。
- 宋興洲，2005，〈中國崛起：修正型強權或現狀型國家？〉，《全球政治評論》，第11期，頁53。
- \_\_\_\_\_，2005，〈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壇》，第24期，頁1-48。
- 李曉敏，2002，〈中國的新安全觀〉，《和平與發展》，第2期，頁45。
- 宋鎮照，2010，〈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啟動之區域政經意涵：台灣的因應與思維〉，《海峽評論》，第230期，頁22-25。
- 周建民，1995，〈中國如何面對下個世紀石油進口的難題〉，《戰略與管理》，第2期，頁22-25。
- 周煦，1996，〈美國柯林頓政府的亞太安全政策〉，《美歐月刊》，第11卷，第3期，頁5-39。
- \_\_\_\_\_，1996，〈美國柯林頓政府的亞太安全政策〉，《美歐月刊》，第11卷，第3期，頁6。
- 林欽明，1999，〈APEC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22卷，第12期，頁13-16。
- 倪峰，2001，〈論東亞地區的政治、安全結構〉，《美國研究》，第3期，頁8。
- 胡福森，1989，〈美國的經濟外交〉，《美國月刊》，第4卷，第5期，頁76。
- 洪銘德，2008，〈從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布希主義的根源〉，《國會

- 月刊》，第 36 卷，第 2 期，頁 40-61。
- 殷天爵，1999，〈中共大國務外交與夥伴關係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3 期，頁 82-90。
- \_\_\_\_\_，1999，〈中共大國務外交與夥伴關係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3 期，頁 82-90。
- 馬燕冰，1996，〈東盟加速一體化及對地區的影響〉，《現代國際關係》，第 1 期，頁 27-31。
- 莫大華，1996，〈後冷戰時期東協的軍備競賽與區域安全〉，《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頁 53。
- 張心怡，2006，〈評析當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灣因應之道〉，《歐洲國際評論》，第 2 期，頁 13-16。
- 張志剛，2005，〈建構中的東盟安全共同體：一種建構主義的視角〉，《國際理論》，第 7 卷，第 3 期，頁 34。
- 陳牧民，2006，〈當和平崛起遇上台灣問題：菁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4 期，頁 12-14。
- 陳佩修，2004，〈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國土安全任務與反恐聯盟建構〉，《全球政治評論》，第 5 期，頁 109。
- 張雅君，2003，〈十六大後的中共外交：相互依賴深化下的利益、挑戰與政策取向〉，《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頁 1-25。
- 陳毓鈞，1994，《尼克森與美國的對華政策》，〈美歐月刊〉，第 9 卷，第 6 期，頁 20。
- 黃枝蓮，1995，〈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中美關係〉，《廣角鏡月刊》，第 270 期，頁 40-43。
- 黃清賢，2006，〈全球化背景下轉化中的中共意識型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4 期，頁 23-25。
- 蔡東杰、洪銘德，2009，〈美中兩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軟實力構築與競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0 卷，第 1 期，頁 61。
- 蔡佩蓉，2002，〈從區域主義的實踐—論中共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

- 協定之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21 期，頁 50。
- 衛嘉定，1993，〈美國總統柯林頓之總體外交新架構〉，《問題與研究》，第 32 卷，第 5 期，頁 25-26。
- 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頁 125-128。
- 劉曉竹，1996，〈美國對華政策新動向〉，《北京之春》，第 36 期，頁 83。
- 蕭全政，2001，〈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特色〉，《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頁 201。

### 三、論文

- 中華歐亞基金會，2003，〈中共對美外交對兩岸關係之影響〉，《政策報告 No. 920003》。
- 宋興洲，2011，《中國東亞外交政策大綱》。台中：東海大學政治系，頁 1。
- 高少凡，2010，《中國崛起對東亞國際體系結構轉變之研究》，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發表論壇」，東海大學政治系主辦。
- 楊昊，2009，《東協—中國關係的新局面與新思維》，「東亞政經論壇」學術研討會，新世紀東亞與台灣政經發展教學研究計畫、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治經濟學研究所主辦，國立成功大學。
- 廖苔君，2000，《後冷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之分析：從建設性交往至戰略夥伴關係》，碩士論文，東海大學。
- 羅元志，2004，《冷戰後中國的戰略選擇對亞太安全體制形成之影響》，碩士論文，台灣私立東海大學，頁 86-87。

### 四、網路

人民日報，1985年2月15日，〈中蘇兩國關於締結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協定公告〉，人民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5/content\\_2336329.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5/content_2336329.htm)。

中央社，2010年2月5日，〈華郵社論讚許美以軍售履行對台義務〉，奇摩新聞網，

[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d/a/100205/1/1vxx7.html](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d/a/100205/1/1vxx7.html)。

王立勇，2000，〈冷戰後中國外交戰略的重大發展〉，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http://ch.shvoong.com>。

王勉、李佳鵬，2008，〈應對金融危機孤掌難鳴，中國與東協需攜手渡難關〉，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459154.html>。

中國評論新聞網，2009年10月6日，〈專家：歐巴馬政府歡迎「對等的日美關係」〉，

<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10/9/6/2/10109621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0962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7年7月31日，〈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36/1138/t4549.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網站：<http://zhs.mofcom.gov.cn/>。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2010年春季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一）〉，

<http://big5.ec.com.cn/gate/big5/ccn.mofcom.gov.cn/spbg/show.php?id=10452&ids=>。

江澤民，2002年11月17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

。

李忠杰，2002，〈十五大以來我國理論和實踐的重大突破〉，《人民文摘》，第9期，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2086/7419/712262.html>。

俞錚、廖雷、王運才，2004年4月24日，〈博鰲亞洲論壇2004年年會開幕演講〉，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4/24/content\\_1438259.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4/24/content_1438259.htm)。

唐家璇，1999，〈新中國外交的光輝歷程〉。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wjs/2159/t8737.htm>。

陳成良，2009年7月23日，〈參與東協論壇，希拉蕊宣示美「重返」亞洲〉，《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l/23/today-int2.htm>。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家安全組，2005年7月6日，〈釣魚台主權爭議與護漁問題〉，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Symposium/s94/970714-NS.htm>。

許玉明，2003，〈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與國際政治、經濟新格局〉，

<http://www.54479.com/study/shownews.asp?newsid=303>。

張佑之，2010年10月29日，〈希拉蕊談釣魚台 中國強烈不滿〉，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1010290238&q=%E5%B8%8C%E6%8B%89%E8%95%8A%E8%AB%87%E9%87%A3%E9%AD%9A%E5%8F%B0+%E4%B8%AD%E5%9C%8B%E5%BC%B7%E7%83%88%E4%B8%8D%E6%B%BF>。

湯光鴻，2003，〈試論江澤民國際戰略理論的理論體系〉，南京政治學院學報，

<http://www.54479.com/54479/ReadNews.asp?NewsID=444&BigClassName=&BigClassID=18&SmallClassID=17&SmallClassName=&SpecialID=24>。

詹中原，2006，〈東協加三的發展與對中國的影響—政策面的探討〉，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95/CL-R-095-030.htm>。

管淑平，2009年10月26日，〈東協十加六—亞太催生共同體〉，《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oct/26/today-int3.htm>。

鳳凰網，2010，〈2010年8月18日，共和國圖像志—鄧小平為中國設計“三步走”戰略〉，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v.ifeng.com/his/201008/f9ae9714-30e6-4656-9035-154ae5b5d4af.shtml>。

劉大年，2002，〈APEC的回顧與展望〉，中華經濟研究院，

<http://www.peaceforum.org.tw/filectrl/TE0110001.htm>。

## 五、報紙

王崑義、呂炯昌著，2008年6月22日，〈從環太平洋軍演看美國亞太戰略轉變〉，《青年日報》，韜略談兵版。

金燦榮，2002年2月19日，〈鮑威爾：中共既非戰略夥伴亦非競爭對手〉，《中國時報》，版11。

錢其琛，1992年12月30日，〈回顧與展望〉，《人民日報》，頁7。

## 貳、英文部分

### (I)Books

Antolik, Michael, 1990, *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 Accommodation*. New York: East Gate.
- Backgrounder, 1982, *Reagan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Taipei: American Institution in Taiwan.
- \_\_\_\_\_, 1982, *U.S. Military Strategy Aims to Deter Conflict*. Taipei: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 Baylis, John and Smith, Steve, 2001,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gsten, Fred, 2000, *Towards a Tripartite World*. New York: The Economist.
- Brzezinski, Zbigniew, 1983,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 \_\_\_\_\_, 2008,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Carpenter, Ted G., 1998, "From Intervenor of First Resort to Balancer of Last Resort," in Selig Harrison and Clyde Prestowitz, eds. *Asia After the Miracle*.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 Catley, Bob and Keiliat, Makmur, 1999, *Spratlys: Th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 Clark, Ia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linton, William J., 1993, *A Vision of Change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 C.: Th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Dobrynin, Anatoly, 1995, *In Confidence*. New York: Times Books.
- Fairbank, John. K. and Macfarquhar, R., 1987,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 Farnsworth, David N., 198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Nelson—Hall.

- Finnemore, Martha, 1996,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nnecticu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arver, John W., 199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New Jersey: Printice-Hall.
- Gittings, John, 1974, *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Halliday, Fred, 2002, *Two Hours Shook the World: September 11, 2001: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London: Saqi Books.
- In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80, *China: U. S. Policy Since 1945*.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 Kegley, Charles W. Jr., and Wittkopf, Eugene R., 199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Kennan, George F., 1966, *The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 Kissinger, Henry A., 1982,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Leifer, Michael, 1996,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h, Christine, 1995, "The Vienna Process and the Importance of Universal Standard in Asia," in Michael C. David, eds., *Human Right and Chinese Values: Legal'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nn, James H., 1999,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Inc.

- Mason, John, 1996, *The Cold War, 1945-1991*. New York: Routledge.
- Mazarr, Michael, 1997, *North Korea and the Bomb: A case Study in Nonprolifera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McMahan, Jeff, 1985, *Reagan and the World: Imperial Policy in the New Cold Wa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Mennis, Bernard, 1971,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fficers: What They are and What They Believe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lumbu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orgenthau, Hans J., 1973,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Neher, Clark and Marlay, Ross, 1996,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The Winds of Chang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 52.
- Nixon, Richard, 1984, *Real Peace*. New York: Little, Brown & Co..
- \_\_\_\_\_, 1996,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O' Donnell, Guillermo, 1997, "The Myth about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Yun-han Chu and Hung-mao Tien, 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rends and Challenges*. New York: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Ravenhill, John, 2001,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nau, James N., 1981, *The Study of Political Adaptation*. London: Frances Pinter.
- Rozman, Gilbert, 2004, *Northeast Asia's Stunted Regionalism: Bilateral Distrust in the Shadow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ssett, Bruce and Starr, Harvey, 2009,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 Choice*.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 Schweller, Randall L., 2003,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London, MIT Press.
- Segal, Gerald, 1990, *Rethinking the Pacif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85-86.
- Sokolsky, Richard, 2000,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 Strategy Toward China." Los Angeles: Rand Corporation.
- Spanier, John, 1985,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Texas: The Dryden Press.
- Steel, Ronald, 1957, *Pax Americana*. New York: Vinking Press.
- Vance, Cyrus, 1983, *Hard Choi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Weinberger, Caspar, 1986,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Y 1987*.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Wendt, Alexander, 1994, *Collective Identif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Yahuda, Michael B., 1996,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 Yip, Wei Kiat, 2001, *Prospects for Close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California: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 Zakaria, Fareed,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I)Periodicals

- Acharya, Amitav, 1995, " Making Multilateralism Work: the ASEAN

- Regional Forum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presented in Pacific Symposium ,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and U. S. Pacific Command, Feb. 22-23, 1995.
- Baker, James, 1991, “American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pp. 1-18.
- \_\_\_\_\_, 1991, “American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5, pp. 4-5.
- Berger, Mark T., 1999, “APEC and Its Enemies: the Failure of the New Reg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5, No. 5, pp. 1013-1030.
- Clinton, William J., 1993, “Fundamentals of Security for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29, pp. 509-512.
- \_\_\_\_\_, 1993, “Building a New Pacific Community.”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 28, pp. 485-488.
- Emmers, Ralf, 2001, “The Influen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Factor With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3, No. 2, p. 286.
- Goh, Evelyn, 2004,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in United States East Asia Strateg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1, p. 59.
- \_\_\_\_\_, 2004,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in United States East Asia Strateg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1, p. 59-61.
- \_\_\_\_\_, 2004,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in United States East Asia Strateg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1, p. 64.
- Hirsh, Michael, 2002, “Bush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p. 32.
- Huxley, Tim, 1998, “A Threa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Rejoinder,” *Security Dialogue*, Vol. 29, No. 1, p. 117.
- Kahler, Miles, 2000, “Legalization as Strategy: The Asia-Pacific

-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 pp. 549-571.
- Kirkpatrick, Jean J., 1989, “Beyond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1, pp. 1-16.
- Layne, Christopher, 1985, “The Real Conservative Agenda,” *Foreign Policy*, No. 61, p. 73.
- Maoz, Zeev, 1997,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pp. 162-198.
- Mearsheimer, John, 2006,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No. 4, pp. 160-162.
- Mesquita, Bruce Bueno De, 2002,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1, p. 4.
- Narine, Shaun, 2004, “State Sovereignty,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7, No. 3, pp. 423-450.
- Nye, Joseph S. Jr., 1990, *Bound to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4-5.; Gerald Segal, 1999,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3, pp. 29-32.
- Posen, Barry R., 2001,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Grand Strategy, Strategy, and Tac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p. 51.
- Rice, Condoleezza,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1, pp. 47-50.
- Ricks, Thomas E., 2000, “Changing Winds of U. S. Defense Strategy,” *Herald International Tribune*, May, 2000, pp.27-28.
-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pp. 144-172.
- Roy, Denny, 1994, “Hegemony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pp. 149-168.

- Ruggie, John Gerard, 1992,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pp. 561-598.
- Ruland, Jurgen, 2005, "The Nature of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Challenges," *Security Dialogue*, Vol. 36, No. 4, p. 554.
- Schlesinger, Arthur Jr., 1995, "Back to the Womb: Isolationism's Renewed Threa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4, p. 8.
- Schweitzer, Arthur, 1962, "Ideological Strateg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15, No. 1, pp. 46-66.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1, pp.99-107.
- Shambaugh, David, 2004,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p. 64-99.
- Tellis, Ashley J., 2004, "Assessing America's War on Terror: Confronting Insurgency, Cementing Primac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Analysis*, Vol. 15, No. 4, p. 37.
- Thomas J. Christensen, 2006,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pp. 1-2.
- Tonnesson, Stein, 2003, "Sino-Vietnamese Rapprochemen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rritant," *Security Dialogue*, Vol. 34, No. 1, pp. 55-70.
- Walt, Stephen M., 2001, "Beyond bin Laden: Reshaping U. 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 3, p. 56.
- \_\_\_\_\_, 2001, "Beyond bin Laden: Reshaping U. 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 3, p. 85.
- Xiang, Lanxin, 2001, "Washington's Misguided China Policy," *Survival*, Vol. 43, No. 3, p. 19.

Zoellick, Robert B., 1994,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The Future*, No. 11, August, p. 139.

(III)Internet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1972, in Shanghai,  
[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uploads/images/yJIG2IXkWU8g  
k1uq4Cx1tw/1972\\_Joint\\_Communique.pdf](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cn/uploads/images/yJIG2IXkWU8gk1uq4Cx1tw/1972_Joint_Communique.pdf)

Obama, Barack, 2009,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President\\_Barack\\_O  
bamas\\_Inaugural\\_Address/](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President_Barack_Obamas_Inaugural_Address/)

Obama, Barack, 2009, *President Obama Holds Town Hall with  
Chinese Youth*. The White House,  
[http://www.whitehouse.gov/photos-and-video/video/china-town-h  
all](http://www.whitehouse.gov/photos-and-video/video/china-town-hall)

The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http://www.whitehouse.gov/about/presidents/richardnixon>

The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 Gerald R. Ford*,  
<http://www.whitehouse.gov/about/presidents/geraldford>

The White House, *The President Ronald Reagon*,  
<http://www.whitehouse.gov/about/presidents/ronaldreaga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Available from: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2001.pdf>